全球化
GLOBALIZATION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月刊）

刊名题字　曾培炎

全球化 2016 年第 2 期（总第 55 期）

·本刊专论·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应有新思路　曾培炎（005）

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　魏礼群（008）

·宏观经济·

“供给侧”学派溯源与规律初识　贾　康　苏京春（030）

·“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专题·

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杨伟民（055）

行进在礁石和浅滩中的全球经济　张宇燕（060）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　刘世锦（062）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工作　张晓强（064）

着力发展现代农业　陈晓华（066）

关于《中国制造 2025》的两点认识　冯　飞（067）

·国际经济·

“一带一路”战略风险评估及应对建议　魏琪嘉　肖宏伟（069）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入新常态

李照刚　彭　博　李方青　方　虹（078）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区域经济·

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的策略思考

陈志成　孔志坚（092）

·产业发展·

设计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和趋势　林笑跃　吴　溯（104）

·权威观点·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0）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4）

Maiook 麦格网
电子阅读　扫一扫

CONTENTS

New Thinking Should be Adopted for the Macro－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Zeng Peiyan (005)

Building a World Tourism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 *Wei Liqun* (008)

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Supply－side School and Initial Analysis on its Law
Jia Kang, *Su Jingchun* (030)

Special Topic of China Economic Annual Meeting 2015－2016
Yang Weimin, *Zhang Yuyan*, *Liu Shijin*, *Zhang Xiaoqiang*, *Chen Xiaohua*, *Feng Fei* (055)

Risk Evalua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Countermeasures
Wei Qijia, *Xiao Hongwei* (069)

Study on the New Normal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 Zhaogang, *Peng Bo*, *Li Fangqing*, *Fang Hong* (078)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Building the Food Trade Channel between China (Yunnan) and Indochina *Chen Zhicheng*, *Kong Zhijian* (092)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Lin Xiaoyue*, *Wu Su* (104)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应有新思路*

曾培炎

摘要：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可能呈现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低投资、高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偏弱。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比“十二五”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挑战更为严峻。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过程中，必须探索宏观调控的新路径，特别是树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守住“底线思维”，准确识别、预判、化解风险，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使经济发展趋稳和蓄势。

关键词：新常态　宏观调控　新思路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国务院原副总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七年，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产能过剩、自由贸易进程放缓、全要素生产率（TFP）下滑等问题，使得全球复苏缓慢艰难，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而道远。发达国家处于危机以来较好状况。美国经济增长连续六个季度高于2%，但复苏的势头尚不稳固。日本、欧盟实现了较低速度的增长，

*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的演讲。

但增长基础脆弱。新兴经济体集体放缓，中国、印度尚显稳定，俄罗斯、巴西处于衰退的边缘。

展望明年，全球经济可能呈现低增长、低贸易、低通胀、低投资、高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偏弱。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国际油价跌破 40 美元/桶，创下七年来新低，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靴子终于落地，美国从量化宽松周期转向升息周期。但加息不会很顺利，将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输入性通缩风险加剧，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务风险暴露，新兴经济体结构脆弱性或将进一步凸显。当然，困顿、矛盾与风险并非对世界经济的“全景式勾勒”。世界经济体系中也孕育着新的发展势能，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等多点突破与融合，将推动改变发展模式，让创新从摆脱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政策选项升级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选项，这一新趋势确实值得期待。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格局、秩序、规则的大变动、大调整阶段。同样，身处其中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开放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正经历着深刻变化。我认为，仅仅用“转型”来概括今日中国的变革已远远不够。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具有发展的全局性特征，不仅仅表现为增长速度的变化，还包括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方式调整、政府行政行为变化、国民福利共享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

展望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比“十二五”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挑战更为严峻。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宏观调控的新路径。特别是树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针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问题，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守住“底线思维”，准确识别、预判、化解风险，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使经济发展趋稳和蓄势。未来宏观调控中有五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一是如何调整经济考核的“指挥棒”问题。新常态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框架和新的指标体系，突破经济增速目标的“硬约束”，改变经济刺激的“路径依赖”，必须摆脱“换挡焦虑”，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上来。未来可考虑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关键参考性指标，建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并重的“双目标”体系，跨越“全要素生产率下滑陷阱”，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破解“经济—资源—发展”的三角困局。

二是建立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相平衡的调控模式。“十三五”应把握好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多重平衡。实践表明，总量调控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要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板的失衡，必须在总量需求与总量供给平衡的基础上，加

大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间的平衡。着眼长远，将年度宏观调控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总体目标中，促进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统筹约束目标的年度分解工作。在做好总量调控基础上，加强结构调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预期调控，推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三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与环境。以往的宏观经济管理大都偏重于产出端，而忽视了投入端。我认为，强调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比”，提高要素投入综合效率尤为重要。一方面，选准“补短板”的突破口，实施企业设备升级改造，大幅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进程，增加质优价廉产品供给，满足高质量、差别化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新一轮要素市场化改革有效降低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物流中间环节。应当通过基础设施连通与共享经济发展，加速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自由流动，善用全球低成本、高质量要素，健全要素收入合理分配的机制，控制生产、流通、交易成本的过快上升。

四是全面加强对创新和软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十三五”最重要的是把创新真正置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实施“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新常态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高效的和有助于潜在增益的投资。从人均资本存量看，中国目前只有美日的五分之一，未来还有很大空间。需要转变的是，原来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硬投资”，应拨出较大比例投向创新研发、人力资本、重大基础创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的“软投资”，全面蓄势启动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五是主动获取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收益。当前，中国已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重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等重大战略举措，意味着中国已更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30%，中国结构性改革与国内宏观调控、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将会对全球和地区产生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未来，中国需要在规则制定、政策沟通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收益。在国际合作中，不仅要支持国际发展，也要通过这种发展过程，获取合理收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施改革措施，包括人民币走出去等，也要注意避免负的外部性。在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同时，为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为获取我外部性红利做出更大努力。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

魏礼群

摘要：我国已成为世界旅游大国，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研究制定“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和更长远的发展战略。全面估量我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科学认识旅游强国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旅游强国发展的主要经验，正确分析我国全面建设旅游强国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提出全面建设旅游强国需要实行的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对于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关键词：旅游强国　经验与启示　机遇与挑战　战略和举措

作者简介：魏礼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旅游业是我国综合性、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全方位、多功能、大带动的重要作用。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选择。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研究制定“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和更长远的发展战略。全面分析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现状，科学认识旅游强国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旅游强国发展的主要经验，正确分析我国全面建设旅游强国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提出全面建设旅游强国需要实行的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对于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大国

准确把握我国旅游业发展所处于的历史阶段和总体水平，是研究制定我国未来五年

旅游发展规划和重大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在规模上，实现了由小到大、从短缺型旅游发展到小康型旅游大国的转变；在体制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向开放型的转变；在功能上，实现了由主要配合外交工作到发挥全方位作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居于突出重要位置的转变。

总的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旅游大国，主要有以下标志。

在国内旅游市场方面：2014 年国内游客达 36.1 亿人次，位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增长了 17 倍，年均增长 10.1%。旅游已发展为大众消费，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入境旅游方面：2014 年接待入境游客达 1.28 亿人次，30 多年来增长了 69.7 倍，年均增长 12.6%；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在出境旅游方面：2014 年我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 1.1 亿人次，是 1994 年出境人数的 29 倍；出境旅游消费达 1650 亿美元，占世界出境消费额第一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客源国。中国游客从早期出游港澳和新马泰、菲律宾等地，到现在足迹遍布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旅游消费方面：自有统计数据的 1993 年开始，20 多年增长了 39 倍，年均增长 18.1%，从 1993 年 864 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 5.26%，到 2014 年达 33807 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上升到 14%。1994 年，国内旅游消费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2.9%，2013 年这一贡献率达到 16.5%。过去的 20 年间，国内旅游消费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平均贡献率超过了 10%，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在旅游就业方面：2013 年旅游总就业人数达 6441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数的 8.4%。每年可新增旅游直接就业人口 50 万人左右。旅游业就业创业相当可观。在旅游外汇收入方面：2014 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达 569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西班牙，居世界第三位。旅游业一直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居于首位，旅游出口贸易额（旅游外汇收入）占我国全部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40%～50%，个别年份占比过半。在旅游经济贡献方面：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的测算，2014 年，我国旅游业直接、间接和引致创造的生产总值（GDP）占全国 GDP 总量的 9.4%。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2012 年、2013 年、2014 年我国旅游业直接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7%左右，直接加间接的综合贡献增加值占 GDP 达 10%左右，“十分天下有其一”。根据四川省测算，2014 年四川省旅游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的 9.47%，近两年四川省旅游业对 GDP 的贡献率都超过 10%，2014 年四川省旅游业对全省 GDP 的贡献率上升到 15.14%。

中国旅游业在短短 30 多年时间取得如此巨大进展，可谓举世罕见。总之，我国旅游业已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向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目标迈进。

二、世界旅游强国的基本内涵和我国主要差距

为什么要提出建设旅游强国？世界旅游强国的内涵是什么？我国与世界旅游强国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既是提高我国旅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提高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做大做优做强旅游业，增强我国旅游业的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又是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有利于充分发挥旅游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全面发展，在建设世界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独特作用，还是增强旅游业服务公共外交、扩大国际人文交流，提高国家软实力、亲和力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向世界展示我国社会制度和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世界旅游强国的内涵

对于什么是世界旅游强国，国际社会并没有统一的、权威的定义，也还没有形成共识的、科学的评价标准。世界旅游组织对全球旅游目的地，也只是用入境旅游人数与国际旅游收入两大总量性指标进行排序。

我认为，世界旅游强国应是全面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应从多方面来衡量，既有旅游数量的尺度，又有旅游品质的标准；既有旅游整体水平的展现，又有旅游结构的反映；既有旅游宏观的考量，又有旅游企业的比较；既有旅游设施硬件的指标，又有旅游治理水平的比较；既有旅游实力指数，又有旅游者体验评价。旅游强国不在于国家大小，但必须是旅游市场大、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在总结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将世界旅游强国的内涵概括为“八高、八强、八支撑”。

八高，即旅游总量高、旅游品质高（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景区环境质量）、旅游效益高、旅游综合贡献高、旅游从业者素质高、游客文明素质高、旅游安全水平高、旅游科技利用水平高。八强，即旅游吸引力强、旅游创新力强、旅游个性特色强、旅游持续发展能力强、国际旅游竞争力强、世界旅游影响力强、全球旅游话语权强、旅游综合带动力强。八支撑，即拥有世界一流的旅游城市、世界一流的旅游企业、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世界一流的旅游强省强县、世界一流的旅游品牌、世界一流的旅游产品、世界一流的旅游院校、世界一流的旅游人才队伍。

衡量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通常采用旅游总收入及其占 GDP 的比重，旅游总人

数及市场份额包括国内旅游和出入境旅游、旅游创汇收入以及旅游消费、旅游投资、旅游就业、旅游税收所占比重等，还有旅游结构与产品、质量与体验，旅游吸引力、竞争力和保障力，包括世界级旅游产品、景区、企业，旅游品牌和文明程度等。总的来说，世界旅游强国是规模与质量、效益的统一，入境旅游与出境旅游的统一，旅游硬件建设与旅游软件建设的统一，旅游产业素质与公民旅游素质的统一，关键是旅游整体发展水平高，核心是旅游国际竞争力强。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全国旅游的大众化、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

世界旅游强国的核心是旅游业国际竞争力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年度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报告，2015 年，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排前 20 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西班牙、法国、德国、美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新加坡、奥地利、中国香港、荷兰、葡萄牙、新西兰、中国、冰岛、爱尔兰、挪威。当今世界称之为旅游强国的，主要是指西班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除这几个国家之外，英国、意大利、奥地利以及加拿大等国，旅游业的整体水平也高于中国。

（二）我国与世界旅游强国的主要差距

我国与世界旅游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1. 旅游整体发展水平不够高

从旅游创汇能力看，2014 年中国旅游外汇收入仅为美国的 1/5，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 2/5，英国的 3/5。世界旅游强国的国内旅游人次、出游率和消费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次虽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出游率较低，2014 年为 2.06 次，与世界旅游发达国家相比，出游率仅为他们的 1/6～1/5（美国为人均 6.43 次）。特别是我国人均出游人次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中国国内旅游的人均消费水平也较低，目前只相当于墨西哥的水平。我国入境游客人均游客到访量仅为 0.04，落后于西班牙、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人均游客到访量分别为 1.37、1.27、0.24、0.41、0.81。2014 年我国入境游客人均花费为 560 美元，而美国入境游客人均花费 2000 美元、西班牙人均花费 1000 美元，法国人均花费 660 美元。

2. 旅游发展结构和质量差距较大

一是供需矛盾仍很突出。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相当薄弱，旅游公路通达深度不够，乡村道路和旅游专用公路比例小，老少边穷地区的旅游点与中心城市的公路交通不配套，不能适应新的旅游需求。尤其是“十一”、春节长假期间，游客火爆，道路拥挤不堪，旅游接待不暇，住宿和交通供给能力不足。旅游饭店、旅行社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成为旅游投诉的热点。二是旅游产品难以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从国际上看，

旅游消费需求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已逐步从对观光产品的单一需求向观光、度假、会展等多元需求转变。中国旅游产品仍以观光型为主，产品开发滞后、单一，特别是主题旅游、特种旅游和度假旅游产品开发力度不够。三是部分地方旅游环境较差。有些旅游景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质污染严重，脏、乱、差现象不堪入目。有的旅游饭店、餐馆客房环境卫生条件差，无明码标价，变相涨价，欺客宰客，服务质量差。旅游厕所问题突出。四是旅游市场秩序不规范。有的景区市场经营混乱。有些旅行社以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无资质经营旅游业务，发布非法旅游虚假广告，一些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水平低，不按规范要求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强迫或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擅自增减旅游项目，损害了旅游形象和旅游者权益。五是国民旅游文明素质亟待提高。普遍存在在景区大声喧哗、乱扔废物等不文明现象，文明旅游还没有成为广大游客的自觉行为。

3. 世界级旅游名牌和旅游目的地缺少

旅游业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含量不高。我国还没有形成世界一流的跨国旅游集团。我国两万余家旅行社的年营业收入总额仅相当于美国运通一家的 40%、日本交通公社一家的 50%。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和世界旅游城市建设差距大。2014 年 7 月 9 日万事达信用卡国际公司在英国伦敦公布“世界旅行目的地指数”，前 20 名中只有上海市入围（第 16 名）。缺少世界品牌酒店。中国还没有世界品牌酒店，全球十大酒店品牌美国占八个，法国和英国各占一个。

4. 旅游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

旅游人力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真正进入旅游行业就业的不多；旅游人才在行业内流动频繁，行业外流失严重；职业结构不合理，各种新业态人才缺乏，高层次、高素质、高技能、领军型人才、创新创业型、复合型人才、国际化人才都普遍不足。

5. 旅游管理体制机制不利于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旅游资源分属于多个不同部门，旅游工作缺乏统筹管理协调，出现问题推诿扯皮，难以形成合力。“管办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市场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应有发挥。旅游立法相对滞后，缺乏配套法规。带薪休假制度在一些部门和企业得不到真正贯彻落实。

三、世界旅游强国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几点启示

通过对已成为世界旅游强国的西班牙、法国、德国、美国旅游业发展作简要分析，研究建设旅游强国的发展规律和经验，以便为我国实现由旅游大国到旅游强国提供路径

选择的借鉴。

（一）世界旅游强国的发展历程

1. 西班牙

几十年来，西班牙旅游业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从 1959 年起，西班牙改变了过去闭关自守的政策，对外实行全面开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随之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西班牙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支持旅游业发展，鼓励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投资修建旅游设施。1978 年，西班牙的接待游客人数高达 3990 万，超过了本国人口，成为世界上接待游客最大的国家。2014 年，到西班牙旅游的游客达 6500 万，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法国和美国；赚取外汇 652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15 年世界旅游竞争力排行榜西班牙位列第一。

西班牙发展旅游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1）重视政府对旅游业发挥主导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建立旅游管理机构，以举国之力发展旅游。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完善的管理经营体系和制度。政府不断制定和实施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性计划、年度计划和专项计划。1992 年制定的《1992 年—1995 年西班牙旅游业竞争力规划》，有力地促进了西班牙旅游业素质和竞争力的提升。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西班牙推出旅游业发展计划，包括制定出《2012 年—2015 年全国一体化旅游计划》，这个计划以强化西班牙旅游业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该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到今年底都可以实现。

（2）重视旅游产品深层次开发。注重旅游产品体系建设，不断拓展和完善产品系列扩大市场规模，同时加大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着力挖掘文化内涵，突出产品亮点，将单纯的文物旅游扩展为文化旅游。通过景点解说词、游览线路设计、导游素质培训，充分展示旅游产品的文化魅力。

（3）重视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制定城市规划，对市区土地利用性质、城市建筑物高度及外形作出严格限定，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使许多城市成为独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西班牙有很多王宫、教堂和城堡，对重要的文物都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景区景点的门票收入全部用于景区的资源保护，以促进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4）重视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不断完善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各种交通运输设施都尽可能为旅游发展提供方便。建立起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和通讯网络，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每个旅游城市都设有旅游咨询中心，成为当地旅游服务的窗口。所有旅游景点的厕所都非常干净整洁。

（5）重视旅游市场营销和形象推广。通过媒体宣传和广告创建并确立了西班牙作为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针对每个市场的特点，选出最适合的产品形象代表，有的是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有的是世界杯冠军足球队等，并建立了一个平台支持旅游企业对旅游产品进行营销。以西班牙绘画大师杰昂·米罗画风为特点的旅游标志，甚至成为西班牙国家整体形象的标志，为世界各地游客所熟知。

2. 法国

旅游业一直备受法国政府重视。1910 年，法国政府设立国家旅游局。尔后，相继制定《旅游宪章》及一系列旅游法规和实施细则，为旅游业快速、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社会（福利）旅游兴起于法国并发展迅速，政府将部分福利基金资助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旅游公司发展旅游业，目的是让低收入家庭也能享受旅游度假的权利。

法国发展旅游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1）重视文化的特殊作用。法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和壮大，是与法国文化大国地位分不开的。文化堪称法国旅游业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打历史牌、文化牌。重视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开拓新的产品吸引游客。注重博物馆、主题公园旅游开发。

（2）鼓励国外游客购物消费。法国专门制定针对国外旅游的退税政策，鼓励国外游客旅游购物消费。只要是非长期停留的国外游客，出境时就可享受退税待遇，退税率在 10%以上。同时，严格管理并提供优质服务。

（3）注重发挥旅游行业组织作用。法国旅游局隶属于法国公共工程、住房、交通和旅游部。其机构设置明确突出了旅游的产业性质和经济功能，适应了旅游业综合性强的特点。除政府设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外，旅游行业组织与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密切配合，使市场能够健康、有序地运行，避免了恶性竞争。

（4）实行多方面激励旅游制度。一是实行带薪休假制度。依照法国《劳动法》，职工每年至少享有 30 个非假日带薪休假时间，除此以外，每周工作超过正常工作时间 35 小时的部分，都可以转换成假期，任何雇主或机构负责人都无权剥夺员工这项权利，并要接受相关机构的监管。该项措施完善了已有的休假制度，为公民旅游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二是发行旅游支票制度。为鼓励发展国内旅游业，法国政府于 1982 年开始发行旅游支票，并成立了专职公共机构法国度假旅游支票署，进行发行推销管理。

（5）创新旅游宣传和促销方式。重视本地化“窗口宣传服务”，免费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公共服务；法国政府旅游部于 1987 年创建专门负责拓展旅游的“法兰西之家”，即旅游促销机构，总部设在巴黎，由旅游部长领导，以向世界进行法国旅游营销为宗旨。目前“法兰西之家”在 28 个国家设有 33 个办事机构。通过在世界各地建立“法国文化中

心”来宣传法国旅游。在世界许多国家举办法国旅游业推介会，推动国际旅游活动，设立法国旅游宣传网站，通过在线营销手段对法国旅游进行宣传和促销。

3. 德国

德国是个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德国的旅游业迅速发展为一个非常兴盛的行业。2006 年德国有各种酒店六万家，每年接待 4000 万外国游客，旅游业从业总人数约为 240 万人左右，约占德国总人口的 3%，旅游业年营业额在 1200 亿欧元以上。2014 年，德国旅游客流量共 4.2 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约 0.72 亿人次。

德国发展旅游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1）注重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重视保护古建筑等历史人文景观，各地区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有特色的东西，都通过兴办博物馆的形式保留下来。重视保护自然环境，政府通过健全立法、严格执法、加强教育等有效措施，使加强环境保护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为。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极具民间特色的文化都被完好地保留下来。

（2）注重发展多样化个性化旅游。开辟体现旅游不同特色的“音乐之旅”“歌德之路”“童话之路”等线路游。结合各地民俗节庆文化，开展各具特色的旅游。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使各地的人文历史差异性很大，许多人感觉在德国各地旅游就好似穿越了多个国家。

（3）注重旅游全面带动作用。德国非常重视旅游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寓教于乐”。最有代表性的是遍布德国城乡的各类博物馆，形式多种多样。各地旅游景点门票收费都相对较低。旅游设施的建设讲求节俭、实用，不追求豪华。

4. 美国

美国旅游业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依托其发达的经济、科技、文化水平构建的。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各州政府及旅游城市都十分重视旅游业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联邦政府制定了《美国全国旅游政策法》，规定成立“全国政策委员会”，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旅游业发展。1995 年，召开研究全国旅游工作的白宫会议。由国会批准免签政策（VWP），使 68%的美国入境旅游者获益，美国也从这些免签证的旅游者身上获得了全部国际旅游收入的 60%。有 27 个国家享有此项优惠，这些国家的游客旅游或商务可享受 90 天内免签证政策。在全球旅游市场中，美国是最受益的国家。

美国发展旅游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有：

（1）重视对知名度高的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一是文化主题型。特色鲜明的主题公园，既很好地宣扬了美国的历史与文化，又为旅游业增加了文化的底蕴。二是自然资源型。美国自然环境与资源保护全球领先，拥有科罗拉多大峡谷、尼亚加拉瀑布等 388 个国

家公园，155 个国家森林公园，5655 个州立公园，23 条国家风景步道，这些都是吸引力很强的旅游目的地。

（2）重视旅游交通和配套设施建设。美国旅游基础设施十分发达。交通运输便利，1300 多个城市都有机场，全美有大型航空公司 50 多家，国内定期航线达 28 万公里；运营铁路总长达 38.6 万公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设计科学，不同道路交叉联系顺畅，公路总长约 637 万公里。旅游酒店占全球客房供应的 27%。同时，美国旅游业的信息化程度高。

（3）重视规范旅游经营管理。美国具有多个国际权威的行业协会，各协会针对特殊领域，管理旅游资源，协调企业利益。美国旅行社协会（ASTA）是世界最大的旅游和旅游专业队伍的协会组织，通过大量使用自动化技术，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为顾客节省时间和金钱。无论导游服务、餐饮住宿、交通运输，还是在消费购物、景区服务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平。

（二）有益的启示

从以上四个世界旅游强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世界上旅游发达的国家，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实践有力证明，促进旅游业大发展，必须靠“两只手”。一要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充分调动市场、企业、社会、个人发展旅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要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积极引导、扶持、推动旅游业发展，及时制定各种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计划、规划、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度，加强和创新旅游市场监管。“两只手”各展其长，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对旅游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世界旅游强国都是十分注重对旅游资源保护。要坚持保护资源优先，切实加强对自然景观、文物资源的保护，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应着眼于保护好自然风貌和历史原貌。文物资源开发利用必须制定科学开发和保护的方案，切实落实保护措施。建立旅游资源开发回报机制，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人以修建私人博物馆等形式参与文物资源保护。

第三，必须着力提高历史与文化内涵。世界旅游强国都是重视文化旅游的国家。我国可用于旅游产品开发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要更加注重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积极发掘开发文化旅游产品。要注重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特别要保护和发掘世界级遗产文化，提高旅游产品的历史文化含量，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第四，必须大力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世界旅游发达国家无不重视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要着力改善交通条件，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要提高旅游目的地的通达能力。同时，要加强景区的水、电、路和卫生、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景区的综合环境。

第五，必须注重提高旅游环境和服务质量。世界旅游发达国家都是注重提升旅游环境和服务质量的国家。要着力创造舒适的旅游环境，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现代化的旅游信息服务。要重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组织的作用，推动旅游行业自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旅游区、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对开展旅游经营活动的住宿设施、景区景点，积极推行全国旅游标准化管理。

第六，必须健全旅游业发展的支持体系。特别要在财税、金融、土地、出入境等方面实行扶持政策；同时，加紧研究实行疏导分散旅游客流的政策和休假制度，解决游客短时间过分集中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和危及旅游安全的问题。

四、我国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机遇与挑战

（一）战略机遇

从国际方面看，第一，世界旅游业持续发展和中心东移，将为我国旅游业发展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总的看来，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会逐步回升，世界旅游业可望保持较快发展，也会为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未来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空间更大。第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势必带来旅游发展全球化。国外先进的旅游业经营管理理念、标准、方式、手段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国内，从而带动旅游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外国游客更多地到访中国，会不断提高我国旅游业的国际化标准和国际化水平。第三，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创新进步，为我国旅游业创新发展增添巨大动力。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新技术、新装备改造和提升旅游业，正在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不仅会创造出大量新的旅游业态和新的旅游需求，还将极大地推动服务方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极大地提高旅游业的信息化、现代化水平。

从国内方面看，第一，我国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已形成的发展能力，为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多样，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对国内外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具备建成旅游大国的发展能力，旅游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第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健康运行，将为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开拓广阔的道路。我国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整个经济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演变，旅游业的战略地位和支柱作用更加凸显。旅游业作为先导性、引领性现代服务业，作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作为关联性、渗透性极强的行业，有着巨大而丰富的市场需求和

发展潜力。第三，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为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旅游市场体系将更加完善，旅游市场主体更加成熟，旅游管理体制不断创新，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旅游生产力。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将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旅游业。第四，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特有优势，将为全面建设旅游强国提供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断成熟，共产党领导坚强有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这些是旅游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

（二）严峻挑战

从国际上看，第一，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国际经济回升缓慢，动力不足，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第二，国际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不可预见。近些年来，国内外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明显增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影响增大，对旅游业发展产生较大冲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危及安全的事件，仍将在未来影响旅游业的正常发展。第三，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在提升旅游竞争力。不少国家旅游企业的品牌优势明显强于我国。我国旅游企业没有建立起庞大高效的服务体系，在与国外的旅行社集团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从国内看，第一，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的压力增大。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景区建设、景区游客规模迅速扩张，使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的压力明显增大，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第二，旅游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仍然明显滞后。总体旅游供给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度假休闲和个性化旅游产品少，不能有效满足旅游者多样化需求。第三，旅游业创新能力不强。旅游系统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重规模、轻质量，重开发、轻保护等问题。文化资源发掘不够，精品项目不多。生态旅游、低碳旅游还没有成为广大旅游者的自觉行为。第四，旅游业发展体制机制仍存在不少弊端。各级旅游业管理缺乏综合协调机构和机制。旅游统计制度和体系不健全。旅游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适应旅游业繁荣发展的要求。

五、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发展战略和重大举措

（一）实行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战略，把促进旅游业发展作为重大国策

旅游业关联度强、功能性多，旅游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投资价值、消费价值、休闲价值，而且还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各个领域紧密相连，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对

接服务国家大局和公共外交、提升国际地位和软实力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新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旅游业承载着更多更大的使命，已经成为就业创业、出口创收以及拉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和调整结构的关键驱动力。

鉴于当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旅游业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作用，有必要重新界定旅游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确把全面建设旅游强国作为国家重大战略。

一是从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战略，把优先发展旅游业作为重大国策，提升旅游业战略定位，明确发展旅游业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方针和战略举措，在制定和实施“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到2050年旅游业长远发展战略纲要，以更好引导全国各方面的思想和行动。二是更大程度地实施融合发展战略，将旅游发展有机地融入“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法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和“五化”（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并举布局，渗透于、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二）实行旅游业转型升级战略，着力增强旅游产品国际竞争力

坚持树立科学旅游观，大力转变旅游发展方式，走旅游科学发展之路。要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推动旅游由主要观光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转变，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推动旅游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更加注重旅游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更加注重文化传承创新，实现绿色发展、清洁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旅游服务由应付接待向优质、便利、高效、安全、文明发展转变，实现旅游标准化、个性化、规范化服务。

一是制定和实施旅游国际竞争力提升规划。围绕全面建成世界旅游强国，系统提出增强我国旅游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包括显著提升我国旅游硬实力和软实力，明显改善我国旅游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全面提升我国旅游整体素质和水平。

二是制定和实施《旅游质量发展纲要》。全面提升旅游品质。包括加强旅游资源保护，创新旅游产品品牌，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旅游文明素质等。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并把落实旅游质量长远发展规划与解决当前旅游质量突出问题结合起来。

三是大力开发国家旅游精品。旅游精品是指功能独特、特色鲜明、质量上乘、服务

周到、生命周期长，文化要素含量高，竞争力强、知名度、美誉度、市场占有率高的旅游产品。中国是旅游资源大国，但旅游精品不多，要强化旅游精品意识，积极实施旅游精品战略，着力培育一批享誉世界的旅游名品、精品和绝品。

要打造中国特色旅游目的地品牌。通过精心创意和策划，以特色化、品牌化、国际化、系列化为目标，构建中国国际旅游目的地系列品牌。要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充分依托主要城市（群）、大型旅游区、度假地以及有条件的特色城镇，按照世界级优秀旅游目的地标准，形成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类型各异、布局合理的旅游目的地体系。旅游产品是诸要素的有机结合体，开发旅游精品，必须实现旅游产品的整体优化，提高旅游产品的综合配套水平。要打造高体验式旅游目的地创新产品。体验旅游是便于一站式深度消费的定制品。它通过与旅游地居民的接触，对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行充分感受，让自己融入其中，解读当地的文化特色、人文特色、风俗习惯，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形成难以忘怀的体验和回忆。大量现象说明，目的地产品正在演化为旅游者的首选。

四是全面提升国家旅游文化软实力。完善国家旅游宣传推广体系，把国家旅游形象宣传纳入国家整体形象宣传工作计划，全面提升中国国家整体旅游形象。建议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网站，推介和提升国家旅游整体形象。在出境旅游中，要维护良好的对外形象，做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在实施国家旅游精品战略中，要精心规划一批重点实施的旅游产业龙头项目，包括投资规模大、外向型、吸引力强、效益好的综合性旅游产业项目；还要优先发展一批特色旅游支撑重点项目，包括主题公园、主题度假区、特色休闲区、生态旅游区、红色旅游区、养生养老园区、特色旅游村镇、中华老字号项目、文化创意项目等。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和形成旅游发展的战略抓手和战略平台。

（三）实行旅游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行“互联网＋旅游”

要坚持科技兴旅，通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商品化、产业化和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升旅游的科技含量。推行创新驱动、创意领先的理念，加强传统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和改造，创新旅游产品、创新旅游产业链、创新旅游业态。特别要加强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发展智慧旅游，提升旅游服务和旅游管理的智慧化程度以及智能化水平。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深刻改变了旅游业。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构建现代旅游创新体系，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加快推进建设国家旅游创新体系。以“互联网＋旅游”建设为抓手，快速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我国旅游业将由大到强、由快到好，这就要求全面构建开放包容的“互联网＋旅游”发展环境，持续提升“互联网＋旅游”创新能力，

积极开展“互联网＋旅游”创新试点示范，支持引导“互联网＋旅游”新业态发展。

积极推动在线旅游平台企业的发展壮大，整合上下游及平行企业的资源、要素和技术，形成旅游业新生态圈，推动“互联网＋旅游”的跨产业融合。支持有条件的旅游企业进行互联网金融探索，打造在线旅游企业第三方支付平台，拓宽移动支付在旅游业的普及应用，推动境外消费退税的便捷化。加强与互联网公司、金融企业合作，发行实名制国民旅游卡，落实法定优惠政策、实行特惠商户折扣。放宽在线度假租赁、旅游网络购物、在线旅游租车平台等新业态的准入许可和经营许可制度。全国 4A 级以上景区和智慧乡村旅游试点单位实现免费无线网络（WIFI）、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等功能的全覆盖，在全国打造万家智慧景区和智慧旅游乡村。

一是借力“互联网＋旅游”打造国际旅游城市，将旅游城市核心资源互联网化，旅游城市便可向世界展示城市精髓，吸引世界游客，促进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二是借力“互联网＋旅游”打造国际旅游企业，促进旅游业创新，为游客打造新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强旅游企业软实力的同时，将旅游产业链上的旅游企业“智慧旅游”化，形成旅游企业国际大数据，在打造国际化信用服务、放大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吸引力效应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三是借力“互联网＋旅游”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促进旅游目的地走出国门，跨国分享。四是借力“互联网＋旅游”打造国际旅游景区，促进旅游景区国际品牌建设，提高国际游客满意度。

互联网拓展了旅游的开放程度，拓宽了旅游的开放广度。旅游的开放与兴盛，也在延伸着互联网的新业态空间，完善着互联网的新生态体系。要通过“互联网＋旅游”建设，加快形成一批世界级旅游城市、世界级旅游企业、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世界级旅游景区，为我国世界级旅游院校、世界级旅游专家的打造奠定坚实的基础，使我国各旅游城市、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在全世界形成旅游品牌。

（四）实行充分发挥旅游优势战略，着力推进区域旅游特色化发展

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优势，突出发展重点，打好特色品牌，促进各区域旅游业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一是大力推进旅游强省战略。省、市、自治区层面是统筹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是推进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突破口。二是大力推进旅游强市战略。加快推进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城市是建设旅游目的地的主要依托，建议恢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工作。要大力发展特色旅游城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现代旅游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三是要加快建设旅游强县。县级也是统筹整合资源推进旅游发展的关键关节，要以大力推进全域旅游为抓手，大力推进旅游强县建设。四是加快推进国家 A 级景区建设和旅游度假区创建，建设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体系。五是以“特色

化、品牌化、国际化、系列化”为目标构建系列品牌。要充分依托主要城市（群）、大型旅游区、度假地以及有条件和特色的城镇，发挥旅游交通、旅游资源、接待设施集中度高的优势，按照国家优秀旅游目的地标准，打造一批旅游城市、环城市旅游度假带、旅游县域和旅游乡镇，形成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类型各异、布局合理的旅游目的地体系。

建设世界旅游强国，必须集中力量规划好、建设好具有世界吸引力、世界影响力、世界竞争力的旅游核心区。一是要从全面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大局出发，根据我国各地旅游资源分布和旅游产品的突出特色，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和实施若干个跨行政区域的国家级和世界级旅游区、旅游圈、旅游带、旅游长廊，实行倾斜支持政策。二是要充分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世界精品黄金旅游带，将旅游培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先导产业，实现旅游先通。三是要做好与长江经济带的对接，将长江经济带规划建设成为黄金旅游带，成为统筹中东西旅游发展的枢纽。四是要做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对接，建立京津冀大旅游格局，将旅游业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纽带和优势产业，将京津冀建设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五是要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的独特作用，要大力推进粤港澳区域旅游合作升级创新。要充分发挥台湾的独特作用，大力促进海峡旅游合作升级创新。发挥旅游在“两岸四地”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发挥旅游对台港澳工作的独特作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为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服务。可以探索成立“两岸四地”旅游协作发展委员会，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可以探索在海西、珠三角等地区建设“两岸四地”无障碍旅游区，先行试点。

（五）实行“旅游十”战略，着力拓宽旅游业发展空间

“旅游＋”战略即大旅游战略，是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重大战略。“旅游＋”是旅游业创新发展的方向。培育和壮大旅游产业，拓宽旅游产业链，关键是做好做足“旅游＋”这篇大文章。

一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关系到全国 6.7 亿农业人口的福祉，还能提升七亿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城镇居民“5＋2”生活模式的重要形式，成为国内旅游发展的主要战场。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而且能够推动农民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社会结构等产生重大变革，有力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着力打造农家乐升级版，坚持乡村旅游个性化、特色化发展方向，依托当地区位条件、资源特色和市场需求，挖掘文化内涵，发挥生态优势，突出乡村特点，开发一批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合理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

镇，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旅游小镇，建设一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让游客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加强规划引导，提高组织化程度，规范乡村旅游开发建设，保持传统乡村风貌。要实施“旅游＋扶贫”战略，高度重视发掘贫困地区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文化、着力打造高端、精品、特色旅游产品体系。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统筹利用惠农资金加强卫生、环保、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旅游服务体系。

二是大力发展海洋旅游。海洋旅游是中国旅游未来发展的空间，也是当今世界最热的旅游产品类型。要以邮轮和游艇旅游为突破口，加快海洋旅游发展。要加快推进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支持建立国内大型邮轮研发、设计、建造和自主配套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国内造船企业研发制造大中型邮轮。进一步优化邮轮港口布局，形成由邮轮母港、始发港、访问港组成的布局合理的邮轮港口体系，有序推进邮轮码头建设。逐步开放岸线和水域，鼓励发展适合大众消费水平的中小型游艇；鼓励拥有海域、水域资源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游艇码头建设规划。建成一批游艇码头和游艇泊位，形成互联互通的游艇休闲旅游线路网络。

三是大力开展研学旅行。研学旅游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要载体，能够增进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小学阶段应以乡土乡情研学旅行为主，初中阶段应以县情市情研学旅行为主，高中阶段应以省情国情研学旅行为主。支持各地依托自身优势，建设一批研学旅行基地，逐步完善接待体系。加强国际研学旅行交流，规范和引导中小学生赴境外开展研学旅行活动。

四是大力发展老年旅游。结合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发展，积极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老年人休闲养生度假产品。各类景区要加强老年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严格执行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适当配备老年人、残疾人出行辅助器具。鼓励地方和企业针对老年旅游推出经济实惠的旅游产品和优惠措施。

五是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旅游与体育运动、健康养生的结合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我国应该推出一批以中医药文化传播为主题，集中医药康复理疗、养生保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产品。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示范园区，推动中医药产业与旅游市场深度结合，在业态创新、机制改革、集群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扩大中医药健康旅游海外宣传，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国际交流合作，使传统中医药文化通过旅游走向世界。

六是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发挥老牌工业企业、特色工业企业、新兴工业企业的优势和特长，开放多种形式的旅游。鼓励发展邮轮游艇、大型游船、旅游房车、旅游小飞机、

景区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旅游装备制造业。大力培育具有自主品牌的休闲、登山、滑雪、潜水、露营、探险等各类户外用品。鼓励企业开展旅游装备自主创新研发，按规定享受国家鼓励科技创新政策。

七是大力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重点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场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供水供电、应急救援、旅游安全、资源环境保护、安防消防、以及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支持重点旅游线路建设自驾车营地。要大力开展全国旅游厕所革命和实施旅游厕所改扩建工程，鼓励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厕，尽力实现全国各地旅游景区、景点，旅游交通沿线、旅游集散地的旅游厕所全部达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要求。构建方便、快捷、安全、舒适和完善的现代旅游交通服务体系，加强主要景区连接交通干线的旅游公路建设，加快推进中西部支线机场建设，完善旅游航线网络，对接航空、高铁等现代高速交通体系。建立健全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公共服务信息的披露和发布。

（六）实行人才强旅战略，着力构建强大的旅游教育体系和人才队伍

一要以旅游业各类领军人才为重点，着力提高旅游人才素质，加快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类旅游人才，建设以旅游行政管理人才、旅游经营管理人才、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导游人才、旅游技能型人才、乡村旅游服务人才为核心的人才队伍体系。围绕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以旅游基础服务人才为重点，努力提高旅游基础服务人才的素质。围绕旅游行业出现的新兴行业和专业，以满足旅游新业态所需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为重点，加速培养旅游新业态所需专业人才。围绕旅游事业长远发展，以适应旅游业高速发展、旅游企业迅猛扩张的趋势，造就旅游业各类领军人才。围绕政府职能转变，以提高旅游行政管理能力为核心，造就一批具有旅游业发展的大局意识、国际视野、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的旅游行政管理人才队伍。围绕提升企业竞争力，以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为核心，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为重点，加快提升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素质，推进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职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求，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旅游行业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为重点，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改革和完善导游等级制度，规范和加强导游人才队伍建设。适应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以提升职业素质和技能为核心，以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等旅游企业一线技能服务人员为重点，培养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二要构建完备的旅游教育体系，推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效衔接。加强旅游学科建设，协调教育部门

制定有利于提升旅游人才培养质量的教育政策，优化旅游专业体系和课程设置，提升旅游学科地位，积极培养旅游教育教学骨干、学科带头人。建立和完善旅游职业资格和职称制度，设立旅游高级职称系列。创新旅游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学校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开放式培养体系。深化旅游高等教育改革，全面提升旅游高等教育质量，加快发展旅游专业学位教育，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旅游人才的新机制。

三要大力发展旅游职业教育，培育旅游职业经理人市场，满足对高素质旅游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旅游职业教育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积极推动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吸收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提升旅游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完善符合旅游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统筹旅游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促使旅游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建立健全旅游职业教育课程衔接体系，鼓励毕业生在职继续学习，完善旅游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建立旅游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四要加强旅游人才的国际培养与合作。吸引境外知名旅游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培训、研究机构或项目，推动建设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旅游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旅游办学项目。建设海外旅游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和人才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建立海外旅游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有序引进海外高端旅游教育和研究人才。加大引进国外旅游人才工作力度。探索实行技术移民，制定国外旅游人才资源供给、发现评价、市场准入、使用激励、绩效评估、引智成果共享等办法。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与旅行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开发境外优质旅游教育培训资源，完善出境旅游培训管理制度和措施。发展国际旅游人才市场，培育国际旅游人才中介服务机构。

（七）实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着力提升国家旅游治理现代化

旅游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旅游强国，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旅游公共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1. 完善旅游市场体系，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进一步完善公开、平等、规范的旅游市场准入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旅游投资、市场开发、产品促销、经营服务等与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密切相关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尽快

消除行政分割和地区壁垒，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从事旅游经营的各类企业，应公平对待，不得区别歧视。进一步创新企业机制，以资产重组为契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内容，以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为着力点，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以改革开放增强旅游业发展动力，推动旅游市场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重点在设立旅游产业基金、旅游企业重组、搭建旅游投融资平台等方面实现突破。大力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加快推进旅游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提高旅游业精细化管理水平，下大力气解决游客反应强烈的欺客宰客、强迫消费、部分景区门票价格高、旅游存在安全隐患等热点问题。

2. 全面深化旅游企业改革，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企业集团

一是培育大型旅游集团。坚持以培育主业清晰、发展路径明确、竞争优势明显的大型旅游集团为基本方向，依托有竞争力的旅游企业，实施强强联合、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及上市等途径，促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通过市场培育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二是积极支持中小旅游企业发展。引导和支持中小旅游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自身市场开拓能力，实施中小旅游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加快推进中小旅游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中小旅游企业发展专项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各类基金。三是鼓励旅游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引导旅游企业将发展自主品牌作为企业战略重点，支持旅游企业通过自主开发、联合开发、国内外并购等多种方式发展自主品牌。

3. 加快推进国家旅游治理现代化

一要充分发挥国家宏观指导作用，科学制定宏观规划和政策，要创新土地、财税、资源、金融、人才、技术等政策支撑措施，上下结合，用政策推动旅游业发展。修订和制定与旅游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支持、规范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二要深化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旅游的综合协调、综合治理职能，推进旅游大部制改革。提升旅游部门统筹职能，探索旅游部门协调各方、整合相关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可以研究实行涉旅行政管理职能归口合并试点，建立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也可以考虑设立跨部门的旅游委员会，由各级政府领导成员牵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委员会委员，旅游部门承担具体职能。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变“管控旅游”为“服务旅游”，减少对市场主体的干预。简化旅游行政审批，建立高效、便捷的行政审批制度。强化政府市场监管、公共服务职能。四要改革旅游行业协会的领导体制，推进旅游行政部门与旅游协会的脱钩，支持和鼓励行业协会强化协会自律。五要抓紧完善和改革旅游业统计

体制、统计体系和统计制度、统计方法，以全面、科学、准确统计和反映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和对国家的综合贡献。

4. 改革和完善法定假期制度

中国旅游业要实现大繁荣大发展，必须实行分散旅客流动政策，特别要抓紧研究解决如何避免“黄金周”期间数以亿计的旅客给交通、旅店、景点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和负担。一是严格执行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通过采取健全法规、支持政策、鼓励办法，务必使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法制化、规范化、普遍化。二是按照国务院文件规定，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休息。三是研究改革全国所有学校的寒暑假制度。最近有专家研究提出建议，即把总共约两个月的寒暑假分到全年 12 个月休息，即每个月五天，加上每月还有四个周末，每月共有 13～14 天的假日。这样，既可以促进旅游业大发展，也可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教育质量。这是个大胆设想建议，可以深入研究。

（八）实行旅游扩大开放战略，着力建设开放型旅游强国

一是实施旅游“引进来”“走出去”并重战略。旅游业要实行大开放、大合作，善于运用国际市场规则和通行标准，特别要推行入境签证方面的便利化、高效化，欢迎国际客人“游”进来。同时，要加快推进我国旅游企业“走出去”步伐，推动中国旅游产业国际化布局。鼓励有条件的旅游企业“走出去”，开设旅行社、旅游饭店、连锁店和其他旅游经营项目。各级旅游管理主管部门应加强相关部门的部际合作，充分依托相关优惠政策引导和推动中国旅游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以旅游标准的“走出去”推动我国旅游管理制度的输出，积极参与国际旅游经济秩序和规则标准的制定。

二是制定和实施入境旅游提升计划，并制定出境旅游带动入境旅游发展的联动机制。入境旅游是旅游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标志，也是旅游服务贸易出口的关键领域。要在开发适合国际旅游的新产品、入境旅游便利化等方面下工夫。

三是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开展国际旅游合作。按照“互联互通，旅游先通”这一总体思路，制定“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要分别推动建立旅游部长联席会议机制和国际旅游联盟，整合多方资源。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强与沿线国家旅游投资合作，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

四是深化与主要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旅游合作。要在维护游客权益、便利签证政策、中文导游、保障游客安全等方面开辟新的工作空间。开展国际旅游友好城市结对工作，建立一套申报、筛选、结对、管理、评估的规范程序，推动国内外城市间结成国际旅游合作城市，从机制上促进旅游交流。要积极推进在驻外使馆设立旅游参赞。

五是深化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合作。推动相关国家履行中文成为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官方语言的批准程序。与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培训发展中国家旅游人才，选派各级旅游部门的优秀干部到世界旅游组织挂职交流。

六是加快发展旅游实验区，探索设立旅游特区。实行更加优惠便利的政策是支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在云南省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发展实验区、海南国际旅游岛、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格局基础上，加快发展旅游实验区，探索建立旅游特区，给予更加优惠的旅游便利和出入境管理政策。要研究实施促进出入境及过境旅游签证便利化措施，推动符合规定条件的对外开放口岸开展外国人签证业务，逐步优化完善外国人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统筹研究部分国家旅游团入境免签政策，优化邮轮入境政策。

七是积极开拓旅游外交。要进一步探索对外开放的新形态，深化与扩展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合作的内涵与外延，提升我国在世界旅游市场中的影响力，加大扶持、提升公共服务以及强化人才等要素投入促进旅游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构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有序发展出境市场，推动出入境市场互换机制的建立。

（九）实行更加积极的旅游政策战略，着力构筑完善的旅游业支撑保障体系

一是健全财政保障体系，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抓紧研究更加积极的财政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各级政府要配合国家旅游强国发展战略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中央政府投资尤其是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重点景区、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制定优惠、扶持政策，广泛动员、引导社会资金、企业资金投向旅游业。由政府引导、企业牵头，推进设立旅游产业基金，促进旅游企业发展、产业优化创新和转型升级，拓宽对旅游产业的支持方式，在传统的政府贴息和补助奖励基础上，引入股权投资方式，实现专业化投资方式。拓宽旅游企业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上市。

二是健全金融支持旅游体系。对符合旅游市场准入条件和信贷原则的旅游企业和旅游项目，要加大多种形式的融资授信支持，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加强债券市场对旅游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融资，发展旅游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加大对小微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的信贷支持，鼓励中小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经营户以互助联保方式实现小额融资。积极为中小旅游企业争取同中小企业同等的贷款优惠政策。建立旅游发展专业基金公司，为旅游企业的资本运作提供直接有效的资金支持。加大对大型旅游装备出口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完善旅游企业融资担保等信用增强体系，鼓励各类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加大担保和投资力度。拓宽旅游企业融资渠道，鼓励消费金融公司在试点过程中积极提供旅游消费信贷服务。探索开发适合旅游消费需要的金融产品，增强银行卡、信用卡、支付宝的旅游

服务功能。

三是优化旅游业用地等政策。对投资大、发展前景好的旅游重点项目，要优先安排落实土地政策，支持旅游业用海用岛开发项目。支持中西部地区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垃圾场、废弃矿井、石漠化土地开发旅游项目。对近海旅游娱乐、浴场等亲水空间开发予以优先保障。

四是强化旅游法治保障体系。确立依法治旅、依法兴旅理念和战略。从世界旅游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都有完备的旅游法律体系作为支撑。我国旅游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逐步形成了以《旅游法》为核心的旅游法律法规体系和更加有利、更加公平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环境。需要围绕《旅游法》的贯彻落实，抓紧制定或修订《出境旅游条例》《旅游安全管理办法》《景区开放办法》《旅游景区游客承载量核定工作导则》《旅游规划办法》《境外宣传与推广工作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制度，不断完善旅游业发展的法制环境。特别要加大依法监管的力度。

五是完善旅游安全和标准体系。加强旅游安全风险防范，构建旅游应急救援体系。同时，完善旅游标准化框架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要抓紧制定并实施旅游环境卫生、旅游安全、节能环保等标准，重点保障餐饮、住宿、厕所的卫生质量。积极借鉴国际上旅游业实行行业标准化管理的经验，加大旅游标准化推行力度。

责任编辑：艾　冰

·宏观经济·

“供给侧”学派溯源与规律初识

贾　康　苏京春

摘要：本文梳理了“供给侧”经济学派发展中呈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规律：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为，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为，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在此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相关的学理启示及展望。评价方面主要包括两大内容：第一，对“萨伊定律”的评价。包括从历史视角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西斯蒙第对自由放任价值观的批评，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与其的分歧，凯恩斯对其的条件性否定，以及马克思基于“劳动产品价值量”“三位一体”公式和唯物史观引出的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第二，对“供给学派”的评价。通过总结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及重审该学派内部的分歧，总结学界对其的批评和该学派在理论联系实践中的得失。然后，阐述了“供给侧”学派的展望，是推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根植于中国实践对“理性供给管理”诉求的“新供给经济学”，这恰是从发展逻辑上构成“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并论述了其“求真务实”的特征、“否定”的方式以及赋予“复辟”浪潮的新思想，并引伸出支持改革的思路与建设性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供给侧　供给学派　新供给经济学

作者简介：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苏京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2015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学界内外引发广泛热议。实际上，两个多世纪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对于“供给侧”的研究和应用起起伏伏，但从未淡出经济学人的视野。“供给侧”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开端，可认为是 19 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和发展，而随着“后来居上”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对其进行了几近全盘的否定；20 世纪 70 年代，“供给学派”重新兴起，构成历史上在“供给侧”的第一次复辟，且明显带有“螺旋式上升”的新特点，并紧接着又继续湮没于“凯恩斯主义复辟”的浪潮中；直至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供给侧”学派才又以“供给管理”这一带有继续“螺旋式上升”新特点的形式，重新回归至举足轻重之位。在以史实为依据的长期视野下，以历史时期为横轴、经济哲学为纵轴的坐标系，将“供给侧”学派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视为两条曲线，那么必将得到“供给侧”学派曲线始终追逐实践曲线危机点而上的特点（图 1）。就“实质”层面的“实际”而言，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供给侧”学派在两个多世纪以来，主要历经四大阶段，呈现清晰的规律，即两轮“否定之否定”。我们正是在勾画这一轨迹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与反思，总结其启示并作出展望。首先，从历史视角和学术视角对“萨伊定律”“供给学派”的评价进行综述及分析。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大萧条—滞胀—二战后危机—次贷危机”为发展脉络的实证维度，探析四轮经济危机中“供给侧”学派的曲折发展；另一方面，从“萨伊定律—供给学派—供给管理”为发展脉络的学术维度，探析“供给侧”学派认识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并借此思考及论述经济学思潮与危机实践的辩证关系，最后将“供给侧”学派的源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提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展望。以两轮“否定之否定”为脉络，对“供给侧”经济学派的探析，可以揭示出此次决策层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应绝非萨伊定律或里根经济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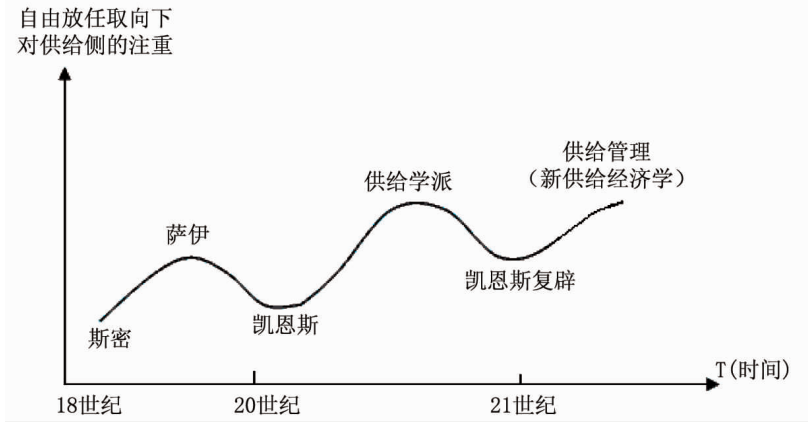


图 1　“供给侧”学派发展曲线

复辟或套用，后危机时代采取的“供给管理”及在中国发展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也绝非脱离轨道的偶然，而恰是沿着历史的长周期和发展逻辑，实质地构成了“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

一、“供给侧”学派溯源：发展脉络的四个阶段

在 19 世纪初的法国，萨伊受到亚当·斯密 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的影响，提出“萨伊定律”、步入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并成为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后，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追随“萨伊定律”的“供给学派”在美国的高调回归，到 2008 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供给管理”的实践。紧密结合经济实践探寻“供给侧”学派源流，我们不难发现其迄今为止历经四大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并沿着四大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清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我们试图将发端、四大阶段、起始时间、产生原因以及两轮“否定之否定”纳入一个逻辑框图中，即形成如下“‘供给侧’学派发展源流图”（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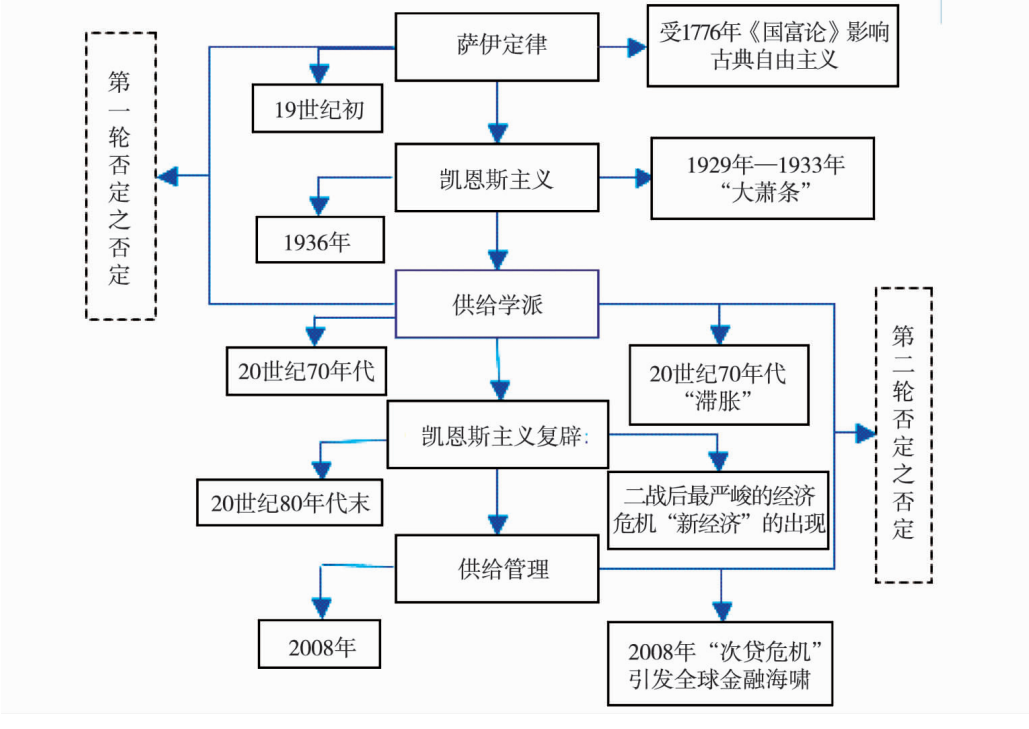


图 2 “供给侧”学派发展源流图

（一）第一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年出生于法国里昂，19岁赴英国留学并开始接触斯密的《国富论》，受到此经济学启蒙思想的影响，萨伊后来也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年轻时期的文学青年，逐步经历从商、从军，后又回归编辑岗位，萨伊在1803年出版著作《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或简称《政治经济学概论》），并在此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的论述，“某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同时授予其价值。但除非有人掌握购买该价值的手段，否则便不会有人出价来购买该价值。所指手段由何组成？回答是由其他价值所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所组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乍一看来似乎非常离奇的结论，那就是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一经产出，从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售出，因为他害怕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售出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极易流失。然而，想出手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用它买东西。所以，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①]应当说，萨伊的论证远非完美，但其生产（供给）产品会引发后续需求的思维，却内含了长久的启发性：实质上，这一萨伊定律核心认识的重大贡献在于启发式赋予了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影响决定市场容量（和产品价格）”的思考。

截至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之前，萨伊撰写的由财富的产生、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三部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直在欧美经济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如哈耶克将其划分为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侧重经验主义的“英国的流派”，以及以卢梭、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侧重理性主义的“法国的流派”，但是“萨伊定律”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分支，始终独树一帜地处于主流地位。直至“大萧条”时期的到来，引发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萨伊定律”几近被彻底颠覆，“供给侧”学派也迎来历史上对其的第一次否定。

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发起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

---

①Jean－Baptiste Say，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or the Production，Distribution，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Batoche Books，Kitchener，2001，Part One：the Production of Wealth，Chapter XV：the Demand or Market for Products，“Which leads us to a conclusion that may at first sight appear paradoxical，namely，that it is production which opens a demand for products”. 中文出自［法］萨伊著，陈福生、陈振骅译：《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究领域颠覆性转变的革命标志是，1936 年凯恩斯主义奠基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凯恩斯认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而这恰恰与认为价格和利息率会自动调整达到均衡的“萨伊定律”相悖。经济学界信奉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历史背景是，1929 年—1933 年由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即“大萧条”。这一次经济危机以 1928 年木材价格的下跌为导火索，进而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美国采取强制手段下调基本谷物价格打破全球价格链条，引发美国国内空前投机热，抽回了当时游走在欧洲的巨额资金，并最终于 1929 年 10 月引发华尔街股市暴跌，这一衰退进一步通过金融链条传导而迅速蔓延至全球范围，且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这一局面从 1929 年一直持续到 1933 年罗斯福颁布以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为主要内容的“3R”新政，经济萧条才得以遏制并开始企稳向好。当时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对经济运行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学理论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是在实践层面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挑战以后，以理论架构的创新给出了对于实践的有力指导。这些相关思考和逻辑演变，纳入凯恩斯的《通论》中，得以广泛传播，其对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供给侧”学派代表——“萨伊定律”所进行的几近全盘的否定，自然也随之成为“凯恩斯革命”所带来的一项有影响的思想否定。

（二）第二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

自 1936 年《通论》出版使凯恩斯主义开始风靡世界起，全球经济面临的历史背景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翻开《美国经济史》即可见 1933 年渡过“大萧条”时期后，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段近现代史的大事件几乎由战争填充：1939 年—1945 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 年—1953 年为朝鲜战争，1964 年—1973 年为越南战争。二战及二战后时期，即 20 世纪 40 年代—60 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强烈威胁美国并有可能席卷全球。这种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至停滞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又加剧通货膨胀的新型经济危机，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真正意义的挑战，和实践中凯恩斯主义“干预”操作的手足无措的窘境一起，宣告了凯恩斯主义辉煌时代的终结。

经济学界对“滞胀”进行了大量讨论，应运而起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卡尔多学说、二元系统说、两种价格体系说等学派，都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对“滞胀”的原因和对策进行探究，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可说是大潮流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分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人物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应当减少政府干预，并在不断发展中分离出著名的理性预期学派，对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

响。而与此同时，由裘德·万尼斯基命名，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人物的供给学派，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作为主要视角的认识，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着眼于供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主张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对经济增长进行激励。这种思想最终因其有效性以及在政治层面满足决策者诉求等多重原因，在国家宏观政策考量及实践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执政以及英国撒切尔“去国有化”的重要指导思想。1981年—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进入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里根认为供给学派思想“同70年代需求学派掌管的、导致通货膨胀的繁荣，适成鲜明的对照”①，并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声明要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宏观政策决裂，而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主导思想，且在1985年第二任期宣布继续扩大原计划。这使得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供给学派同时也得到“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这一冠称，标志着“供给侧”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否定。

（三）第三阶段：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

供给学派指导政策实践时信心满满，但历史记载的实际结果却并不那么合乎意愿。尽管经过供给学派政策实践，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有所提升，但是美国宏观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顺利增长，加之供给学派主张全面减税的政策导致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还导致利率攀升、外贸出现赤字，于是它又迅速丧失信任，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凯恩斯主义复辟奠定了基调。

此外，20世纪80年代历史背景中格外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美国“新经济”时代的悄然到来。美国产业结构从80年代开始产生深刻变化，以信息业为核心、“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星球大战计划”等以高科技为标榜的政府宏观导向也掀起美国国内对科技追求的狂潮。以硅谷为例，尽管是似乎带有偶然性地始创于20世纪70年代，伊始以军事技术和无线电技术为基础，但是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了大规模产业园区，成为集生物、空间、海洋、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研究机构为一体的美国高新技术的聚集区，并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和腾飞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来源。然而，供给学派当时所掌控的宏观政策并没有将这些新动力充分纳入考虑中，仍然“缺乏系统性”地坚守减税政策，实际上很快脱离了经济实践的发展重心，反而造成了财政赤字的巨额增长，便表现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

①参见1981年2月18日美国里根总统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提交的国情讲话。

尽管里根时代“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亦带来明显问题，所以后任美国政府决策者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多采取需求侧调节和供给侧调节双管齐下的过渡性财政政策。一方面虽不否定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又注重通过节支来控制需求，从而减少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困扰。特别是一旦滞胀特征淡化，政策主流便迅速重拾总量“反周期”调控的标准化国家干预轨道，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对“供给侧”学派启动了第二次否定。

（四）第四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

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承大统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继萨缪尔森《经济学》1948 年第 1 版问世以来，已再版近 20 次，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百科全书。而萨缪尔森倡导的“逆风向”而行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不仅在凯恩斯革命时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对全球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主要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复辟”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思路。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初，美国经济在以科技发力为先导的巨大增长浪潮推动下，历经十余年的稳定增长，继续坐稳世界经济体之林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截至 2007 年，尽管中间经历了以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带来的“第三次革命”和理性预期及信息经济学为经济学界注入的新思想、新发展，但从实践角度而言，经济学界特别是各主要国家的决策者，对凯恩斯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复辟两次浪潮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实践结果，仍然信奉无疑。然而，2008 年美国金融系统爆发“次贷危机”，并通过迅速传导效应直接引发欧洲诸国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两足鼎立局面发生巨大动荡，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实为与“大萧条”相提并论）的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再次质疑。此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中，美国实际上断然摆脱所谓“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明确地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节或者需求侧调节，标志着“供给侧”调控思想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次否定。

二、“供给侧”学派源流呈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

“供给侧”学派源流发展的四大阶段呈现出相当清晰的规律性，即两轮“否定之否

定”。第一轮“否定之否定”是指“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是指“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一方面揭示了“供给侧”学派自产生以来的发展变化起伏轨迹，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后危机时代的“供给管理”提供了可供探寻、值得重视的逻辑路径。

（一）第一轮“否定之否定”：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

“供给侧”学派的第一轮“否定之否定”即从开端到第一次回归的阶段。19 世纪初，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开端，并伴随古典自由主义在 19 世纪一直位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直至 20 世纪初经济危机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1929 年—1933 年“大萧条”时期，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释更无法扭转经济急剧衰退的局面，美国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革命”相得益彰，并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及“萨伊定律”进行了几近全盘的否定。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解释并有效解决了如何走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危机，追随者将其奉为圭臬。然而，美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新型经济危机，即“滞胀”危机。在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巨大挑战后，两大学派最终脱颖而出：一个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后经继续发展分支出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个是由裘德·万尼斯基命名，以亚瑟·拉弗和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为代表人物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的正确性，主张在政策层面侧重供给侧的调节，实现了自从凯恩斯主义盛行后由供给学派复活“萨伊定律”对其的否定，构成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这一轮“供给侧”学派“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轨迹。

（二）第二轮“否定之否定”：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

“供给侧”学派的第二轮“否定之否定”实质上是从第一次回归到第二次回归。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一轮经济危机”之后，尽管在供给学派指导思想下宏观经济结构很大程度上得以优化，但直至里根政府第二任期结束，美国经济一直没有兑现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承诺，并且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供给学派逐渐丧失人心，引发了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虽仍然延续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但是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下，主要奉行的又是“逆风向”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主要从“需求侧”调节来刺激宏观经济增长。在“新经济”浪潮下，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仍然占据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直至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救市实践操作中实质上采用“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第二次回归。由此，又很快构成了“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

管理”这一轮“供给侧”学派“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表现。

三、对于“供给侧”学派的评价

对如上所述的“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探析其可以给予的启示、进而以反思启迪展望，必须建立在对“供给侧”学派发展的两大阶段（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作理性评价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于“萨伊定律”，可从逐一考察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其的批评，并结合李嘉图、穆勒、琼·罗宾逊和约翰·伊特韦尔对其的继承和发扬作出论述；而对于“供给学派”，鉴于其处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货币主义等其他学派共同质疑凯恩斯主义的“学说混战”时期，且最终落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需同时将其实践得失作为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上述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考察，我们发现在对“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作出综述时，也呈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供给学派”的评价大都从支持和追随的角度发声，而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其的评价又多以质疑和批判角度为主，带有较为明显的浪潮起伏变易色彩。我们试图将对其的评价摆脱“浪潮性”，力求提取对供给学派的理性认识。

（一）对“萨伊定律”的评价

1. 历史视角：重要的影响

19 世纪初，萨伊在著作《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论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尽管在书中并没有所谓“萨伊定律”或类似的定律性质的短语出现，但是经过李嘉图和穆勒的发展和总结，“萨伊定律”最终得以广为流传并对整个经济学思想史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虽然在历史上对“萨伊定律”给予否定之说不绝于耳，但是凯恩斯在持批评态度时仍然作了这样的表述，“从萨伊及李嘉图以来，经典学派都说：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这种学说不再以如此简陋形式在今日出现。不过它还是整个经典学派理论之骨干；没有它，整个经典学派理论就要崩溃”①。“在凯恩斯提出其宏观经济理论之前，主要的经济思想家所追随的，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都是古典的经济学观点……他们的分析都是围绕萨伊的市场定律（Say’s Law of Markets）展开的。”② 作为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保罗·萨缪尔森也对“萨伊定律”在整个经济学思

①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二章第 VI 节。

②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8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00 页。

想史中的奠基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由此可见，“萨伊定律”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历史角度看，“萨伊定律”提出的意义主要有三：第一，“萨伊定律”为早期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国际贸易的分析以及对商业周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均对萨伊的经济学认知给予了肯定与发扬。第二，“萨伊定律”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这一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严苛的学派和主义划分下，其实一直没有得以体现。从保罗·萨缪尔森对“供给学派”评价时只字未提“萨伊定律”来看，尽管“供给学派”的部分代表人物打着复活“萨伊定律”的旗号，但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此说法并不认同，或至少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坚持认为“萨伊定律”确实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确实与“萨伊定律”的观察视角和逻辑起点一致；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对“萨伊定律”的研究与剖析从未停止，尽管对其提炼出的认知看上去见仁见智，但是其启发性所引伸出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一直走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并接受着历史的动态评价。张五常在谈及“供给侧”学派时曾明确表示，“究竟谁是供给学派的开山鼻祖呢？我认为是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此君一八零三年提出足以历久传世的萨伊定律（Say’s Law）。这定律说：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不是浅学问，因为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我有一位朋友为之写了一整本书”①，并戏称自己无意中“创立了萨伊定律的最浅版本”。第三，“萨伊定律”开启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时代。亚当·斯密于英国地区开启了经济学时代，而萨伊则受其影响成为在欧洲大陆上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2. 批评之一：西斯蒙第对自由放任价值观的批评

西斯蒙第不仅对“萨伊定律”进行批评，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对亚当·斯密开辟的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批评。他认为，萨伊曾阐述的“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纵使有其利益”② 以及“萨伊定律”本身，都是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进行排斥的论证。而这种关于国家财富顺其自然的价值观，是西斯蒙第批评的靶心。他提出，“个人利益乃是一种强取的利益，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到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③，而自由放任的竞争会导致最终财富极度不公的恶果。

---

①张五常：《供给学派的阐释》，张五常搜狐官方微博，http：//zhangwuchang. blog. sohu. com/273305854. html。

②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99 页。

③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99 页。

3. 批评之二：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思想

与萨伊一派尤其是李嘉图对其的发展不同，马尔萨斯将需求管理思想引入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在当时的主流逻辑下，其思想基于对需求和供给的明确划分，这种划分恰是马尔萨斯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的重要桥梁。“一切交换价值取决于以这一商品易取那一商品的力量和愿望。由于采用了共同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用通常言语来说，社会就分成了买主和卖主两个方面。可以给需求下的一个定义是，购买的力量和愿望的结合；而供给的定义是，商品的生产和卖出商品的意向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以货币计的相对价值或其价格，就决定于对商品的相对需求和供给两者的对比关系。这个规律似乎具有充分普遍性，大概在价格变动的每一个实例中，都可以从以前影响供求情况变动的原因中找到线索。”① 基于需求和供给变动决定价格变动的思想，马尔萨斯继续对供需双方进行深入分析，尽管其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一对对立概念，但是他最终认为需求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方面。马尔萨斯的需求管理思想中，将需求划分为需求程度和需求强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概念，认为当供给与需求相等时所对应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以有效需求为核心，马尔萨斯认为在需求为有效需求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可以由生产的费用来决定；而在需求不等于有效需求时，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据此需求原理，马尔萨斯提出需求管理思想，“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②。这种以需求为核心的思想，实际上构成对萨伊一派注重供给思想的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关联于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凯恩斯后来举世瞩目地倡导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革命。

4. 批评之三：凯恩斯的条件性否定

“凯恩斯革命”后，对“萨伊定律”作了几近全盘的否定，从不隐讳声称自己师承马尔萨斯的凯恩斯，将马尔萨斯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认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这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③。与此同时，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中也有所保留。对此的理解，在中文版《通论》译者导读中，高鸿业教授特别指出，

①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3～44 页。

②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61～62 页。

③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出版说明第 1 页。

“从表面上看来，本书的基本内容似乎否定了萨依定律，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如此，而仅仅给萨依定律加上一个条件，即：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依定律是可以成立的”。对此的认识，有助于全面、辩证地理解“供给侧”学派历史上所受到的第一次否定。

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在评价“萨伊定律”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萨伊定律没有能够将货币经济与物物交换经济区别开来，从而导致了失败。他的论述是，“那么萨伊定律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货币经济与物物交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有能力购买工厂所能生产的任何产品）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① 而这种理论基础决定着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出现持久的生产过剩，因灵活的价格总能够将实际总支出量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匹配。

5. 批评之四：马克思关于“庸俗经济学”批评的考证与认识

（1）基于“劳动产品价值量”的批评涉及萨伊

考察马克思作出的关于“庸俗经济学”的评价及批判，首先有必要考证“庸俗经济学”的概念。尽管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依时间先后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为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这种区分其实也有可商榷之处，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实质上覆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进而在批判后冠之以“庸俗经济学”的名号。马克思在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 1 版）中正式提出“庸俗经济学”的说法，考证原文，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是在对劳动产品价值量分析的脚注中，“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评虽由李嘉图而涉及萨伊，但批评的内容与“供给侧”考察无关。

（2）对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

①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8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00 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一卷第 98 页。

而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批判了萨伊“三位一体”的公式，认为“庸俗经济学所作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庸俗经济学恰好对应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作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①。马克思对“三位一体”公式逐一进行了批判：“土地—地租”公式中没有价值而有使用价值的土地和拥有交换价值的地租，被设定在一种比例关系上；“资本—利息”公式掩盖了具有的价值与自身价值不相等的性质，应改为“资本—利润”来更好地揭示两者关系；“劳动—工资”这一公式则揭示了资本者认为“他为劳动支付了货币这一深刻见解……免除了理解价值的义务”。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的批评也与“供给侧”考察无关。

（3）基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872 年《资本论》（第二版）面世，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再次阐述了对“庸俗经济学”的思考，与正文中有针对性的学术批判有所不同，此次批判实际上是基于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的指向在于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我们认为，这里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明确地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两个阶段，实质上应当解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能够在阶级斗争不那么尖锐的“潜伏态”或掩盖阶级斗争的前提下，保持其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阶级斗争尚不尖锐或被掩盖，并不表示其不存在，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具有庸俗性质，而其是否明显表现出庸俗，则取决于阶级斗争是否尖锐与被掩盖的阶段。对于这种庸俗经济学的定论，是马克思源于唯物史观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历史上一个过渡发展阶段的认识而来。

总之，马克思以其特有的深刻性和鲜明的阶级立场，确实批评了古典学派与萨伊，

①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三卷第 925 页。

但上述批评所指，却均不在于“供给侧”的视角与逻辑起点。

（二）对“供给学派”的评价

1. 对“供给学派”的认识

按照美国《新闻周刊》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总结，“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阿瑟·拉弗、罗伯特·巴特莱、裘德·万尼斯基、克莱格·罗伯茨、理查德·蔡克豪瑟、罗伯特·霍尔、米切尔·博斯金、保尔·麦克福、罗伯特·门德尔、米切尔·伊文斯、托马斯·萨金特等。此外，当时居于政界的代言人有，80 年代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等。这一集学界、政界、新闻界等跨界组合而成的学派，虽然既没有同时代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体系所表现的那般系统化，也不似诸多学派具有相当一段时期的酝酿与发展，但是却实实在在对美国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以粗线条梳理，供给学派的主要逻辑和主张包括四大方面。若从细节看，则不难发现供给学派内部始终存在着以拉弗为代表的“主流供给学派”与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温和供给学派”之间的摩擦与纷争。

（1）“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如果用一条简要的逻辑线索对供给学派的认识进行概括，可以表述的是：经济增长—增加供给—增强刺激—利用减税—减少干预。沿此线索，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需求管理者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就业和产量，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供给学派与之截然不同，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的“滞涨”危机，根源就是忽视供给而一味强调需求。

第二，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从而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而低储蓄率的结果是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经济增长决定于供给，供给决定于刺激，刺激

决定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供给等等。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增加刺激最有效的手段，其刺激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减税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的结果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对于减税政策，供给学派更注重税率削减，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他们认为：高税率会严重挫伤劳动热情，缩减个人和企业储蓄能力，而储蓄减少将使利率上升；高利率同时会导致企业生产规模萎缩，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商品供给不足。如果加之扩大需求政策，则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从而进一步导致企业对生产高估因而抑制生产、使资本价格提高因而抑制投资。减税则能够刺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增加储蓄。

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一是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三是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

（2）“供给学派”的分歧

供给学派的内部分歧主要源于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之间的摩擦与纷争。基于此，学界对供给学派分歧的程度曾开展过热烈讨论，有论述称两者是决裂的，甚至未将费尔德斯坦划入供给学派当中，也有论述为两者一脉相承，理论思想并未见实质的区别。参阅国内外资料，尤其是立足于21 世纪对 20 世纪 80 年代热烈纷争的回顾，我们认为费尔德斯坦无疑是供给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但其在一些分支观点上的确与拉弗存在分歧，然而这并不是不同学派性质的决裂，而是在“大同、小异”下的摩擦与纷争。

两者思想中的共性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都认同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追求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第二，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特别强调和重视“供给侧”的作用，认为消费过多影响储蓄会削减经济增长的动力，且此原因导致美国经济爆发了“滞胀”危机，认为解决危机的良方是从供给侧着手；第三，都认同减税能够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带动经济增长，并对此进行了论证；第四，都采用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都更加侧重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然而，落到指导政策的应用理论方面，两人不同之处不少，并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论。第一，关于支持减税政策的相关理论。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认为税收收入不一定随税率上升而增加，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带来最大的收入。减税是增加供给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实行大规模减税可以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使生产和税收急剧增加，并开辟新税源，以此减少失业、增加生产、解决通胀问题，从而促使萧条转向繁荣。

费尔德斯坦在减税问题的细节上同拉弗有明显分歧，他并不是孤立地考察税收问题，而是将其置于众多影响经济的因素之中。费尔德斯坦甚至公开对拉弗提出批评，“早先有这种天真的拉弗曲线理论，认为减税将通过内部作用自行得到弥补，因此没有必要削减预算，现在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范围广泛和大体上规划周到的一揽子计划变动，它不仅要降低政府的开支，而且还要削减那些使私人部门的财力物力得不到有效使用的障碍”①。第二，对需求管理理论的可应用性的态度。在对需求管理理论的态度方面，拉弗以税收结构为基点，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对储蓄和投资的歧视，认为美国的税收结构利于消费而不利于投资，应当复活“萨伊定律”，肯定供给的重要地位，并对古典自由主义十分崇尚。而费尔德斯坦则认为，供给学派仅仅有能力使经济脱离低潮，即应对经济危机，却无法控制商业周期。供给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出现衰退和萧条，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仍将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对于货币政策。拉弗主张恢复金本位制，认为这才是反通货膨胀的根本政策。而费尔德斯坦则不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应当通过减缓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来抑制通货膨胀。

2. 学界对“供给学派”的批评

学界一般认为供给学派没有成形的理论体系，评价大都集中在“减税”这一核心政策主张上，且大都来自媒体评论人，论者甚至将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减税政策也一并纳入其中。此外，来自萨缪尔森、克鲁格曼、阿罗等经济学家的评论也比较碎片化，难与19世纪学界的思想交锋相提并论。若将学界对供给学派的批评进行归纳和总结，可知这些批评主要指向三个方面。

第一，减税的作用可以是刺激储蓄和投资，也可以是刺激闲暇和消费，其实际影响并不是确定的。事实上，当时的减税政策刺激美国需求膨胀，外贸逆差逐年扩大，并一方面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导致财政赤字迅速攀升进一步引发国家债务危机，而为了维持公债的有效性不得不维持高利率水平催使外贸进一步恶化，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美元信心危机。第二，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中，特别强调的对税率尤其是边际税率的削减，在实际操作中削弱了税收的累进性，造成主要给富人减税的政策效应，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主张则主要削减了社会福利开支，导致出现“劫贫济富”的后果。第三，侧重增加供给的思路导致总需求快速增长，成为通货膨胀率攀升的因素。

简要地说，三方面批评的前两项各有其道理，但主要是“减税”实施中“度”与“结构取向”的权衡问题，并不足以总体否定减税的必要性；第三项则主要是只见树木不见

①费尔南德斯：《一项没有仔细协调的预算政策》，《华尔街日报》1981年8月12日。

森林的管见，并不能成立。

3. 实践中“供给学派”的得失

虽然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将美国宏观经济推向预期的增长高度，但是仍然不可否认这种政策主张较有效地缓解了美国滞胀问题。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曾用铁腕顶住压力把名义利率提高到 20%以上，力求把通胀压下来。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这一招当然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但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故在理论圈内难获高度评价。1981 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里根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1981 年和 1986 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从 1982 年 12 月起，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至 1988 年 5 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65 个月，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 13.5%下降为不到 5%。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也由 1980 年的 23%上升到 1986 年的 25.2%。并且，这一时期也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经济”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 13382 亿美元，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拖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也表现为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和沉重压力。直至克林顿总统，还在指责里根的政策是“不计后果”。2000 年前后，美国供给学派一度表现得近乎“销声匿迹”。

另外，由于 1980 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的“大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特别是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进一步挤压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华盛顿共识”及其所鼓励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在若干年内顺风顺水。然而，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干预的主张也过了头，并最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很多政府都意识到应适当调低其目标债务水平，以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政府能够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以提高具有“自动平衡器”功能和“主动稳定器”效应的财政政策作用。

四、启示与展望

（一）两轮“否定之否定”发展规律给予的启示

在对“供给侧”学派演变与评价作出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其发展中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表现，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重要启示。第一，两轮“否定之否定”体现了“供给侧”的研究努力和其所形成的学派在实践中的曲折探索，及其内在的生命力，沿着“大萧条—滞胀—二战后危机—次贷危机”这一经济危机史的轨迹，历经一次否定，便迎来一次回归。第二，两轮“否定之否定”还包含了“供给侧”学派的理论思想在与人类社会实践互动中的螺旋式上升，沿着“萨伊定律—供给学派—供给管理”这一发展脉络，可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深化认识，更充分地把握理论发展的传承与创新，提炼其螺旋式上升最主要的内涵。

从“萨伊定律”到“供给学派”再到“供给管理”，一脉相承的思维逻辑起点是对“供给侧”的认识与重视。然而，“供给侧”学派三个阶段上的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第一，对政策功能的认识。萨伊式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认为供给能够创造相应的需求，不应当对其强加管束；发展到供给学派阶段，这一思想已带有宏观经济学的认知框架，上升为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起到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又发展到供给管理阶段，这一思想已带有制度经济学的色彩，上升为宏观调控中应当特别注重运用供给管理的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危机、优化制度供给、谋求长期发展。

第二，“供给侧”的研究内容。从萨伊到穆勒和李嘉图，古典自由主义对供给侧的研究尚停留在探析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研究的思路是围绕劳动、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最终归结到关于财富的分析；发展到供给学派时，尽管对供给管理的思路予以高度认同，但是管理内容已经开始步入对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及如何利用减少税收等思路来刺激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继续发展到供给管理阶段，对供给侧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于较为局限的手段研究，而是发展为更为全面、更有高度的制度安排及转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第三，诸家思想的融合。供给侧思想成果被“否定”后的回归，已体现在所提升的包容性。尽管里根经济学标榜与过去的需求管理决裂，但是如我们所述，这种在承认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大框架或基本背景下的“决裂”，实际上仍留存 19 世纪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的脉络与血统，成为一种随时代发展而趋于气度开阔的融合。发展到新千年后的供

给管理阶段，这种思想的融合不仅仅停留在究竟是“将供给管理融入需求管理”还是“将需求管理融入供给管理”的思考，而且涉及到管理的机制和手段究竟是停留在传统的理论经济学主流认识中，还是必须更多地回应和融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特定分类下的创新，以及两种管理的互补。思想的融合，是“供给侧”学派螺旋式上升认识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因此，“供给侧”学派经历两轮“否定之否定”可用来解释的经济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螺旋式上升，表明供给学派早已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当下我们所讨论的供给管理，也并不应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简单复辟。

（二）新供给经济学与“供给创造需求”新解读

沿着“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逻辑，21 世纪渐具形态的“供给管理”以美国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为例而影响可观，但实际上仍处于刚刚揭开序幕、方兴未艾之阶段。结合其发展给予的启示，特别是结合中国经济学人的已有探索，我们认为，“供给侧”学派未来的展望，应可立足于两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基础，派生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具有兼容并包与创新色彩的“新供给经济学”。

在近年的经济理论反思中，注重供给管理的新供给经济学，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诉求，同时始终把握“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全球眼光和历史视野，认为“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不可偏废一方，并将所受到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启迪与影响，一并纳入理论体系框架的“古今中西”大融合思想，标志着“供给侧”学派沿着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道实现理性回归与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所对接的是包容性、集大成的思想认识追求与开阔境界。对此，可强调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供给经济学的“求真务实”特征。所谓“求真务实”，即讲求实际、实事求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是与农耕文化有关在较早期便已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同时亦有“普世”特征，即这种求真务实思路与广泛存在的“问题导向”思维方式内在相关。直接从实践中总结，则这种务实特征的具体表现是，不遇到一定规模的经济危机压力因素，原来相对稳定的理论方向（倾向性主流）不会改变。每当危机到来时，如同实际生活提出问题，争相解决危机（问题）的过程，即是形成经济学新流派的过程。这一过程如同历史上朝代的更替、战争与和平的互换等，是与变化及其压力紧密结合的。经济学派的务实倾向会带来新一轮的头脑风暴、知识碰撞，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最新一轮供给侧学派的兴起，结缘于经济学理论已取得的基本成果所需要的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在

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作出警示？而经济学家自己的群体里面也有这样具体的看法，即人类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我们十分需要对经济学基于深刻反省、反思而有所创新和发展。新供给经济学，正是踏着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欧债危机的浪潮而产生的，并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带有十分明显的“求真务实”特征。

第二，新供给经济学“否定”的方式是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新供给经济学推崇供给管理，为“供给侧”经济学迎来又一轮形似复辟的浪潮，但是其由反思而否定的方式，决非摒弃需求管理，而是讲求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并纳入制度经济学成果等的兼收并蓄式的建设性开阔包容大融合。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了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失误确是不容回避的——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存在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西方代表经济学主流的教科书，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下，还是发展到“经济学”（或称理论经济学）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着与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间，实际上是跳出经济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找不到清楚依据的动作，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产生了足以影响全局的决定性作用。

在这一方面应具体指出，新供给经济学强调：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或可说源于萨伊的古典自由主义定律，并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予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第二，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在肯定其理论模型意义的基础上扬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与实践环境大相径庭的假设，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真实场景，以此为基础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第三，新供给经济学不认同简单退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减少干预的时代，而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强调市场、政府各有所为，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主体与两者的良性互动。第四，新供给经济学在基础理论层面，认为在“新经济”时代，应该以创新意识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可以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新供给经济学基于此还特别地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念，特别强调对制度供给的认识与重视，认为制度供给问题与供给能力的形成密切相关，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打通

“物”和“人”这两个都位于供给侧的分析视角，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联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这一系列思想观点，落实到中国的实践层面，就是要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由此可见，新供给经济学在总结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践操作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的“供给管理”，强调的并不是对“供给侧”与“需求侧”选边式的“复辟”，而是在肯定需求管理重要意义和实践贡献的基础上，加入对供给管理的重视与强调，并加入了在制度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对制度供给层面更具系统化特征的思考。回归到“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轨迹上，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理性供给管理对凯恩斯主义复辟实施的新一轮形式否定，毋宁说其否定的手段是兼收并蓄“大融合”框架下对供给侧理论观点的树立、强调与升华。

第三，新供给经济学赋予“复辟”浪潮的思想内核与创新色彩，是从基础理论到政策主张的贯通。不学原教旨极端学派动辄谈“主义”，也不似供给学派“打天下”树立复辟古典自由主义“萨伊定律”的旗号，新供给经济学立足于以发展的思路和升级的包容性，赋予“复辟”浪潮更鲜明的认知凝炼与思想结晶，赋予“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以新的解读。从供给侧角度讲，虽然需求是原生性的，但是供给侧升级换代的演变可以决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大的划分上，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后走到了蒸汽时代、电器时代、信息时代，这些都是在供给侧由不同的递进的升级换代形式所决定的时代划分，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同时伴随着供给侧的创新，而每一次供给侧的创新实际上又都直接提升着人类物质需求的满足度（图 3 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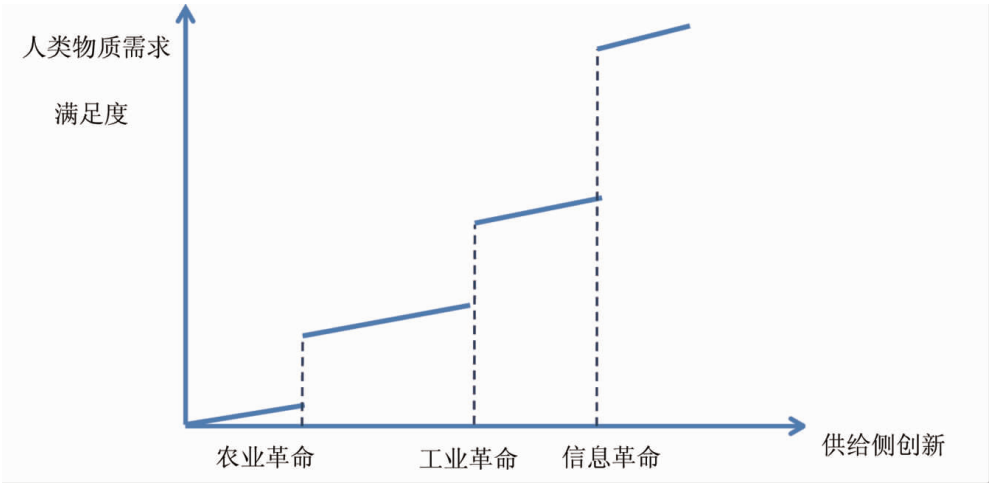


图 3　供给侧创新作用原理的量化表述（阶跃量化曲线）

表 1　供给侧视角的人类社会发展概况

时代特征	供给侧特征与突破（人与物）	制度特征与进展（人与人）
旧石器时代 （Paleolithic Period）	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	在洞或巢中混居、群居 （生成采集、狩猎的组织）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Period）	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 （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	氏族公社 （组织功能扩展至农耕等）
青铜器时代 （Bronze Age）	以青铜采冶业为标志 （犁铧、兵器）	国家出现、奴隶制
铁器时代 （Iron Age）	以铁制工具和武器的应用为标志	奴隶制社会加速瓦解，封建社会在欧洲成为主流，皇权、农奴与佃农；亚洲有中国或“东方专制主义社会”
蒸汽时代 （机器时代， the Age of Machines）	以机器的广泛应用（机械化）为标志 （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厂）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两大对立阶级；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主要内涵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资本主义国家加快殖民扩张和掠夺；世界市场初步形成；2000年帝制在中国被推翻。）
电气时代 （the Age of Electricity）	以电力的广泛应用（电气化）为标志 （电力、钢铁、化工、汽车、飞机等工业迅速发展，石油开始成为最重要的能源之一）	社会主义实验，资本主义调整
信息时代 （the Age of Information）	以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数字处理阶段、微机阶段、网络化阶段、大数据阶段，并正在走向人工智能阶段 （半导体、互联网、“智能化”……）	社会主义实验中的改革转轨，资本主义调整（“和平与发展”特点） 全球化＋新技术革命 （思考：信息时代下，对内，制度和治理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对外，全球化程度和世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注：该表格由作者创建；表中资料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基础理论层面，萨伊虽仅仅给出了一个供给侧的视角和论证并不精当的驱动—平衡认识，但却打开、启迪了后续的思想探索空间，供给侧在需求原生性之后的巨大能动性潜力，以及激发这些潜力在调控机制上的极高复杂性、挑战性，足以构成我们追求经济学原理的严谨对称、以及追求经济学发挥“经世济民”功用的激动人心的领域。放眼世界最近一二十年里，以美国硅谷引领新技术革命潮流所引出的在供给侧实现更新换代的实例。如，苹果产品和现在互联网概念上包括“互联网金融”这种带有颠覆性特征的供给创新，贯通着实实在在立足于人本主义立场的“用户体验”概念，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机制示范。智能手机、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等，特别强调的就是“用户体验”。虽然用户需求一直是有的，但是“用户体验”这种不同的、由供给带来的升级换代的感受，显然是在供给端发力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创新。比如，将过去认为需要有偿使用的产品变成无偿——现在互联网上很多服务的直观形式就是无偿；或是把过去看来非常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将摄影等专门技术发展为傻瓜相机，再发展为轻便手机的一键式操作。应当说，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命题的合理成分，在现实生活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所印证。我们当然永远不应否认需求的原生意义，有需求才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活动；我们当然也不是无条件地为一切供给唱赞歌，而是特别推崇有效供给及其伴随的创新驱动，一旦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化阶段，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由供给侧出发实现成功的“颠覆性创新”，那么市场上的回应是非常热烈的，一个产品可能迅速地风靡全球，并且给用户的感受确确实实带来了人本主义视角上常说的幸福感，乃至改变生活的习惯、节奏、格局与时代氛围。对于转轨国家，一旦把这种物的供给形式上的“后发优势”潜力插上制度供给优化人际关系进而加速腾飞的翅膀，“物”与“人”贯通的新供给经济学思维框架及其引出的政策主张，便有可能让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支持特定的超常规发展实践。显然，中国经济学人这方面已作的努力，是在回应时代召唤而把握特定经济体的发展机遇，并且这种努力的学理根基，深植于“否定之否定”轨迹所代表的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演进中对客观规律的不懈探求，进而可以绽放出其表现为改革思路与政策主张的鲜活花朵。

参考文献：

1.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2. 贾康、苏京春：《新供给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

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

4. 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商务

印书馆 1979 年版。

5.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6.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7.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8.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8 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年版。

9. 斯坦利·L·恩格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0. 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1. 保罗·克雷·罗伯茨：《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12. 吴敬琏、丁守和、付利：《经济思想家丛书：马尔萨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13. 吴敬琏、丁守和、黄进：《经济思想家丛书：李嘉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14. 吴敬琏、丁守和、李志平：《经济思想家丛书：穆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15. 吴敬琏、丁守和、吕静：《经济思想家丛书：马歇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16.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7. 贾康、江旭东：《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加强供给管理——论财政政策促进供求关系中长期均衡和国民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思路》，《财政研究》1999 年第 3 期。

18. 葛奇：《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社会科学》1980 年第 3 期。

19. 唐岳驹：《费尔德斯坦及其“供给学派”经济理论》，《经济科学》1982 年第 3 期。

20. 周寿萱、杜修平：《简析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的历史更替》，《晋阳学刊》1983 年第 1 期。

21. 杨鲁军：《关于供给学派的几点评论》，《世界经济文汇》1983 年第 4 期。

22. 李五四、孔祥琯：《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凯恩斯主义之兴衰》，《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6 期。

23. 张翠玉：《介绍美国新兴供给经济学》，《黑龙江财专学报》1986 年第 7 期。

24. 杨德明：《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瞭望》1987 年第 48 期。

25. 杨林枫：《费尔德斯坦与供给经济学派》，《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5 期。

26. 陈维辰：《论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北京轻工业学院学报》1987 年第 7 期。

27. 范家骧、高天虹：《供给学派（上）》，《经济纵横》1987 年第 3 期。

28. 范家骧、高天虹：《供给学派（下）》，《经济纵横》1987 年第 5 期。

29. 郭熙保：《从需求经济学到供给经济学——供给学派述评》，《湖南社会科学》1989 年第 10 期。

30. 曹坤华：《关于供给学派的几个理论问题——与杨鲁军同志商榷》，《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1990 年第 3 期。

31. M·马歇尔、P·阿里斯蒂斯:《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学》,《世界经济文汇》1991 年第 3 期。

32. 丁一凡:《论 80 年代欧美的自由化浪潮及其新走向》,《欧洲》1993 年第 5 期。

33. 吴先明:《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经济学动态》1997 年第 10 期。

34. 傅学良:《现代西方经济思潮的发展与变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

35. 张弥:《国内外供给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比较》,《财经问题研究》1999 年第 4 期。

36. 马焕明:《归去来兮凯恩斯——“凯恩斯主义”盛衰演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关系初探》,《史学集刊》1999 年第 8 期。

37. 李义平:《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宏观经济管理的两种模式及其理论基础》,《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第 12 期。

38. 郑秉文:《20 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

39. 滕泰、冯磊:《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中国证券报》2013 年 5 月 27 日。

40.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or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2001, Part One: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责任编辑:李　蕊

编者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2015－2016）”于2015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为主题，就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期刊出杨伟民、张宇燕、刘世锦、张晓强、陈晓华、冯飞六位专家在年会上的发言。

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杨伟民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不仅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更重要的是对结构性改革作出了重点部署，会议的主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从形势判断、问题诊断、工作思路、重点任务、改革措施、重大原则等方面，提出了逻辑严谨、系统完整、方向明确、操作性强的结构性改革一揽子方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思想方法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对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对“十三五”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有重大指导意义；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世界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做什么四方面谈谈对此的学习体会。

一、为什么

去年总书记就讲过，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了，经济工作也要有新常态。对新常态怎么看、怎么办，今年经济工作会又做了进一步阐述。怎么看？要做到“三个必须”。第一，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新常态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

互作用所决定的大趋势，是发展到现在必然经历的发展规律。第二，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这些困难和挑战是绕不过去的。第三，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克服这些困难、闯过关口，就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这就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

在新常态下怎么干？也就是如何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主要是“十个更加注重”。每一个“更加注重”，都是坚持问题导向和原因导向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比如第二个“更加注重”，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增长下行压力、投资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跌、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入下滑、房地产库存高企、各类风险增多等是病症。病根是什么？经济工作会的诊断是：深刻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供给侧矛盾就是经济下行等病症，已经不是周期性的下行了，已经主要不是总需求问题了，病根主要在供给侧。这种情况下，仅扩大需求，不改善供给，从长期看，很难阻止经济下行，特别是企业效益下滑。

结构性矛盾就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存在大量无效供给，而有效供给不足，存在不少短板，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效供给占用了有限资源。新增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借新还旧、偿还利息，投向中期回报率不高的项目，流向虚拟经济，间接抬高实体经济的财务成本，还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泡沫化，实体经济与金融失衡等结构性问题。

体制性矛盾根本原因是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资源优化配置存在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现行体制下，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很难按市场化原则自然出清，地方政府、银行都不愿意，各有各的小道理。但是，小道理淹没了大道理。

二、是什么

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对象、政策手段三个方面。

第一，政策目标。就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率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经济发展，扩大需求换来的若是没有效率的增长，不是经济发展。

第二，政策对象。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有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内部要素配置及组合。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精神，靠企业科学管理实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包干，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组合方式，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产出就提高了。现在提出的深化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国企的效率。二是企业间

要素配置结构。就是资源更多配置到优质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全社会的效率才会提高。上世纪 90 年代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解决的就是企业间资源配置问题。相反，如果要素被僵尸企业长期占用，甚至劣币驱逐良币，就是要素在企业间错配。三是产业间要素配置结构。这就是通常说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更多流向有需求的、有前途、效益高的产业和经济形态，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从传统业态流向新型业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其实就是最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

第三，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和扩大需求的政策有所不同，主要不是扩大投资、扩大财政支出、扩大货币发行。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主要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激励创新、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减少政府不当干预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降低电力价格，需要改革电力体制。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要改革财税体制和养老保险体制等等。

三、怎么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第一，宏观政策稳，才能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经济运行是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为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不变，但重点和力度要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这与过去有所不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通过这样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总需求适度增长，为结构性改革奠定宏观基础。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扩大内需。

第二，产业政策准，才能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产业政策要准，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过去的产业政策，不是政府替代企业决策和选择产业，主要是指明大的结构性方向，如实体与虚拟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存量与增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住房制度中购房和租房的关系等。具体的投资机会要由企业家和各类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产业政策要从政府指定发展什么产业，转向功能性，为企业在市场中发现新

的增长点创造条件。

第三，微观政策活，才能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作用于微观，而不是作用于宏观。对企业即生产者，政府要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这样，才能改善企业市场预期，企业才有信心。对消费者，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使有效供给能顺畅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第四，改革政策实，才能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我们已经推出了不少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下一步必须在“实”字上下功夫。一方面改革方案本身要实、符合实际、直接落地，不要都层层制定方案，以文件落实文件。另一方面方案的落地要实，破除顶层设计与实际落实之间的肠梗阻，使改革在微观层面见到实效。

第五，社会政策托底，才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的社会环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必然带来一些阵痛，涉及部分群体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然要过的坎，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两个基本，也就是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现在的就业形势、财力规模、保障制度同上世纪 90 年代不同了，有了很大进步，虽然这次可能会有阵痛，但我相信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四、做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但不能因为是持久战，当前就不干，所以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打歼灭战，明年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有些产品，价格再怎么下降，消费总量也不会扩大了。如钢铁、煤炭，价格一直在下降，但消费总量却在减少，去年煤炭消费总量减少 4% 左右，预计今年粗钢消费总量减少 4%以上。根本原因是产能过大，僵尸企业没有及时市场出清。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扩大投资解决不了问题，长此以往，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实现市场出清，去产能，使产能和消费大体均衡，止住价格下跌，让优质企业看到希望、增强信心。处置的方针是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要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在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专项奖补、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支持。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是五中全会确定的50个新举措之一。我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很多方面的成本偏高，呈现“未富先高”。必须从全球视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来认识这一问题，我国创新力在增强，但还不足以弥补成本快速上升的竞争力减弱，要尽量保持和延长竞争优势，必须下决心降成本。否则，长期下去，很多企业会被高成本压垮。企业没有盈利，一两年也许能抗下去，三四年后就撑不下去了。所以要一手去产能，一手降成本，微观主体有活力了，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明年要实行“七降”，在七个方面帮助企业降成本。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现在的房地产库存，相对于现有户籍人口也许是多了，但相对于加上2.5亿非户籍人口而言就不多了。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不鼓励、甚至限制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购房和租房。所以中央确定在两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是以户籍人口为主要方向、以鼓励购买为主要方向。这次的住房制度改革，要以满足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对有能力直接买房的，仍支持包括非户籍人口在内的城镇居民购买产权房，对一时买不起的，支持他们先租房，对难以承受市场化房租的、符合条件的，给予租金补贴，这就是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为此，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建立多元主体的“房东”，让他们买房子、然后出租，这就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这就是补短板。什么是短板，从不同收入群体看，短板是农村贫困人口；从产业看，现代农业是短板，新兴产业是短板；从产品看，生态产品是短板；从产品质量看，高品质产品是短板；从资本看，相对于物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短板等等。所以，要提高投资的针对性、有效性，针对短板投资。包括打好脱贫攻坚战，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培育发展新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中的短板。在化解过剩产能和技术变化加快的形势下，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底线！在结构性改革中，一些风险点会暴露，但掩盖不是根本之策。所以，既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也要对信用违约依法处置。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做好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对金融风险，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

抓好五大任务，要有两方面的保障。一是改革保障，要重点推进对结构性改革有重大意义的国企、财税、金融“三大改革”，以及具有兜底作用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推出一批对“三去一降一补”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二是政治保障，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做到“三个坚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尤其是企业家、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作者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艾　冰

行进在礁石和浅滩中的全球经济

张宇燕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概括来说就是“四低一高”。所谓“四低”，一是经济增长率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只有 3.1%，低于 2014 年的 3.4%。二是贸易增长率低。世界贸易组织（WTO）在 2015 年年中估计全年全球贸易增长不足 3%。现在看来，这个估计值也很难实现。若按美元计价，因其大幅升值全球贸易增速可能会超过 -10%。三是通货膨胀率低。七国集团 2015 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只有加拿大达到 1.2%，剩下的六个西方主要经济体都在 1%以下，最新数据显示欧美的通胀率都徘徊在 0.1%～0.2%。四是大宗商品价格低。在过去的 18 个月之内，石油价格降低了 70%，这在最近 30 多年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一高”是指高债务。目前人类恐怕是处于历史上债务水平最高的时期。根据麦肯锡公司估计，2014 年世界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居民债务、企业债务，已接近 200 万亿美元，而全球生产总值（GDP）只有 70 多万亿美元，债务和 GDP 之比达到了 280%。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 2007 年—2014 年这七年间，全球债务净增 57 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净增八万亿美元，可以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2015 年还有三个全球经济变量值得我们特别关注。首先是就业。发达国家就业状况普遍在改善，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 5%，欧元区的失业率比 2014 年降了大概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常年维持在 11%～12%高位的欧洲能做到这点实属不易。其次是投资。2014 年

全球投资增长率为－16%，收缩幅度非常大。2015 年预计增长 11%，但是现在看来难以实现。即使 2015 年全球直接投资增长了 11%也仅仅达到 1.4 万亿美元，与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超过 1.9 万亿美元的规模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第三是金融。2015 年从股市、利率、汇率几个角度看全球金融形势，我们发现金融市场上的联动效应异常明显。2015 年 8 月中国股市出现波动，纽约股市随即下跌 5%，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暴跌 10%。2015 年发生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美联储决定加息。尽管联邦基金利率仅仅上调了 0.25 个百分点，但其对全球金融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因为它会引起资产重新定价。从某种意义上讲，2015 年汇率变动频繁且幅度超大，就是对美国加息或加息预期的回应。一年之中，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 30%多。美国加息后，阿根廷、阿塞拜疆的汇率急剧下浮，贬值均超过 40%。顺带指出一点，即使美联储加息，全球利率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伦敦同业银行间半年期实际利率在过去三年都是负的。长期超低利率构成了高债务的基本原因。

思考 2016 年全球经济的走势，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关注：

第一，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增加。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美联储加息的速度、时间以及力度。现在对美联储政策走势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认为 2016 年就可能加息至 3%，明后年再到 4.5%；也有人说此次升息只是为了兑现升息诺言，捍卫美联储声誉，而非真要完成货币政策向常态复归。

第二，超低利率。利率非常低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美联储加息的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连续多年的超低利率导致了债务的迅速积累。超低利率再加上低通货膨胀、低增长、高负债，最终形成了一个“有毒组合”。这种组合是不可持续的，迟早要垮塌。国际清算银行 2015 年 6 月发表报告，对目前这种超低利率政策尤其是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表示深深的忧虑，称各国央行已经把自己逼入困境，其政策使金融市场大起大落、调整推迟、增长乏力、债台高筑，同时还导致资源错配，让资金流到了资产市场而非实体部门。

第三，全球资产泡沫处在积聚形成过程之中。2015 年 4 月的数据显示，全球股市市值为 75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股市市值，当时只有 64 万亿美元。由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发布的住宅市场指数数据显示，2015 年 10 月的房价是过去十年中的最高点。欧洲，特别是英国，房地产价格上涨亦十分明显。

第四，金融体系内部的脆弱性开始凸显。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2015 年 10 月全球影子银行的规模占到了全球 GDP 的 128%，仅比金融危机爆发前影子银行规模占当时 GDP 的比重低两个百分点。在全部影子银行中，发达国家占了 80%。其中，高风险的有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少受监管的影子银行

规模扩大、追逐高回报的风险投资增多，势必提升金融系统风险。

第五，发达国家潜在增长率前景黯淡。2015 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尚可，从 2014 年的 1.8%提高到了 2.0%。应该说发达国家的这种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需求管理、靠超低利率来实现的，而长期增长要素难以支撑这一增长。美国劳动力的供给未来五年增长只有 0.2%。欧洲、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已非常明显，并且速度还在加快。更严重的是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甚低。据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计算，过去三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几乎是零。在没有大规模技术进步、技术突破的前提下，发达国家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困难重重。

第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入增长减速通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连续五年增速一路下滑，从 2010 年的 7.5%降至 2015 年的 4%。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将逐步放缓并将延续一段时间，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信贷周期、投资周期、改革周期、贸易开放周期等几大周期同时结束。IMF 在 2015 年的一份报告中专门讲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面临五大风险，涉及与政府监管和产权保护密切关联的制度、人口结构、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宏观政策因素等。

我们认为，在不发生大规模且传染性很强的金融危机的前提下，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 3%，略低于 2015 年的增速；不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为 80%，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长的增速还将因危机的规模和传染性强弱而进一步放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李　蕊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

刘世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了明确定义，我的理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推动要素市场流动，重新优化组合，校正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产

业升级来讲，就是要解决三个问题：即退出一批，优化一批，升级一批。

第一，退出一批。即去产能。我认为，产能问题既有结构的问题，也有体制的问题。比如，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这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大概是 400 元，每吨销售 200 元，生产一吨煤亏损大约 200 元。我就问他能不能不生产，他说必须生产。为什么？因为一万多职工在企业，不生产不行；另外银行不答应，银行借了很多钱给企业，现在企业关门，银行不良资产率太高。另外，中国最近几年面临大调整的产业，除了重化工，另一个领域就是外贸出口。过去我们的出口每年增长高达 20%、甚至 30%，今年却降到了负增长。我们听到很多工厂关闭、有些企业家跑了，实际上这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也是去产能的问题。还有很多是体制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国企改革方向，这个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支持前瞻性的产业，支持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安全。问题是怎么来实行？我认为以下三个案例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个案例就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它提供公共产品，它的收益率将近 10%，对金融机构来讲，收益率不算低。第二个案例就是大飞机公司，大飞机在中国有广泛的市场需求，把这个公司做好，能带动中国一大批产业的升级。第三个案例就是深圳华兴光电——一家生产面板的企业，搞得不错！在它的初创期，深圳市政府投资了 50%，企业做起来以后，深圳市政府逐步退出。我觉得这是国有资本应该干的事。在产能过剩的行业，国有资本应该退出。退出来的钱搞社保基金，用来解决这些领域内企业关闭重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优化一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降成本，我们的物流成本、融资成本、通讯成本高，原因在哪？就是有些基础行业还存在着行政性垄断。怎么办？需要放开准入，鼓励竞争，降低成本。拿电信行业做个案例？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小岛考察访问，一下飞机，看到三个电信运营商。小岛多少人口？80 万。克强总理要求我国电信行业降资费，最近电信业采取了一些降资费行动，但是现在人们还是有担心。担心什么？因为是总理让他们降价，而不是他们自己要降。如果有充分的竞争以后，电信公司自己要降价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一直建议，电信行业以国有资本为主，民营资本也参与竞争，看成本能不能降下来，降成本仍然存在于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行业，这个改革要往前推进。前一段搞改革，主要是小微企业，注册制的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若垄断性行业的改革能往前推进，才能真正凸显我们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第三，升级一批。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日本的案例。过去 50 年代至 6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加速折旧。通过加速折旧，日本社会的通讯改革速度很快。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转变，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能不能做点文

章，因为加速折旧，实际上相当于减税，但是它比一般的减税好，好在鼓励企业技术档次的提升，扩大了投资的需求，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推动技术进步，又扩大了投资的需求，可以说是一箭多雕，通过这个方法推进转型升级。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艾　冰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工作

张晓强

2015 年 9 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总体要求和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十方面任务。文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更加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开放等五大发展理念，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开放工作提出了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六方面任务。根据上述精神，我重点谈一下“国际产能与设备制造合作”。这也是“构建新体制”“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新举措。

具体讲三点：第一，这是适应结构调整迫切需要，通过开拓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资源全球优化配置。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多种工业产品发展居世界之首，若干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包括钢铁、建材、光伏发电设备等。同时，我们具有工程技术、性价比、建设工期等方面比较优势。例如，我们不仅是火电装机世界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火电煤耗和排放最低的 60 万、百万千瓦超临界机组也是我国自己干成的。又如 2015 年 10 月 19 日，中方与印尼签署了长度 150 公里的雅万高铁协议，在竞标过程中，日本方面曾提出，中方承诺三年建成是吹牛。我们告诉各方，全长 1300 多公里的京沪高铁，我们只用了三年半就优质建成了！

第二，这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发展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快速发展。通过国际产能和设备制造合作，可以使资金、工程建设与设备产能有机结合，更充分发挥综合竞争力。例如，我国铁路、港口、公路的建设能力与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但在一段时间内，很多工程公司在“走出去”时单一地强调在工程建设方面的能力，但对投融资、建成后可持续运营则重视不够。对外先草签了工程承包合同，然后倒逼国内有关部门去协调解决投融资来源。今后，则要积极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及设备制造等多方式合作，使我国“走出去”迈上新台阶。

第三，这是深化我国与多国互利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有效措施。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总体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巨大需求，但也更重视本国产业水平提升，资源本地深加工和增加本国就业。推进国际产能与设备制造合作，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为主要方向，并将更充分考虑所在国的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为当地发展创造更良好的基础，切实体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深化南南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强调与具备条件的国家，包括法、英、美等发达国家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架构，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例如，中法已签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协议。在 2015 年 9 月第七轮中美“二轨”对话举行前，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美方代表，对发展双边经济关系，他提出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进投资合作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等重点，美方代表反应很积极。这样干，既可以缓解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拼力竞争的局面，向着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方向发展，也能为推进南北合作拓宽空间。

开展国际产能与设备合作刚刚起步，要有效实施还要下大功夫。例如，政府的引导服务水平需要提高，对外合作的机制与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一些企业存在盲目性、一哄而起，有的企业对尊重当地文化、宗教、资源节约与保护环境等不重视，存在无序和恶性竞争的个别现象。这需要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注重实效、互利共赢、积极稳妥、防控风险的原则。通过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使国际产能与设备制造合作健康发展，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支柱。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艾　冰

着力发展现代农业

陈晓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现代农业要取得明显进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求，把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提出农业要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道路。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就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农业现代化作了全面部署，农业现代化的进军号已经吹响。

回顾“十二五”，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农业综合生产有了显著提高。粮食连续 12 年增产，近几年稳定在 12000 斤以上，可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二是农业技术装备水平有了新提升。农业的科技贡献率、综合机械化率和灌溉面积占比已分别达到 56%、61%、52%。三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了新变化。现在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已超过 250 万家，无论种植业还是养殖业，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四是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2015 年农民收入有望突破万元大关，增幅连续六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城乡差距在逐渐缩小。农业农村的好形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当然，现代农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还有很多，农业基础薄弱、质量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等还很突出，农业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是短板和弱项。

中国已经进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从农业发展情况来看，重要的是要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十三五”农业发展要坚持一个目标，围绕一条主线，突出一个中心，实现六个全面提升。一个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现代农业取得明显进展。一条主线，是要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由过去数量增长为主转为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由过去主要通过要素投入转为依靠科技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由过去拼资源消耗转为可持续发展，这些转变具有革命性。一个中心，是要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而言，要继续保持一个翻番、两个高于，即农民收入翻番和农民收入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六个全面提升包括：一是全面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应水平，不追求每年数量都增长，而把重点放在巩固和提升产能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二是全面提升农业技术装备水平，首要是抓科技创新，抓农机装备升级；三是全面提升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核心是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四是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证人民群

众的消费安全，我们将它摆在“十三五”的突出位置；五是全面提升农业的经营效益水平，农业效益低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既是农业发展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六是全面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概括起来讲就是要一控两减三基本，一控是控制用水总量，两减是减化肥、减农药，到 2020 年要做到零增长，这样才能节本增效，才能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安全，三基本是通过资源化利用的办法从根本解决畜禽废弃物污染处理问题、地膜回收问题、秸秆焚烧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从而构建起现代农业的支撑框架。

（作者为中国农业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　蕊

关于《中国制造 2025》的两点认识

冯　飞

《中国制造 2025》从 2015 年 5 月开始正式实施，得到社会特别是企业界的积极反响和行动，对此我有两点认识。

第一，《中国制造 2025》的魂是什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型工业化国家又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甚至有些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德国提出工业 4.0；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并着力发展工业互联网；韩国提出制造业革新 3.0；英国制造 2050 是对未来 35 年的发展勾画，比中国还要长远一些；法国提出新工业法国，明确了 34 个领域。实际上，从这些国家的战略思路来看，都聚焦在一点，就是把互联网技术和制造技术更紧密地结合。

《中国制造 2025》的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把互联网技术和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提升效率，注重的不是成本下降，而是效率提升，既包括经济效率，也包括能源及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预示着规模化定制时代的到来，从而可能带来生产方式的

深刻变革；三是提高即时性，对市场有快速反应能力，可以创造发展的新空间。各国的战略意图或者说重点领域有所差别。美国的互联网服务，特别是围绕制造业的服务能力非常强，其目标是以软带硬。德国工业 4.0 的重要领域是以硬带软，欧洲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相对美国，甚至相对中国而言发展差一点，比如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互联网企业当中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因此，欧盟提出数字欧盟统一市场的概念来补课。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大国，2010 年就夺得了制造业全球第一的头衔，这是在 150 年之后，中国又重新回到制造业第一的大国位置，当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 19.3%。中国怎么充分利用制造大国的优势，利用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软和硬同时推进，硬的方面尽管规模大，但是创新能力、基础能力还存在比较大的缺陷，我想《中国制造 2025》的魂就是将互联网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起来，形成发展的新动能，使中国制造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二，从各国竞争的制高点来看，基于平台的标准化可能是全球争夺的一个重要领域，当然这里面既有竞争，也有合作。比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 4.0，基本上都是在建立一个平台来制定规则、标准，这就意味着工业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颠覆性变化。如统治工业领域很多年的工业总线标准，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是基于 IP（网络之间互连的协议）的，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在制高点竞争当中，中国有优势也有劣势。就劣势而言，美国主导这项工作的是通用电气，德国在主导的是西门子、萨普等全球性公司，而我们缺乏这样的巨型公司，从装备制造到工业互联网开发一体化的公司，我们必须要走联合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推动建立智能制造联盟，以解决竞争中的先天不足问题。

《中国制造 2025》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实现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再是简单依靠规模扩张、技术拿来主义这样的方式。主要是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解决产业技术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制造 2025》五大工程中，要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特别是围绕高端战略性共性技术，解决其供给机制问题；二是解决基础能力的问题，虽然我们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但是很多的基础，比如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关键工艺技术，还没有夯实，在《中国制造 2025》中，要继续实施工业强基工程；三是解决绿色发展的问题，目前工业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 70%左右，工业可持续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我们在清洁生产、再循环经济、能效方面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绿色制造。

（作者为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李　蕊

“一带一路”战略风险评估及应对建议

魏琪嘉　肖宏伟

摘要：“一带一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创新，但也面临波云诡谲的风险；是一项举世瞩目的系统工程，但也面临错综复杂的挑战。在描绘了美好蓝图的同时，“一带一路”也遭遇到现实的尴尬。“秩序之争”“格局之争”的杂音甚嚣尘上，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国家关系莫可名状。在全球政治、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推动该战略落地，认清风险并做好防范是需要得到高度关注的。直面风险、未雨绸缪，“一带一路”才能顺利推进，才能真正成为一条繁荣之路、亲善之路、交流之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　风险防范　建议

作者简介：魏琪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肖宏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一、“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风险问题

“一带一路”是开放合作的产物，战略机遇不言而喻。然而，机遇从来都是和挑战并存的，针对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风险，如地缘政治风险、投资安全风险、国内相关的管理风险以及潜在的债务隐患，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很有可能因其中个别的风险而导致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的结局。

（一）地缘政治波云诡谲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是各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区域。沿途各国的战略判断及其政策立场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1. 美、日刻意的战略挤压。“一带一路”与美国“新丝绸之路”具有潜在竞争关系，对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构成现实挑战，与美、日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形成战略冲突。美日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抹黑”“唱衰”“分化”“干扰”存在必然性，其进行战略排挤的手段可通过“五个利用”来进行：利用与沿线国家的特殊关系怂恿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搅局；利用我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主权争端，挑唆有关国家制造事端；利用沿途部分国家的国内反对派搞“二次革命”，破坏和平稳定从而制造障碍；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劳工标准等，诋毁攻击“一带一路”战略；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中国展开竞争。

2. 俄、印客观的战略疑虑。俄罗斯、印度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国家，在已经意识到该战略对推动其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对“一带一路”战略存在诸多疑虑。从俄罗斯方面看，担心“一带一路”分化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担心“一带一路”干扰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是俄罗斯主要的战略疑虑。从印度方面看，“一带一路”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中巴经济走廊，增强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走廊一旦建成，印度通过笼络阿富汗制约巴基斯坦的努力或将付诸东流。担心被中国包围、担心南亚地区现有的平衡被打破是印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疑虑。俄、印这种担忧自身地缘政治格局因经济格局变化而被改变的心态，很有可能对其现有的合作立场造成负面影响。

3. 中亚、西亚国家被动的战略摇摆。目前，中亚、西亚国家对“一带一路”普遍持欢迎态度，其战略目的是通过融入“一带一路”繁荣本地区经济，从而摆脱俄、美、欧对该地区的战略控制。但是，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定力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一方面，政治风险影响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定力。中亚、西亚国家正进入政治风险上升期，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大选对政治稳定性是一场严峻考验，反对派实力大、对现任政府冲击力强是客观事实，“一带一路”战略面临在这些国家被搁置的风险。另一方面，安全风险可能使这些国家无暇他顾。地区种族、民族、宗教等问题相互混杂、交织联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极有可能抵消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积极性。

（二）投资安全存在诸多隐患

如果说地缘政治风险尚且只是“肘腋之患”，具体而又复杂的投资风险则可能是真正的“心腹之忧”。项目投资是“一带一路”落地的支撑，资金、法律是衡量投资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 60 余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千差万别，支撑“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进行，保障投

资安全是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1. 资金来源不确定性强。以安全的方式为项目建设融资是“一带一路”顺利建设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发展意愿虽然强烈，但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据亚行估算，“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需 8000 亿美元。仅依靠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不可能弥补如此大的资金缺口。显然，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掣肘，单一的投融资模式也难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

2. 法律、法规风险影响投资安全。首先，是法律、法规的一致性问题。沿途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这些国家有关法律、政策不受 WTO 法律制度的约束，其许多法律法规、政策与 WTO 要求不一致，在通关程序、技术输出、技术引进、反倾销政策方面存在壁垒。其次，是法律、法规的完善性问题。有些国家缺乏立法基础与条件，人治多于法治，执法机制不健全，依法合规难度大，存在利益寻租空间。在法律不健全的背景下，外国投资可能被强制国有化，基础设施或厂房受到战争破坏而无人承担相应责任，部分国家可能出现主权信用违约。最后，是法律、法规的连续性问题。沿线国家极有可能为了维护本国产业安全，不断调整相关法律政策，政策的反复变动对于市场化投资势必造成影响。例如，蒙古国 2000 年—2010 年数次对其《矿产法》进行反复修订和调整，导致中国对蒙矿业投资多次出现波动。

（三）一拥而上易引发争抢资源

从国内的角度看，在国内经济减速换挡之际，各省市寄希望于“一带一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的愿望非常迫切（数据显示，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重庆、云南、四川等 17 个省区市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列入了 2014 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这 17 个省市经济规模之和占全国比重高达 56%）。但一方面是迫切的发展愿望，另一方面却是有限的发展资源，在政绩考核机制尚未完全调整到位之时，应谨防各地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出现“一拥而上”的局面。

1. 抢“定位”。为凸显本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性，“起始点”“桥头堡”“战略支点”被很多省份用来形容自己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争抢定位更多是基于提升知名度的考虑，背后缺少坚实的机制支撑，也缺乏对自身优劣势的准确分析。将本省资源与沿途国家的产业结构、市场容量、产业升级趋势做好对接，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

力，才是各省在融入“一带一路”中应该着重考虑的战略性问题。

2. 抢“项目”。实地调研中发现，不少省市在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上稍显狭隘，认为“一带一路”就是项目建设，就是项目投资，只要能上几个“大工程”“大项目”，就是成功地融入了“一带一路”战略。显然，这种思维模式没有突破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各级政府应该意识到，中国通过项目建设推动战略落地，更重要的是为了拓展中国资本和技术的世界影响力，而贯彻这一战略的主体是企业，但中坚力量是地方政府。项目即便被争取过来，如果缺少配套，缺少切合实际的规划，仅仅依赖“体制内”的能量来开创“一带一路”新局面难度很大。

（四）债务风险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在国内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之际，利用传统融资模式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将推高负债水平。然而，现阶段采用的债务置换模式对存量债务进行展期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风险。

1. 国内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根据证券时报网 2015 年 3 月 29 日刊登的《2015 一带一路拉动投资规模或达 4000 亿》文章内容显示，各地方“一带一路”拟建、在建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约为 1.04 万亿，以 2～4 年为项目建设周期，平均每年投资金额在 3000 亿左右。然而，中国目前的社会负债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麦肯锡 2015 年报告估算，2014 年底中国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家庭个人负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8 倍。与高负债形成对比的是，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2014 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以 8.6%的速度创下 23 年来的新低，首次进入到个位数区间。在此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加基础设施等投融资，应慎之又慎，对项目进行充分评估，对融资渠道和成本收益做充分规划，防止因推进项目建设而推高债务水平，从而引发社会债务危机。

2. 债务置换不当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通过信托公司等金融中介置换政府债务，信托公司以项目融资者身份在资本市场以较高利率进行项目融资。这种置换方式，固然是调动了金融机构参与置换债务的积极性，但是本质上仍然有“拆东墙补西墙”的隐忧，实质是将债务进行变相展期，延长债务链条，未来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很容易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产生风险的原因分析

风险产生存在客观的原因。分析这些原因，并不是畏惧风险，而是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一）大国角逐使区域局势复杂化

美国重返亚太，使得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局势复杂化。在此背景下，亚太地缘格局以及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概率增大；美、俄在中东地区角力，叙利亚问题日趋复杂，欧盟也被牵扯进来，整个中东、中亚的局势晦暗不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对中国外贸影响程度尚需仔细评估。地区的复杂局势给安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妥善处理与地区内各国的关系，减少分歧、求同存异，难度不小，不可控因素较多，风险不容小视。

（二）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管理制度各不相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客观存在。从法律方面看，沿线国家涵盖了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阿拉伯法系、印度法系等不同类别的法律体系；从技术标准看，有欧式标准，也有美式标准；从管理制度看，各国在投资、外资管理方面规定各不相同，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

（三）全球经济不景气可能导致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首先，受发达国家复苏步伐缓慢、发展中国家市场风险加大等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前的很多问题如公共和私人债务高企、投资收益下降等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此背景下，全球资金流动性成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瓶颈所在。

其次，全球竞争格局可能发生变化。2008 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以发展新兴产业为重点的“再工业化”，力图通过这项系统工程，改变“发达国家控制研发、设计、销售环节，发展中国家进行加工制造”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塑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优势，加强对技术至高点的争夺能力，从而形成全价值链的产业竞争布局。各国纷纷出台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助推“再工业化”的战略举措。德国发布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 4.0 战略的建议》，将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全面渗透到制造领域，构建智能生产网络。美国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规划》等，重点发展高性能计算，推广先进制造业集群网络和智能工厂生态系统。据此判断，本轮欧、美“再工业化”不是向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流，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重塑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体系才是其真正的战略意图。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输出优质产能，是一次从发展战略到发展理念的转型升级，只有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才能实现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国内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

一方面，结构调整的阵痛影响传统制造业投资的积极性。受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用工量减少，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此外，央行公布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也显示，2015 年 9 月，企业家信心指数和经营景气指数分别仅为 50.5 和 49.4，为近一年来最低水平。另一方面，结构调整的阵痛加大了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难度，对获取发展资源稳增长非常急迫。当前，稳增长、惠民生压力与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难以简单地理顺和统筹协调，如何解决好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压力。转型升级必然伴随着淘汰落后、就业人员再安置、财政收入减少、增长速度放缓等严峻问题，若处理不好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带来大量失业。总的来说，去产能、去库存、调结构还需要渡过一段艰难困苦的过程。

三、应对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要真正落地，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建立一套可接纳、可互动、可互补、可操作的风险防范机制。应立足于风险防范，先易后难，做实做细政府间合作，加快完善“一带一路”的制度保障。特别要提到的是，环境保护这四个字往往容易被忽视。在诸多风险中，环境、生态标准往往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或者成为国际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借口。在生态化已经在全球取得共识的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样不能忽视环保因素。

（一）整合数据，为全面评估风险奠定基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完善国别风险评估，建立国别资料库和数据库意义重大。建议建立国别数据库，整合分散的数据资源，把沿线国家的经济概况数据化、指标化，为风险评估做好数据储备。建议制订《“一带一路”沿途国家项目建设指导意见》，建立项目建设储备制度。工作可以分为三步展开。

一是利用中国驻外使领馆、中资企业、驻外金融机构的海外信息优势，分门别类整理国情信息。中国驻外使领馆专门设有经济商务参赞处，熟悉一线情况，对所在国情况最了解，信息统筹作用非常关键；海外中资企业常年在国外经营，在“走出去”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风险把控得也最为准确，是风险识别的有效力量；驻外金融机构具有“融资”“融智”的双重功能，是创新融资模式、拓展资金来源的重要支撑。这三方力量的整合与统筹，对于全面整理国别信息意义重大。二是加强信息反馈，由政府、智库、企业三方合作，共同编制《沿途国家投资开发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构

建“一带一路”投资信息数据库（简称“数据库”）。《指导意见》内容可涵盖：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概况；当地投资法律与相关法规；潜在风险分析；项目所在地国家的发展诉求；中方的优势和劣势分析；项目储备库。数据库可以按照时间序列的形式涵盖经济、社会、民生、风险评估等各项指标。三是将上述信息通过政务专网的形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共享。第一步，加强政务系统纵向内网工程的建设，便于传输信息。第二步，制定相关保密条例和信息调用规则，完善信息的保密和使用制度。第三步，将《指导意见》、数据库内容录入政务专网，将信息数据化，实现各级政府内部的信息共享。

（二）有效沟通，进一步扩大合作共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争取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至关重要，同时应摒弃那种“只唯上、不唯下”的做法。一方面，继续与沿线国家政府进行深入沟通，形成机制化的沟通管道。通过高层互访巩固合作意向，为双方合作确定原则，指明方向；建立两国之间部长级会议交流机制，定期会晤，落实两国高层互访达成的成果，及时评估在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消除分歧。另一方面，加强与当地非政府组织联系，为项目顺利推进增添稳定的因素。可以考虑通过项目建设本地化的模式，将项目建设与产业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劳工招聘等事项结合起来，让项目建设惠及当地民生、帮助解决就业，争取更多民众支持。通过两轨并行的方式，让中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赢得当地政府、民众、项目投资者的共同认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民生效应、社会效应四轮驱动的良性局面。

（三）坚持原则，开展灵活外交

一是对美、日，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加强战略制衡，在亚投行、国际反恐合作、朝鲜半岛问题等国际事务方面进行沟通，客观上起到战略制衡的作用，让美、日有所忌惮。同时，尽可能与其国内的财团、大公司沟通，减少利益对抗，使之朝向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二是对俄罗斯和印度，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加强战略磋商，推动民间智库的交往，探讨合作开发、经营的可能性。中俄两国战略互补性强，特别是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欧国家关系紧张之际，俄罗斯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中方支持将在情理之中；中国和印度虽然在地区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但两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印度本身又具有“不结盟”的政治传统，两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合作空间将十分广泛。三是对于其他国家，海陆统筹、东西互济。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

（四）多策并举，拓宽融资渠道

成立多边金融机构，解决资金瓶颈。除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外，多渠道拓宽资金来源。一是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投资基金合作，形成一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金融决策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保障，重点做好贷款风险的评估工作。同时，建立奖惩机制，根据项目实施的进展、预期效果，动态决定增加、减少资金投放。二是引导民间力量进行海外投资。加速推进公私合营模式（PPP）的运用，变政府主导为政府、民间双轮驱动。简化民间资本出海的审批程序，为投资企业提供更加低成本、便利的融资、保险等服务。三是开发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如对外担保、混合贷款、丝路债券等，通过金融创新疏通融资管道。改无偿投入为股权投资，为重大项目建设筹措有效资金，加大扶持力度。运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发起设立政府股权引导资金、PPP 引导基金和铁路基金，制定完备的风险防范措施和止损措施，有效提振投资信心。

（五）统筹协调，做好规划的衔接和评估

科学合理规划，做好中央、地方两级规划的对接及评估工作。建议中央在汇集地方关于“一带一路”规划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统筹，对不适当的理念、不合理的定位、不完善的项目果断说“不”，指导地方在充分发挥积极性、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科学制定相关发展规划。一是利用发改系统上下联动建设的有利契机，加强中央对地方在规划制定方面的业务指导。具体的方式可以是举办规划编制的讲座，定期进行全系统的业务培训等。二是对地方规划执行情况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一方面吸取地方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推广，另一方面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强化规划的严肃性和约束性。

（六）苦练内功，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

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应充分发挥该战略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抓住有利战略机遇，推动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升中资企业对外经营、对内管理的水平，增强中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提升产品质量、进行科技创新的意愿，扩大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国际产能合作的大潮中，打造一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领头羊企业。否则，我们帮助沿途国家提升竞争力的同时，自己的竞争力反而会不断丧失，离“共赢”的格局可能越来越远。具体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1. 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一是提升技术改造投资在工业投资中的比重，重点支持工业转型升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技术改造。二是加快推进已经确立的如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包投资建设。三是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

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的同时，同步规划公共交通、通讯等配套设施。

2. 制定涉企收费的“负面清单”。建议明确涉企收费项目，项目之外的收费一律视为违规。同时，针对涉企负担调查缺乏数据、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企业负担相关信息上报、调查系统，跟踪研究企业负担情况，动态掌握工业（制造业）企业负担变动情况。

3. 加快布局制造业转型升级。一是规划先行。制造业转型升级乃大势所趋，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 4.0”计划已经按部就班展开，建议抓紧制定与国家相关战略相衔接、能够准确反映未来发展趋势、可操作性强的发展规划。二是重点从优化市场环境、强化要素支撑两大领域着手布局，为后续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做好前期铺垫。对于市场环境，高度重视产品质量、营商环境，政府做好监管；强化要素支撑方面，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技术的良好氛围，提高产业技术工人的地位和收入。

（七）重视环保，让洁净产能走出国门

1. 强化环保的责任追究制度。杜绝超标违规排放；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必须追究责任，责任追究不因任期结束而终止；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

2. 倡导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在鼓励绿色生产方面，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以全行业的排放标准、环保标准为标杆，不达标的生产企业将被处以罚款，倒逼企业加大绿色生产的投入力度；第二步，在第一步措施推广成熟之际，逐渐提高环保标准，在大型国有企业范围内率先实施与国际同行的环保标准对接，对超过国际平均排放标准的企业给予相应处罚，倒逼大型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在鼓励绿色消费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参考文献：

1. 邹磊：《“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2. 孙力、吴宏伟：《中亚黄皮书：中亚国家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3. 张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4. 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宏观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5. 赵晋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济影响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责任编辑：李　蕊、张碧琼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入新常态*

李照刚　彭　博　李方青　方　虹

摘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历经30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的阶段。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演进及问题，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的新常态。研究表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仍受到来自对外直接投资的挑战，能否强化全球责任、整合全球资源、创新产业布局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中国企业应该把握机遇，通过树立国际化品牌和战略，有效地整合国际市场资源，参与到“共创”的全球合作中，实现创新型产业战略布局。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　全球化

作者简介：李照刚，云南曲靖师范学院副教授；
彭　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李方青，云南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方　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回眸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引导下，中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参与国际化分工、开拓国际市场并吸收国外先进管理及生产技术，特别是中国对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课题（71073007，71273022）、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GB061）。

外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发展迅猛。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可以分成三个比较典型的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1978年—1992年）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式开启了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的大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七年里，政府共批准在国外开办非贸易性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超过185家，中方投资约1.77亿美元。截止到1992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的非贸易性企业达到1360家，贸易性企业达到2600家，中方投资总额约为40多亿美元。这些企业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投资领域主要有资源开发、加工生产装配、承包工程等。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初见端倪，参与国外投资的企业类型有所增加，不仅包括一些对外经贸企业，而且工业企业、制造型企业等也参与到国外投资中，国外投资领域也进一步发展，包括在工业、农业、生产加工业、能源开采业等多个行业都有海外投资。

刚刚起步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萌芽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初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的规模较小，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仅为25300万美元，年平均对外直接投资仅为3275.8万美元，共办境外企业约300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具规模性使企业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因素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弱了中国对国际市场的融资能力。同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不合理，使对外投资偏重于初级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忽视了技术型和服务性产业投资，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了总体经济效益。邓小平“南巡讲话”拉开了注重海外投资的序幕，但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市场不熟悉，以及国有企业机制及投资结构的问题，对外投资增长较为缓慢。

（二）发展阶段（1993年—2002年）

1993年—2002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期。图1反映了1993年—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趋势。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和规模不断发展。但这一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仍然处于低值徘徊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均在20亿美元左右，虽然2001年上升到69亿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不足30亿美元的水平。虽然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约为590%大幅度的增长，但其年流量仍不足2006年的1/2。从图中可以看出，发展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十亿美元，增长率下降了47.5%，200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虽然增加到 27 亿美元，但其增长率却下降了约 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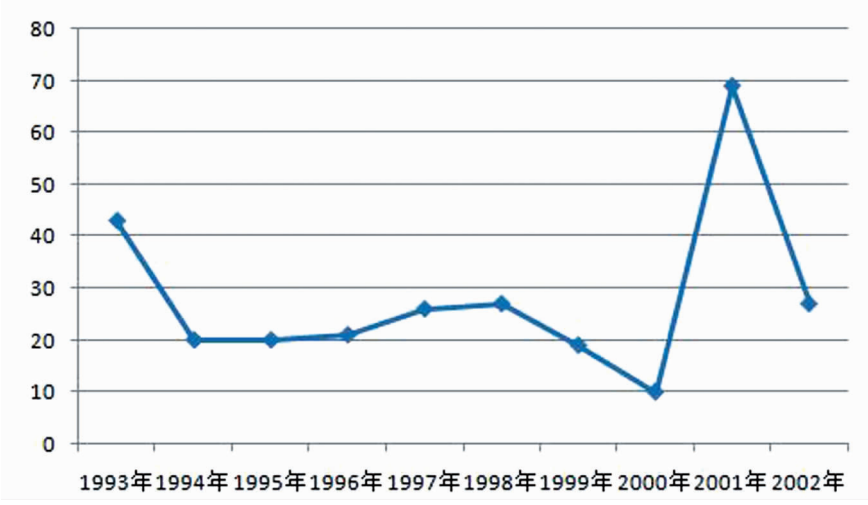


图 1　1993 年—200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趋势（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发展阶段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仍然较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较不合理。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寻求能源类、市场驱动类、市场要素驱动类、寻求技术类、规避壁垒类以及战略利用类（Dinning，200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虽然广泛，涵盖范围也比较齐全，但其产业结构仍趋向寻求能源类、市场及要素驱动类。2002 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约为 16.3%，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在 15%左右。批发和零售业自 2002 年以来所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水平仍能达到 15%。农林牧渔、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建筑业、餐饮业、科研技术服务业和居民服务业处于低份额行业，总体的市场投资份额不到 1%。这表明，发展阶段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获取国外能源，为了寻求更多市场机遇及市场资源。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种一边倒的能源和市场要素驱动的投资结构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不利于中国对外投资向着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

（三）高速发展阶段（2003 年至今）

2003 年至今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阶段。如图 2 所示，2003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逐年上升，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200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只有不到 30 亿美元，但仅用了一年时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翻了一番，达到了 55 亿美元，2005 年又突破了百亿美元，其增长率 122.9%是近十年的最高值。之后的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以非常快的增长率发展。但 2009 年的增长率却为近五年最低，从 2008 年的 110.1%下降到 1.1%，由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市场需求低迷，直接影响中

国对外投资的信心和流量。2010 年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回升，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了千亿美元，约为 1078.4 亿美元，是 2003 年的 37.8 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初具规模，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排名中紧随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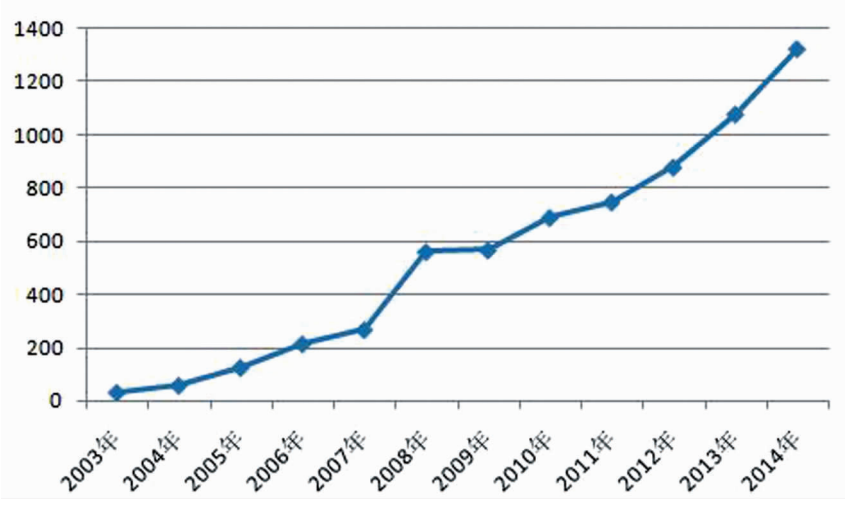


图 2　2003 年—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趋势（亿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行业范围趋广，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五大行业的集中度超过了八成。截止到 2014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累计投资存量达 5486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83%，当年流量占比也超过八成。2012 年，投资过百亿美元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七个行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92.4%，到 2014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投资则进一步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中。不过，这五大主要行业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这一指标来看，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净额的比例在提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则有所降低。表 1 反映了 2013 年—2014 年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其占比情况，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有减缓趋势，对外投资净额由 2013 年的 719715 万美元下降到 2014 年的 597629 万美元，下浮率约为 16.96%，其他行业下降的还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行业、交通运输及仓储邮政行业、信息传输及服务行业、批发零售行业、住宿及餐饮业、租赁及商业服务业，这些领域的占比波动幅度不是特别大，大约维持在 1%～2%的水平。

表 1　2013 年—2014 年中国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占比

行业分类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万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万美元）	占比	占比
	2014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3 年
农林牧渔	224955	181313	0.017	0.017
采矿	4543972	2480779	0.343	0.230
制造业	597629	719715	0.045	0.067
电力燃气及水供应	23923	68043	0.002	0.006
建筑业	586903	436430	0.044	0.040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366039	330723	0.028	0.031
信息传输及服务	158245	140088	0.012	0.013
批发零售	1644087	1464682	0.124	0.136
住宿及餐饮	4941	8216	0.000	0.001
金融业	2265657	1510532	0.171	0.140
房地产	774100	395251	0.058	0.037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2737526	2705617	0.207	0.25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217248	179221	0.016	0.017
水利环境公共服务	62535	14489	0.005	0.001
居民服务	143199	112918	0.011	0.010
教育	1237	3566	0.000	0.000
文化体育教育业	49214	31085	0.004	0.003
卫生社保社会福利	5391	1703	0.000	0.000
总额	13245784	10784371	1	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2012－2014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计算得到。

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带来了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国际投资的风险。截止到 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全球排名前进两位，投资覆盖国家地区更为广泛。中国 1.53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 2.54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 184 个国家和地区，较上年增加五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 6604.8 亿美元，较上年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十一位。据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对亚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都同比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22.77%、12.18%、25.82%、26.22%。2014 年中国除了对欧洲地区投资下降外，在世界其他地区表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中国对欧洲地区的投资 59.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4%，而对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分别实现了 132.7%、51.6%、33.9%、16.7%的较快增长，对北美洲投资也较上年实现 0.4%的微增长。虽然中国正逐渐缩短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差距，但由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和海外经营能力不强使得这种国际化的直接投资为其带去了高风险和不确定市场因素。由于跨国经营主体单一、国际化程度低、品牌实力弱等因素，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了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限制。另外，由于缺乏国际化的经营理念和对跨国文化的适应整合，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环境风险的能力较弱，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较低，海外经营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二、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的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在经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的“常态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深化改革、鼓励创新、释放活力的“新常态”模式。另一方面，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4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9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1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中国吸引外资规模仅差 35.6 亿美元，这是中国双向投资按现有统计口径首次接近平衡。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 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 1400 亿美元左右，大约高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200 亿美元。实际上，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输入，中国已经进入了投资输出超过投资输入的“新常态”。

2015 年 2 月，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经济回顾与展望 2015》年度报告中预测指出，2015 年的增长将维持在 10%或以上，而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越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将会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中国继续在目前的高水平上保持平稳增长，通过向高端价值链产业投资，提高中国在技术、产品研发、品牌质量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高效能方向发展，为经济转型做出贡献。同时，安永公司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展望 2015》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过去十年间有了跨越性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国，2014 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千亿美元，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等系列政策的实施将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中国对海外的投资机会。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始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02 年，中国入世

后的第一年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 27 亿美元。2014 年增至 1160 亿美元，12 年里增长了近 42 倍（见图 3），连续三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在此期间，大批的中国企业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跨国公司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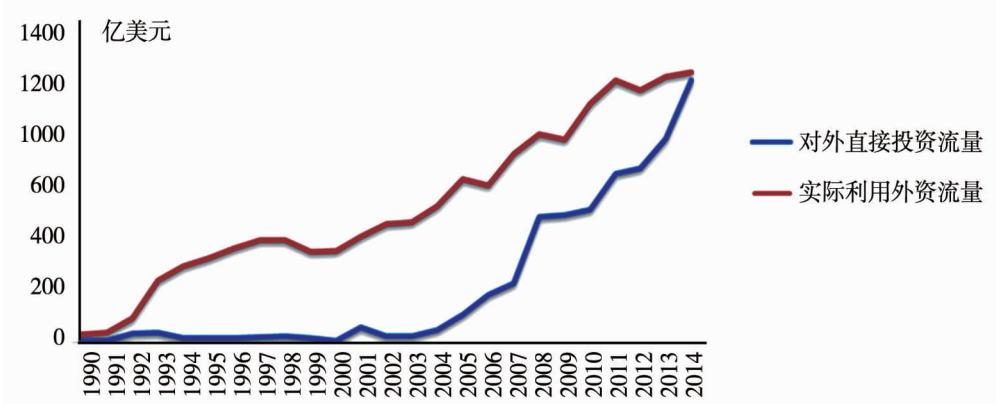


图 3　1990 年—2014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据商务部公共商务信息服务中心统计，2015 年 1 月—2 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84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067.8 亿元人民币，约为 17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其中股本和其他投资 896.2 亿元人民币，约为 146.2 亿美元，占 83.9%，利润再投资 171.6 亿元人民币，约为 28 亿美元，占 16.1%。截止到 2014 年，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3.97 万亿元人民币，约为 6463 亿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投资 6320.5 亿元人民币，约为 1028.9 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 14%。股东投资和其他投资仍然占总投资的大部分，约为 83.7%，5288.5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金约为 860.9 亿美元，利润再投资 1032 亿元人民币，约为 168 亿美元，占 16.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中显示（如图 4），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稳定增长趋势。从 2007 年的 265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230 亿美元，年增长率为 26.35%。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较为缓慢。由于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需求低迷，资金看紧，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一路下降，从 2007 年的 22%下降到 2013 年的 10%。尽管如此，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通过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比例、吸引具备高附加值的外商投资来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水平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了稳步的增长。2013 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增长 1.4%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 1078.4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增长 33.8%，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进入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 35.1%的增速稳定增长，达到 1230 亿美元。

图 4　2007 年—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2007－2014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

（二）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利用外资水平

在 2014 年商务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中国利用外资规模连续 23 年保持在发展中国家首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目前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保持平衡，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后者将会超越前者，中国将会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也将改变过去 20 多年来作为全球主要外商直接投资（FDI）目的国的角色，变身为全球 FDI 的重要来源国，这将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格局、新常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此前发布的《2014 世界投资报告》表示，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的拐点将至，其中 FDI 最大的目的国中国可能最快在 2014 年由 FDI 净输入国转变为 FDI 净输出国。观察最新数据可以看出，2014 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使用外资总规模非常接近，而且商务部一般统计的对外投资增长数字只是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2013 年前 11 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是 802.4 亿、1055.06 亿美元，两者相差 252.66 亿美元。而 2014 年同期，这两项数据分别是 898 亿、1062.4 亿美元，两者相差 164.4 亿美元，差额较同期缩减了 88.26 亿美元，将近 54%的幅度。对比中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2003 年—2014 年，中国吸收外资年均增速为 7.92%，与对外投资增长情况相比，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规模扩张迅速，年均增速为 45.42%，这一增速约是吸引外资的六倍。2015 年 1 月—2 月，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3831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381.9 亿元人民币，约 22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而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067.8 亿元人民币，约 17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由此可见，两者的差距正在缩短，意味着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指日可待。

（三）“一带一路”助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伴随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国内国际市场的风云突变，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战略挑战。一方面，国际分工中，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遭遇大幅削弱，大量重复性简单劳动被优化的产业布局替代，中国的比较优势被削弱，逐步丧失了传统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受国际多边组织的影响，跨国境的区域合作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中国的产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分散化、社会式的生产方式将取代以单一企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一带一路”政策实施是应对战略挑战的关键，对中国深层次推进对外开放、加深国家间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全球贸易、投资格局也正适时调整，中国及亚欧国家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契合“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理念，为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合作共赢提供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与沿线国家谈合作、促共赢，“一带一路”政策符合中国战略性的决策需要，体现了平等、互助、包容、交流、合作、理解的精神，充分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基建、油气管道设备、旅游、金融贸易、电网设备等方面的投资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为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 63%和 29%。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为上升阶段，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较为广阔。深入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能够提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外开放的国际地位，并且促进中国新疆、陕西、甘肃、宁夏、东南地区等中西部的对外开放程度，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从而形成海陆兼备、东部西部共同发展的新经济格局。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初具规模。截至 2015 年 5 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64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 1612 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2015 年 1 月—5 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48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 4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主要投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等。其中，吸收外资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767 家，同比增长 14.31%；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29.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9%，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额的 5.42%。对外贸易方面，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增长 2%，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27.7%；中国自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下降 23.2%，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23.3%。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59 个国家和地区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1105 个，新签合同额占同期中国对

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48.6%，同比增长 19.1%；完成营业额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的 44%，同比增长 4.5%。截至 2015 年 5 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64 个国家和地区承包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占到同期业务总规模的 43.2%和 43%。

（四）地方企业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新价值

地方企业、非国有企业逐渐登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的“快轨道”，改变了以前主要靠央企、国企“走出去”的局面。在 2003 年，中央管理的企业拥有对外投资存量的九成以上。如今，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指引下，对外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地方企业、非国有企业话语权也在增强。一方面，地方企业对外投资稳步增长，截止到 2013 年，中国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1649 亿美元，占比达到 30.3%，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上，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 364.15 亿美元，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39.3%。2014 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分省市情况显示，中国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分布，图 5 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较大的省区的投资比例情况，其中位列前三的是广东、北京和山东，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是 960066 万美元、554737 万美元和 441095 万美元，占总体对外投资额的比重分别是 26%、15%和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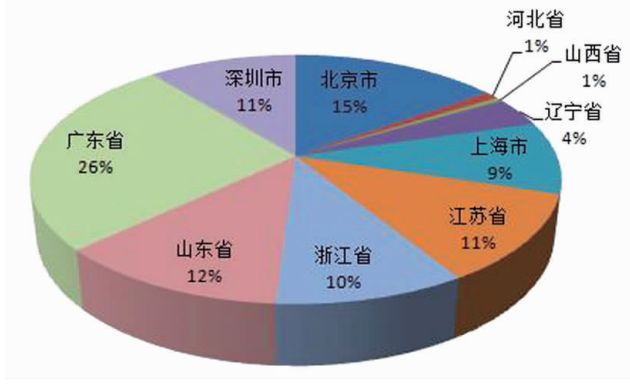


图 5　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省区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 2014 年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整理得到。

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扩大，增强地方经济实力，为国家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截至目前，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5434 亿美元存量中，国有企业占 55.2%，非国有企业占比 44.8%，较上年提升 4.6 个百分点。2013 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927.4 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 43.9%、有限责任公司占 42.2%、股份有限公司占 6.2%、股份合作企业占 2.2%、私营企业占 2%、外商投资企业占 1.3%、其他占 2.2%。例如，作为一个由乡镇企业成长为国内最大民营企业的浙江万向集团已实现

了年营业额 1165 亿元的突破，为当地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万向集团是一家主要致力于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国际型企业，也是浙江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创造价值最多的“走出去”民营企业。通过并购、设立、参股 26 家海外子公司，万向逐步打开了国际市场。1997 年 7 月，万向收购 AS 公司 60%的股份，成立欧洲轴承公司，开启了在欧洲的销售之路。2000 年 4 月，万向收购了美国舍勒公司，逐步拓展全球市场的营销网络。同年，万向收购了 LT 公司，在北美有了第一个加工厂。2001 年，万向收购美国 UAI 公司，为品牌推广创造了很大的平台效应。2003 年，万向再次出手，收购了美国“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进一步推进了万向国际化战略。

三、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挑战与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下，全球范围内企业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跨国公司广泛向全球公司的转型，以及企业经营环境和竞争规则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生产过程的分离以及生产过程中任务和活动日益趋向国际分散化，使得企业自身的价值链延伸到全球，逐渐形成企业全球价值链，最终导致无国界生产体系即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经过战略、结构和理念调整，一批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全球公司形成过程恰恰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过程。

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全球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近年来，一批批中国企业奔赴海外，正逐渐从民族企业过渡为跨国企业，并朝着全球化企业跨越。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谓一箭双雕，不仅提高了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还可以为中国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然而，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企在华发展一样，受政治文化、制度政策、人力储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新的经济格局下，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以及经营理念均面临挑战。

（一）强化全球责任，树立国际化品牌

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对外投资全球化的新契机，除了全面整合国际、区域资源，还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地整合全球化理念和文化的挑战，提升为全球服务的责任感。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深有体会。他表示：“过去，我们的开放是把资金、技术、设备、企业引入中国，后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的企业实现了走出去的宏伟战略，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现在中国企业全球化应该考虑合作共赢和增强企业的责任感。”例如，2013 年 4 月，中国建材集团与土耳其 OYAK 集团签订 Bolu 和 Aslan 两个水泥余热发电项目。两个项目的签署不仅开启了上海

凯盛与 OYAK 集团国际化合作的篇章，也为土耳其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建材在土耳其的水泥发电项目，目的是能够增加与当地企业合作，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当地经济发展，通过深入土耳其社会文化环境，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体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全球化道路上不仅需要为全球提供市场咨询、技术设备和创新服务，而且还应该树立中国企业为全球服务的价值观，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责任感，这样，中国企业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一个更健康、更负责的国际品牌形象。全球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价值链中的最优资源要素，全球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被开发出来，从而全球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海尔集团 CEO 张瑞敏说："美国市场是世界最难打入的成熟市场，要想立足植根于其中，必须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的优势环节，提升产业链的价值。"海尔的国际化观念是思路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目前，海尔在洛杉矶建成"海尔设计中心"、在纽约建立"海尔美国贸易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设立"海尔生产中心"，是海尔利用美国当地的市场优势形成了设计、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经营格局来更好地服务美国市场，更快地针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反应。因此，通过根据当地市场条件，利用市场资源优势，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立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以及营销服务中心，完善全球产业链，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有助于中国企业树立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通过将价值链的若干环节进行外包，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并购其他企业，有助于吸收和整合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和完善全球产业系统，进而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和数量，利于中国企业打响国际化品牌形象。

（二）整合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化竞争

目前，越来越多的民族企业走向世界成为跨国公司，但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仍然不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的视野和理念，在全球化战略布局时仅仅考虑利用本土资源应对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视国外竞争者为冲击企业的威胁力量，这样往往丧失了与全球公司合作的机遇。尽管中国的本土市场非常庞大，而且有不断扩容的趋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想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获取本土消费效益是合情合理的，但随着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单纯依赖本土资源的运营模式显然会变得非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国除了依靠本国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和升级之外，还可以通过外部获取，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发展中国家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成为获得技术升级并向价值链高端迁移的主要

竞争方式。在面对国际化竞争时，华为并没有视那些国际竞争对手为敌人，而是尊重、包容地对待他们，成为合作伙伴。华为高级副总裁徐直军说："这是竞争之上的合作，是国际企业发展的趋势。在竞争中整合优势资源，共享竞争带来的价值。华为势必要通过这种竞争合作的方式，早日实现国际化。"目前，华为已经与 3Com、西门子、松下、NEC、TI、英特尔、朗讯、SUN、IBM 等多家公司开展多方合作。华为已经与 3Com 合资成立华为 3Com 公司，与 NEC、松下合资成立宇梦公司，与西门子成立 TD－SCDMA 合资公司。通过这种参与全球资源整合的"共创"模式，华为正在逐步实现全球化战略。

因此，面对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深入和全球化的加剧竞争，中国企业要以全球化的视野进行战略布局，通过整合全球市场资源与国际资本要素合作共荣，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资源整合的重要模式之一就是"共创"（Co－creation），"共创"是指与有共同利益的跨国公司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市场资讯、研发技术、销售渠道等要素资源的合作和创新，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通过合作双方市场层面的深度可持续联盟，积极地整合全球市场资源，共同维护市场主体长期稳定的竞争环境和秩序。另外，整合全球资源不仅仅涉及与外部竞争对手的共创共赢，还需要全球化的人才布局，要及早地布局、盘点、计划投资的国家和并购企业的人才水平。中智集团副总裁王旭在第 14 届"中国经济论坛"中指出，中国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和资源配置时往往出现人才短缺问题，这就造成很多"走出去"的企业进行国际拓展时出现"三多"现象，即救急的多、临时的多、华人多，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资源全球化配置带来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一挑战，除了通过全球化的华人加盟，使企业人才储备更加国际化，还要快速摸清新市场产品需求，培养本土人才，为企业提供全球化的人才支持。

（三）创新产业布局，实现国际化战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移动互联网主导的商业模式已经席卷产业发展的各个角落，如何完善互联网的产业发展，创新"全球化布局"和"区域化经营"的战略，实现战略、文化、人才等方面的创新发展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挑战。未来，伴随"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也将增至上千个，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将达到 300～400 个，这表明丝绸之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和地区将有机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合作伙伴。如何高效地进行产业布局和资源整合，能否选对国家、选对市场、选对项目、选对合作伙伴是实现互利互惠的关键。联想集团的国际化始于并购IBM的 PC 业务，但其能够完成国际化，并不仅仅归功于并购，还得益于其实现了国际化的战略、文化、人才机制等多方面的创新。联想登顶全球 PC 市场榜首之前，就提出

PC + 、优势三叠加等战略并致力于全球互联网终端领域的领导厂商。由于联想很早就开始移动互联网的产业布局，为并购摩托罗拉，推动移动在国际市场的探索打下铺垫。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提出打造硬件 + 软件 + 云服务三位一体的国际化战略主张，显示了联想高度的国际化战略视野和创新的产业设计理念。因此，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来说，应该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互联网销售渠道和模式，增强客户的购买体验。同时在境外宣传时，应该强化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合作，通过市场需求调查，找准东道国的客户需求点并加强营销投入。通过和各行业有实力的企业联盟，打造产业集群效应来提升自有品牌和国家形象。另外，通过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战略布局实现不同市场的资源最优配置。根据不同市场的比较优势，将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职能部门安排在不同的地点，最终实现企业对外投资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在海外投资中要结合当地市场政策特点，建立风险管理和评估机制，借鉴当地团体组织和国际机构的经验来学习化解冲突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杨挺、田云华、李欢欢：《2013 - 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及趋势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05 年第 1 期。

2. 郑展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3. 葛顺奇，赵玉静：《500 强跨国公司：世界与中国的比较》，《国际经济合作》2010 年第 6 期。

4. 李珮璘：《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与传统跨国公司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0 年第 5 期。

5. 黄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获取型投资特征比较》，《科技管理研究》2013 年第 22 期。

6. Dunning J. H.，“The electr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 activity”，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0，P. 163～190.

7. S. Shimizutani and Y. Todo，“What determines overseas R&D activities，The case of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Research Policy，2008，P. 530～544.

责任编辑：李　蕊、张碧琼

·区域经济·

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的策略思考*

陈志成　孔志坚

摘要：本文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新粮食安全战略、长江经济带以及云南粮食产业跨越发展等方面，阐述了构建粮食贸易大通道的必要性；分析了构建粮食贸易大通道的基础条件、制约因素；明确了基本思路、基本要求、重点布局、主要任务；从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提出了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　中南半岛　粮食贸易大通道

作者简介：陈志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贸处副处长、高级经济师；
孔志坚，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安天下之本，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到新的高度，对粮食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决策部署。2013 年中央确立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

* 本文源自云南省政府委托《打造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专题研究》课题，课题组顾问有：和段琪、蒋兴明、王喜良、马红跃、海文达。

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同时，按照中央“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和把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可以、也需要合理利用国际资源调节国内市场，近十年来中国粮食从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约 7000 万吨。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这种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强。但需清醒地看到，进口必须适度，过量则可能带来政治、外交、贸易风险。云南山多地少，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缺口逐步扩大，刚性需求不断增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确保粮食安全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云南具备独特区位、交通、资源等基础条件优势，主动融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适度、有序扩大规模发展国际粮农贸易合作，通过“外引”建设中老泰通道、中缅通道、中越通道三大国际粮食贸易流通通道，“内联”建设昆明—曲靖—昭通（水富港）辐射长江经济带通道和昆明—红河—文山辐射珠三角通道两大国内粮食贸易物流通道，把云南打造成为连接中南半岛国际粮油贸易通道的大市场、大平台、大枢纽，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补给源，也是巩固云南、长江经济带乃至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的重要途径，将有效促进云南建设成为中国西南粮食安全基地，服务西南进而辐射中南、西北，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平衡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新粮食安全战略，破解走私粮的冲击，筑牢粮食安全屏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一、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的必要性

（一）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周边外交座谈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指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云南区位独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的主体省份，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是中央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对云南开放发展提出的新定位、新目标、新要求。与云南毗邻的周边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国，农业是其国家经济支柱产业，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种植生产粮食，粮食生产从业者面广人多。此外，周边国家基于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均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农业合作，扩大本国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出口，以平衡我省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顺差，促进农民增收，消除贫困。

（二）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是贯彻落实国家新粮食安全

战略的需要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完善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出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中国粮食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支持到境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农业生产和进出口合作”。中国粮食供应主要由自身产能和国际贸易两部分构成，自身产能方面，中国粮食产量年均增加 300 多亿斤，立足国内解决了 13 亿人的吃饭问题；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对于谷物实行可控制、有管理的开放，粮食进口实施关税配额管理。2010 年以来，尽管粮食连年增长，由于需求（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大幅增加以及受制于土地、水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中国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的压力增大。因此，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还要合理利用国外市场，开展与周边国家的粮食贸易，构建云南与中南半岛的粮食贸易大通道，有利于贯彻落实国家新粮食安全战略。

（三）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是服务云南、长江经济带乃至国家的粮食安全的需要

2014 年，全国实现粮食生产“11 连增”，但粮食供需缺口呈刚性增长，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粮食供需缺口由 2006 年的 1450 万吨扩大到 2014 年的约 2400 万吨，增长近 70%，是全国粮食供需缺口最大的区域，70%以上调入粮食是通过铁路运输从东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调入，存在运距远、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并且受全国铁路运力紧张制约较大。云南省居民粮食消费历来以大米为主，主要粮食品种是粳米和籼米，约占粮食消费的 85%。中南半岛国家素有“亚洲粮仓”的美誉，从老柬缅调运稻米、玉米到长江经济带地区，既可稳定、安全地为长江经济带地区提供粮源供给，也可缓解长江经济带西南地区铁路等交通运输压力。

（四）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是助推云南粮食产业实现跨越发展的需要

云南粮食产业发展水平与全国发达省区相比，差距较大、发展滞后。云南粮食行业要实现跨越发展，关键是产业的大发展，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以开放到逼改革，以开放开发牵引粮食产业发展，支持粮油企业“内联外闯”“走出去”，与中南半岛的稻米主产国加强合作，实施粮食产业和其他领域开发建设，将有效促进云南粮食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的基础条件优势及制约因素

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农业生产合作、粮食进出口具有有利的地缘、人文、交通、政治、外交等条件，且已有先行一步的基础，应当抓住国家战略机遇，进一步做大做强与中南半岛国家的粮食贸易，形成粮食安全产业支撑平台。

（一）云南建设国际粮食贸易大通道区位、通道优势突出

云南北上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可连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唯一可以同时从陆上联通东南亚、南亚的省份。目前中越铁路（泛亚铁路东线）昆明至河口已建成全面通车，中缅铁路（泛亚铁路西线）中保瑞段已全面开工建设。中老泰通道（泛亚铁路中线）玉磨铁路已启动前期工作。“四出境公路”通道也在稳步推进中，其中中越公路通道境内段已实现高速化；中老泰高速公路境内段除末段小勐养至磨憨段在建设外，其余路段已实现高速化；中缅公路通道昆明至瑞丽通道境内段除龙陵至瑞丽段在建外（预计 2015 年完工）已全部高速化；中缅保山至腾冲、至猴桥通道昆明至腾冲段已建成高速公路，腾冲至猴桥段高速公路已启动前期工作。目前，随着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开通，昆曼大通道全线贯通，出境铁路、公路建设的全面推进，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五国粮食贸易大通道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借助不断改善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条件，云南周边的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等成为我境外距离最近、安全便捷的粮源生产供应地，从老柬缅调运稻米、玉米到西南、长江经济带地区，具有运距短、成本低的优势。

（二）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加快发展粮食贸易合作基础好、潜力大

中南半岛五国都有发展农业，扩大粮食出口的强烈愿望，并且缅甸、越南通过边贸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的粮食。中国罂粟替代种植企业在老北、缅北开展的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中国农业科技在周边国家试验、示范取得明显效果，部分品种已在越、缅、老、柬审定推广，并建立了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园，获得广泛好评。云南与中南半岛五国经贸基础较好，长期以来形成了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

（三）云南粮食指定进口口岸优势凸显

在中南半岛五国中，早在 2010 年中老、中柬政府分别签订了老挝、柬埔寨农产品出

口中国的一系列检验检疫协议，老挝、柬埔寨两国农产品也正式叩响了通往中国的大门。2011 年 8 月，老挝玉米正式通过磨憨口岸出口到中国。

2014 年 9 月，中国与缅甸政府签订了缅甸大米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标志着缅甸粮食也可以通过一般贸易出口到中国。2014 年 10 月，云南的畹町、瑞丽通过国家检验检疫总局的验收成为粮食指定进口口岸，与越南毗邻的天保口岸也同获粮食进口口岸，但仅限定木薯进口。瑞丽、畹町指定为粮食进口口岸，将十分有利于促进云南与缅甸的粮食贸易通道建设，也为云南其他边境口岸申报粮食进口指定口岸提供了参照。

（四）云南沿边开放型功能园区加快推进，粮食贸易大通道基地建设基本条件已具备

经过近 20 余年的沿边开放，云南的沿边开放载体初步形成，目前有瑞丽、磨憨两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红河综合保税区。目前，正积极推进河口、瑞丽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天保、孟定、猴桥、勐阿、片马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昆明综合保税区申报批准和基础建设工作。随着沿边开放平台建设的推进，云南的开放型功能园区均规划布局商贸物流仓储功能区，开始逐步建设了粮食运输、接卸、储备、加工、中转等粮食物流基础设施，为扩大粮食国际贸易物流搭建了基础平台，创造了基本条件。总之，以国际化视野、开放性思维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的市场腹地广阔，潜力巨大。

虽然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但同时仍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第一，受国际形势制约。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粮食需求是刚性的，任何国家开展粮食国际贸易都要在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例如 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致使中南半岛各国纷纷采取限制粮食出口、鼓励进口、稳定国内粮价和提高出口粮食的出口关税等政策。中南半岛五国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发展各有不同，与其开展粮食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复杂的政治、外交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

第二，受国内政策制约。粮食进口配额政策无法满足现有的粮食贸易需求。近年来，国家给予云南的粮食配额平均在十万吨左右，而我省粮食刚性需求每年缺口大约在 300 万吨左右，配额远远不能满足我省需求。此外，与我省毗邻的周边国家主要种植籼稻，但是，国家对配额内进口的籼米和粳米有数量要求（往往粳米数量多于籼米），因此，云南对于配额内进口所需粮食数量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云南具有粮食配额资质的企业分布不平衡，有些州市与周边国家有地缘优势，但是本州市却没有具备配额资格的企业进口粮食，不得已向省内外有配额的企业购买粮食配额，一吨粮食配额是 300 元钱，增加了粮食进口成本。

第三，粮食贸易流通成本高。目前云南与周边国家开展的粮食贸易主要是靠公路运输，物流成本较高，货车装载运输费用是 0.28 元/公斤（不包括磨损费）。此外，由于中国对粮食进口征收关税，按照目前的税收政策和进口手续费用来看，进口粮食的各种费用是 0.42 元/公斤，因此，受制于关税和交通设施，贸易流通成本较高，不利于开展正常的粮食贸易。

第四，粮食贸易仓储物流基础设施滞后。云南粮食贸易物流节点及合作平台建设比较滞后，全省粮食仓容达标仅占总仓库的 19.39%即 83 万吨，348 万吨仓容达不到国家科学储粮标准要求。全省粮食物流通道建设滞后，粮食散装、接卸、发送和运输能力偏低，全省只有粮食铁路专用线 17.97 公里，还有七个州市不通铁路，90.7%的仓容是平房仓，不适应自动装卸条件。全省多数州市特别是沿边州市重要交通节点和边境口岸、对外开放合作园区均没有上规模、标准化的粮食贸易物流中心、交易市场、集散中转站库点及必要的配套设备设施，粮食贸易物流支撑能力脆弱。边境一线无法储存大量的入境粮食，粮食贸易商人不得已“即买即卖”，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粮食贸易。

第五，各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不够紧密。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五国的粮食贸易大通道涉及粮食、海关、检验检疫、商务、外事、发展改革、税务、财政以及地方政府等多个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调沟通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整体合力，不利于扩大粮食贸易和国际市场合作。

三、构建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的策略构想

（一）基本思路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为目标，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结合云南实际，充分发挥云南沿边区位优势，依托现有交通物流通道，内引外联，着力优化现有的粮食贸易环境，进一步夯实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产业合作贸易关系，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加大贸易投资力度，在边境重要口岸和出省重要交通节点建设粮食仓储物流加工区，完善粮食贸易体系，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的粮食贸易大通道，促进云南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补给源和长江经济带粮食安全的大动脉，为保障云南、长江经济带和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二）基本要求

1. 稳定境内、拓展境外。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落实中央支农惠农直补政策，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立足云南，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调剂品种适度进口”。利用云南与中南半岛的地缘优势以及中南半岛五国农业资源、粮食市场优势，在沿边重要节点地区，构建集生产、加工、贸易、流通、仓储为一体的新型商品粮供应基地，有效调剂和补充云南的粮食供给，确保云南粮食安全并逐步辐射服务长江经济带粮食安全。

2. 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利用我方资金、技术优势，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粮食农业合作，促进粮食产业融合互利共赢，塑造灵活调剂、动态补充的周边粮食贸易格局，加快农业“走出去”、粮食“运进来”步伐，缩小相互贸易逆差，推动区域粮农发展，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3. 统筹兼顾、重点突破。统筹兼顾、分类施策，充分考虑中南半岛各国粮食生产市场和各个口岸进口的粮食品种、数量以及相应的粮食仓储物流设施的差异性、协同性。依托云南 24 个一、二类口岸，注重策略、重点突破，在当前畹町和瑞丽两个粮食指定进口口岸的基础上，争取国家质检总局将我省河口、天保、清水河、磨憨、章凤、猴桥、打洛等口岸列为粮食进口口岸，并赋予其进口粮食全品种的权限。

4. 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加强粮农贸易合作的规划、政策引导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粮食加工、贸易、仓储、物流建设，加快实施粮食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粮油大中型企业。加强粮油市场体系建设，支持到境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开展粮食农业贸易生产合作，建立稳定可靠的贸易关系，实现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产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规模化。

（三）重点布局

积极主动融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按照“外引内联”，依托互联互通物流通道基础设施条件和市场供求流向，突出重点，适度超前的要求，以“先手棋”布局中国（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力争打造形成“外引”带动、以昆明为中枢、“内联”支撑的辐射状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格局。

在“外引”方面，发挥云南与越、缅、老毗邻，与泰、柬邻近的地缘优势，以澜沧江—湄公河航道、昆（昆明）曼（曼谷）公路、即将开工建设的昆明—玉溪—磨憨铁路、中老泰铁路形成的陆水联运中路粮食贸易通道为主，以滇越铁路、昆河公路及红河水运形成的东路粮食贸易物流通道，以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即将建成的昆明—大理—瑞丽铁路形成的西路粮食贸易物流通道，东西两翼、协同并进、向外辐射，构建粮食国际贸易合作的“雁型”格局。在勐腊（磨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暨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红河综合保税区和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重要前沿通道节点，建设现代粮食

物流贸易集散产业基地（园区）。

在“内联”方面，突出云南（水富港）作为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源头通道优势和昆明物流枢纽地位，打造昆明—曲靖—昭通（水富港）对内辐射长江经济带粮食贸易物流通道；昆明—红河—文山对内辐射珠三角粮食贸易物流通道。

（四）主要任务

1. 农业“走出去”，粮食“运进来”。依托中南半岛各国优越的自然土地资源，积极引导国内有实力的农业企业集团和粮食经营公司，采取租用土地等形式，向中南半岛各国购租宜农土地，并以专家、技术、种子、农机作为投入，设立境外示范农场或农业中心，进行良种示范、技术推广和后续加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粮食种植合作，提高粮食总体产量，并以协议的方式统购统销，自主决定粮食返销中国或从当地向外销售，以作为我国稳定的海外粮食生产基地。

2. 粮食贸易物流通道建设。依托铁路、航空、公路、水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以滇中城市群为核心，构建长江经济带、珠三角两条对内粮食物流大通道，形成昆瑞、昆河、昆磨对外开放经济带“二主一辅”的物流通道。形成内联中原腹地、外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立体交通纽带，实现物流大运量常态化。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立体化对外交通网络，直接将国内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市场连接起来，为粮食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通达条件。在保税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和粮食进口加工基地，通过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保税区仓储转口贸易和保税区仓储出境货物贸易方式，积极发展与周边邻国的粮食贸易，建设东南亚粮食贸易体系。

3. 现代粮食市场建设。根据粮食流向和现有市场资源，加快现代粮食市场建设，形成以粮食收购市场为主体，区域粮食交易市场为骨干，网络电子交易为平台，粮食产销协作为纽带，粮食现货、期货交易市场稳步发展的市场格局。重点建设昆明三个新型粮食批发市场，大理、红河、普洱、曲靖、昭通五个区域性粮食市场建设，逐步在我省粮食主产区宜良、陆良、景洪等，在主要交通沿线水富、罗平、富宁等，在边境口岸腾冲、麻栗坡、河口、江城、勐海、孟连、瑞丽、镇康、泸水等地建立次区域粮食市场。

4. 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在保税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和粮食进口加工基地，建设东南亚粮食贸易体系，加快构建集仓储服务、综合运输、粮油加工、信息集散等现代物流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粮食物流中心，形成安全、高效、集约的粮食流出流入大平台、大市场、大通道。在口岸建设一批集粮食仓储、加工、物流配送、

粮食检验等功能为一体并以“散储、散装、散运、散卸”为主导方向的粮食物流节点。根据仓库设施标准化、技术装备现代化的要求，改造和提升现有设施功能，应用现代粮仓储技术。结合粮食物流通道建设，优化仓储设施布局和储备品种结构。

5. 现代粮油加工能力配套建设。围绕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做优产品的要求，推进粮食工业新型化、粮食经营产业化、粮食产业园区化步伐。一是改善加工设施装备条件。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先进适用的生产加工设备，改造升级收储、加工、包装等设施装备。二是统筹协调发展粮油加工。鼓励企业合理发展粮油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三是培育产业集群，加快红河泛亚粮食经济园区规划建设。四是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实施新型龙头企业集团化带动战略，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中型企业集团。五是构建滇南中心城市粮食经济圈。构建和完善滇南中心城市粮油食品集散功能区、粮食收购功能区、粮油食品加工功能区、粮食代购代储功能区等产业体系。

6. 粮食流通配套设施建设。一方面，粮食贸易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全省外向型、开放型统一的粮食贸易物流信息系统，是推进通道散粮运输、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重要条件。建立省级主网站，第一步与通道沿线五万吨以上的粮库和大中型粮食企业及主要粮食批发市场互联；第二步与通道沿线 1.5 万吨以上的粮库和所有粮食企业互联；第三步与全省所有粮库、粮食批发市场互联。对外与国家粮食物流信息网相连。逐步构建连接粮库、粮食市场、粮食加工企业的综合性、多功能的粮食物流信息网络系统。另一方面，粮食检验监测监督能力建设。原则上以粮食贸易通道各州（市）粮食质检站、重点县站、骨干粮库、加工企业、批发市场的质检机构为依托，根据现有管理体制和设施状况，按照规范化、标准化原则，完善设备配置、经营场所改造和适应市场功能，使之成为粮食流通质量等级检验、粮油储存品质研究、品质测报、行业服务等多功能质量检测体系。

四、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需要国家层面协调解决的事项

1. 请求国家尽快与中南半岛各国政府进行协商，签署粮食贸易合作实施协定。近期中南半岛各国政府有关部门已明确表示希望同我国加强粮食合作，建议国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机制及双边合作机制为平台，加快与各国政府进行磋商协调，推动建立多边及双边粮食贸易合作多层级会晤协调机制，签署落实原粮进出口等相关贸易合作协定，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不损害粮农利益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粮食企业从中南半岛正常渠道进口粮食，将中南半岛粮源作为西南省区、乃至全国粮食总量平衡的

重要补充调控手段，争取相关工作早日推进实施。

2. 把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作为全国粮食行业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试验示范区，在取得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资质基础上，把云南省磨憨、瑞丽、河口等边境口岸作为原粮进口的先行试验区，允许进口稻谷原粮。请求国家专项给予在滇中储粮直属企业、云南省国有粮食企业每年从周边国家老挝、缅甸、越南三国进口适量的稻谷原粮，专项用作储备粮轮换粮源，以储备轮换量决定进口粮食数量，定量进口，定向流通，定点监管。

3. 落实中央“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我国连接中南半岛各国铁路、高速公路和水运互联互通建设。目前，云南与周边国家的物流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尚未形成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运输成本较高、便利化水平还不够高。铁路交通对实现粮食远距离大规模流通意义重大，澜沧江等国际河流运输资源条件好、成本优势突出，建议国家在全国交通路网规划编修及项目实施中对云南给予倾斜，加大对云南与中南半岛各国、与邻省区跨区域铁路、高速公路和水运项目规划前期工作和建设的指导、协调、支持力度，加快互联互通运输通道建设步伐。

4. 给予云南开展中南半岛粮食贸易通道建设专项扶持，在磨憨、瑞丽、河口等口岸跨境边境经济合作区给予云南资金支持，建设粮食贸易加工、仓储和物流中转中心（站库）等基础设施。在对中南半岛国家经济援助项目计划中，安排并逐步增加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境外合作援助项目。

5. 加强同中南半岛国家政府间的磋商协调合作，积极推动实施《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简化粮食贸易合作等人员、货物出入境查验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合作开展跨境公路粮食等货物试运输，并授权云南与相邻国家开展过境（转口）贸易，积极构建我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便捷的粮食物流运输体系。

6. 鉴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实力显著增强的有利条件，调整放宽边民互市贸易中从周边国家进口大米、玉米的管理政策，建议由限量标准改为每人每天免税进口 8000 元的限价标准，在边民互市贸易中将进口周边国家大米、玉米视同其它普通农副产品进行管理，实现大米、玉米通过边民互市贸易常态、有序进口。

7. 给予云南粮食进出口贸易特殊支持政策。请求国家加大对符合条件的云南企业“走出去”在中南半岛五国开展粮食农业合作返销进口粮食关税配额支持，适当降低关税配额支持的“门槛”。继续加大对云南替代种植项目下粮食类产品返销进口关税配额支持。建议海关总署提高云南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居民边民互市进口的金额或数量规定额度。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税务总局和商务部等部门统筹研究给予税收

优惠政策，适当降低云南大米进口税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关税壁垒降到零以前，对进口粮食配额商品给予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

8. 在设立进口粮食指定口岸上给予云南省中越、中老、中缅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给予倾斜支持。在云南省瑞丽、畹町口岸已经获得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资格的基础上，指导支持磨憨、河口、孟连（勐阿）等口岸尽快获得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资格。

9. 国家有关部委协调解决“替代种植”项目下境外每年 6 月—7 月下达的粮食产品返销进口计划《批准证》有效期延长至当年 12 月 31 日止，以适应“替代种植”项目下境外粮食收获季节实际。从服务禁毒、服务民生的实际出发，给予取得“替代种植”资格的企业增加新的“种植品种”；对从事境外农业种植合作的投资企业的农业生产产品返销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相关收费给予优惠或减免。

10. 国家相关部委协调解决对边境贸易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恢复实行进口税收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的政策，对减半征收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由中央财政全部返还地方，用于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二）云南省需着力解决的事项

1. 为加强领导，聚焦聚力统筹加快推进，建议省政府成立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领导小组，由省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厅、省粮食局、省商务厅、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昆明海关等部门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的日常工作。

2. 省委、省政府尽快研究出台支持打造云南与中南半岛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支持鼓励的政策措施。要整合资金投入，创新投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借鉴国际粮食贸易通行规则，在中南半岛周边国家通过灵活有效、互利互惠的适当方式建立粮食收储转运基地，掌握粮食关键物流资源，从源头上提高粮源掌控能力，实现做大做活与中南半岛国家粮食贸易的目标。

3. 云南省委、省政府从涉外地方交流层面推动周边国家向中国提出粮食农产品输出中国的检验检疫准入申请，并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加快风险分析评估，力促双方尽早达成进口协定。

4. 云南省要继续加大对粮食走私的打击力度。有关部门加强对缅粮食进口管理，加强管控，严打边境粮食走私，严禁非粮食进口指定口岸开展粮食进口业务，大力支持粮食进口指定口岸规范有序地开展粮食进口。

5. 支持保障粮食贸易大通道项目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粮食贸易大通道项目建设优先

安排存量建设用地，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优先保障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粮食贸易通道涉及的粮食仓储、粮食物流、粮油加工等项目建设用地给予减免税费的政策支持。对国有粮食企业自筹资金参与粮食贸易大通道建设粮食仓库或通过置换“退城进郊”建设粮食仓库、粮食产业园区、物流建设用地纳入国有建设用地给予免收相关税费的政策支持。对使用政府性资金建设的粮食贸易大通道项目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和粮食批发市场，未经省级或州市级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处理或变更用途。

6. 支持粮食流通部门先行先试。在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面向东南亚、南亚辐射中心和周边国家粮食生产、进出口贸易的实际，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支持云南粮食流通部门先行先试，支持外向型粮食产业基地建设，突出重点、突出特色、注重实效，充分发挥粮食部门职能作用，服务云南和国家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 程国强：《重塑边界：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2. 孔志坚：《云南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粮食贸易的 SWOT 分析》，《云南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3. 卢良恕、王健：《粮食安全》，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4. 公茂刚：《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5. 约翰。马德莱著，熊瑜妤译：《贸易与粮食安全》，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

6. 孔志坚：《缅甸粮食安全及其政策分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 年第 4 期。

7. 洪凯：《世界粮食危机影响下的东南亚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策》，《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5 期。

8. 王耀鹏：《中国粮食流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 年版。

责任编辑：艾　冰

·产业发展·

设计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和趋势

林笑跃　吴　溯

摘要：本文基于专利统计数据，阐述了国际、国内的设计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以知识产权为视角分析了中国设计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通过数据整理、案例分析，本文总结了中国企业在设计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从国家政策和企业管理两个层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国内企业发展设计创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参考。

关键词：设计创新　知识产权　外观设计专利

作者简介：林笑跃，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审查部部长；
吴　溯，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审查部主任科员、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　　言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整体升级，设计创新增加产品的附加值①。对于某些技术成熟的产品类型而言，如手机、服饰等，设计创新则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的直接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领先的企业要维系这种优势，就必须有知识产权保驾护航。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公司，早已将知识产权作为武器，

①范沁红：《设计创新与知识产权的关系》，《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 年第 4 期。

在设计创新的竞争中打得如火如荼。例如，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的专利诉讼已在美国、韩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地上演 50 余场[①]。在美国，加州圣何赛地区法院曾判决三星公司侵犯苹果公司的六项专利，需支付 10.5 亿美元赔偿金，并面临禁售可能性，这六项专利中三件为外观设计专利，三件为人机交互设计的发明专利[②]。应该说，创新与知识产权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好的设计创新是知识产权创造的基础，而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则能激励企业持续地设计创新。设计创新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往往也体现在知识产权数据中。因此，本文基于专利统计数据，阐述了国际、国内的设计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以知识产权为视角分析了中国设计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通过数据整理、案例分析，本文总结了中国企业在设计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从国家政策和企业管理两个层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国内企业发展设计创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参考。

一、国际设计创新发展状况

（一）设计创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

欧盟、美国、日本等传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创新发展较早，无论是设计创新、还是创意设计，均处于领先地位。欧盟的英国、德国等由于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在设计创新方面具有先发优势。美国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就已经基于激烈的商业竞争，开启了为企业服务的设计创新运动[③]，推动了设计创新与产业的有机融合，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例如苹果公司系列产品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设计创新为其带来的区别于其它产品的竞争优势。而日本本身有良好的艺术传统，在明治维新后又潜心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先进事物，日本在 20 世纪初积极向包豪斯的设计师、美国罗维等著名设计师学习设计，并推动了日本设计融合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设计风格的形成[④]，在国际上也具有较大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传统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设计创新也逐步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老牌发达国家保护设计创新的知识产权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并进入平稳期。这种设计创新的国际转移也体现在外观设计专利的数量上。从中国

①张绪旺：《苹果诉三星大获全胜，评论称是乔布斯生前规划好的战争》，《北京商报》，凤凰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usstock/Special/20120827/6945199.shtml。

②JohnTian：《详述三星侵犯苹果的 6 项专利》，36 氪，http：//www.36kr.com/p/148763.html。

③杨浩：《浅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设计创新运动》，《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

④赵娟、郑铭磊：《学习交融再创新—日本现代设计发展的启示》，《美术大观》2014 年第 4 期。

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的申请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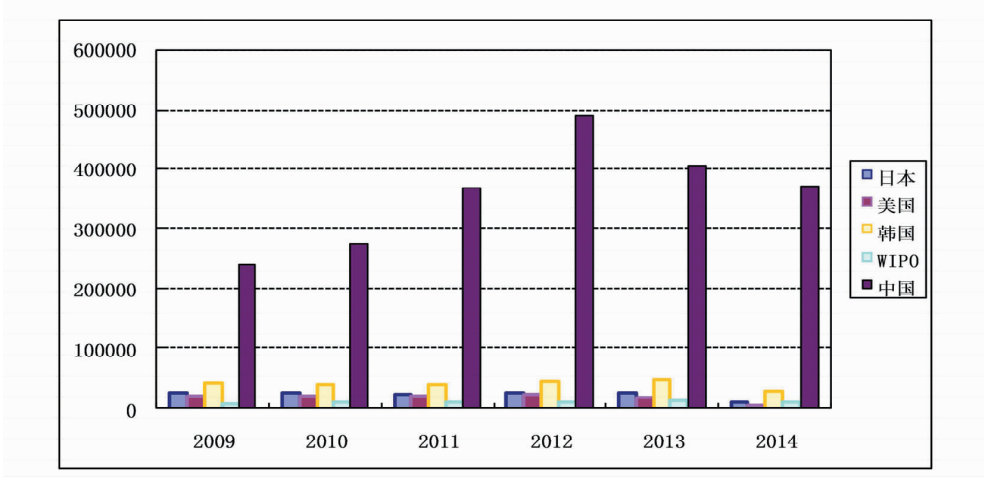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授权量的比较（申请日处于 2009 年—2014 年）

资料来源：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公报。

从中国以外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看，申请量增长率普遍较低，申请量进入平稳期。其中韩国作为后来崛起的国家，在资源，技术方面相对于美国、日本等老牌发达国家仍较落后，其在 1997 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了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明确了发展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的目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日趋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①，因此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仍有相对明显的增长趋势。

（二）传统产业稳步发展，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结构出现逐步调整趋势。例如纺织类产品仍平缓上升，而家具类产品，包装类产品的申请量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电子终端类产品的申请量则有相对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稳步发展，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的趋势。

（三）知识产权制度顺应设计创新发展的趋势

随着传统产业稳步发展，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国际上知识产权制度也顺应设计创新发展的趋势有了新的发展。其中较具特点的有局部外观设计（Partial Design）制度和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简称 GUI）保护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是指对产品局部的设计创新进行保护的制度。在设计创新的实践中，设计师有时候会做出具有颠覆性的产品整体设计创新，但更多时候是对产品的某些局部进行改良性的局部设计创新。因此，通常认为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更贴近设计的本质，尤其

①李菲菲、华大敏、王斌：《韩国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与启示》，《大众文艺》2013 年第 2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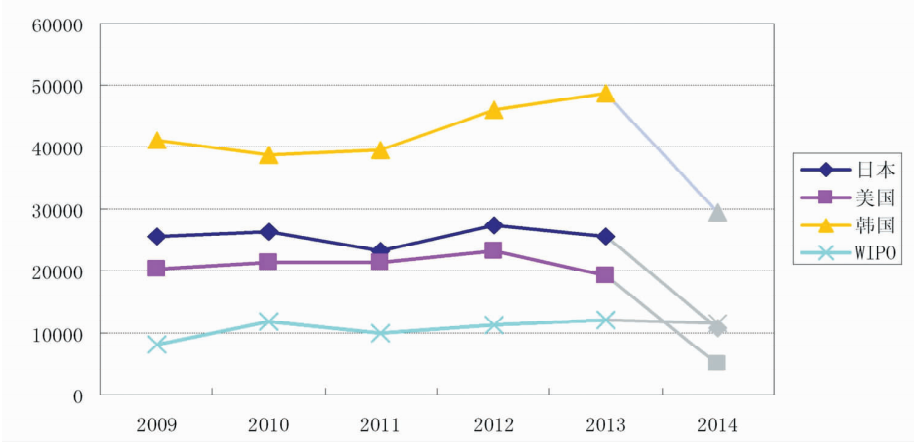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以外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授权量（申请日处于 2009 年—2014 年）

资料来源：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公报。

注：在 2014 年以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海牙协定成员国主要来自欧洲地区，因此相关数据主要反映欧洲地区情况。此外，由于日本、美国、韩国均有实质审查制度，因此申请日处于 2014 年的一部分外观设计申请尚未公告，导致 2014 年呈现的数据为不完整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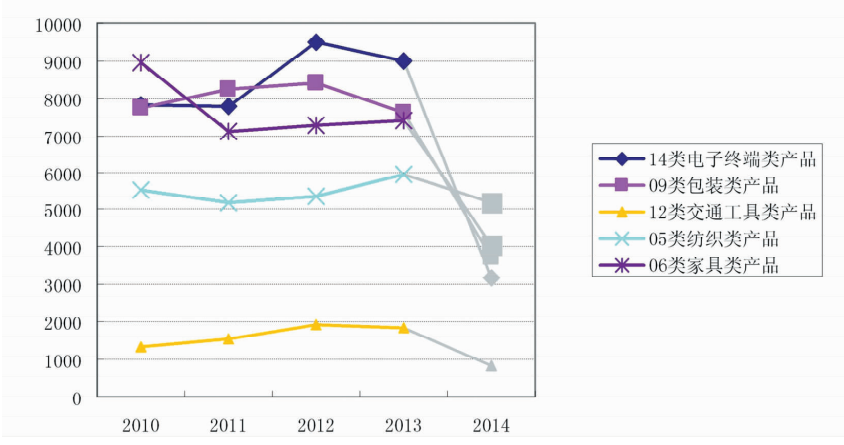


图 3　主要国家和地区（不含中国）申请结构的调整（申请日处于 2009 年—2014 年）

资料来源：主要国家和地区外观设计公报。

注：2014 年呈现的数据因未完全公告，为不完整数据。

是在设计创新日趋精细化的时代更是如此。该制度也因此成为趋势并先后被包括美、欧、日、韩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用。例如，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判例确立了局部外观设计制度；欧盟在 2002 制定共同体外观设计保护条例时，即将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纳入保护体系之中；日本于 1999 年通过修改专利法引入局部外观设计制度；韩国在 2001 年引入局部外观设计制度①。如苹果公司在美国申请的局部外观设计专利 29339382，要求

①严若艳等：国家知识产权局学术委员会一般课题《部分外观设计保护研究》（课题编号：Y140401）。

保护的是实线绘制的椭圆形槽的局部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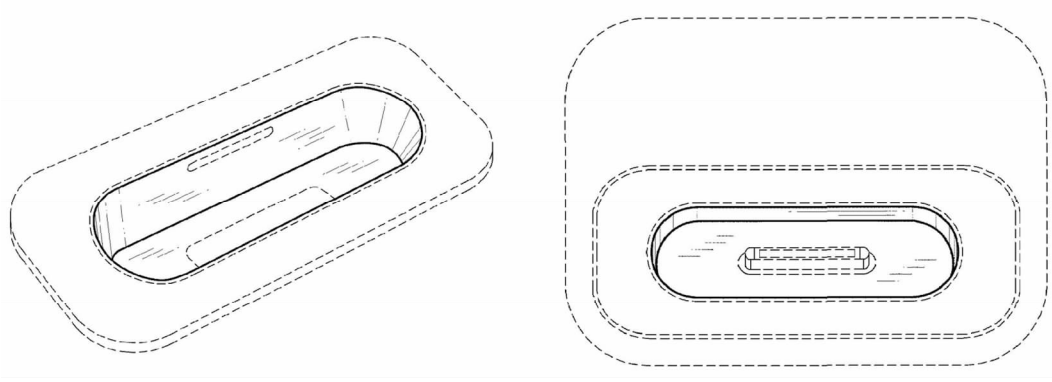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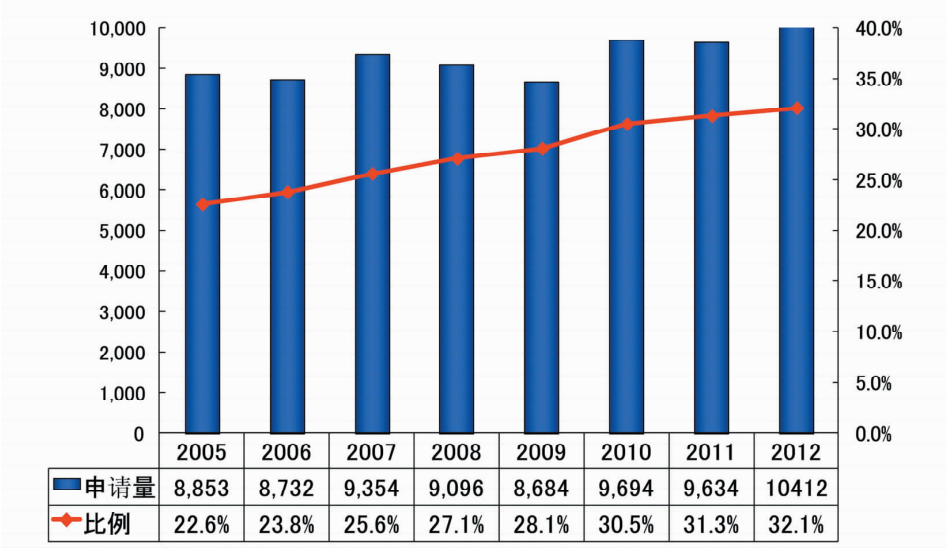


图 4　苹果公司在美国申请的局部外观设计专利 29339382，Dock insert

日本特许厅统计了日本在引入局部外观设计制度之后，申请人对局部外观设计制度的利用情况，可以看到，整体利用率逐步上升并趋于稳定。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申请量	8,853	8,732	9,354	9,096	8,684	9,694	9,634	10412
比例	22.6%	23.8%	25.6%	27.1%	28.1%	30.5%	31.3%	32.1%

图 5　日本局部外观设计申请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特许厅。

图形用户界面保护制度，通常是指对产品显示装置上显示的图形交互界面进行保护的制度。随着技术和设计的发展，设计创新的结构不断调整，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在计算机、电子终端设备、家电、互联网等领域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物理实体产品设计，因此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在 2000 年前后陆续确立了图形用户界面保护制度①。从美国的

①吴湖、孟雨、谢怡雯、陈晓：《设计之战——移动终端工业设计的知识产权博弈》，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

申请情况看，图形用户界面保护申请在 2012 年之前呈快速上升趋势，之后有所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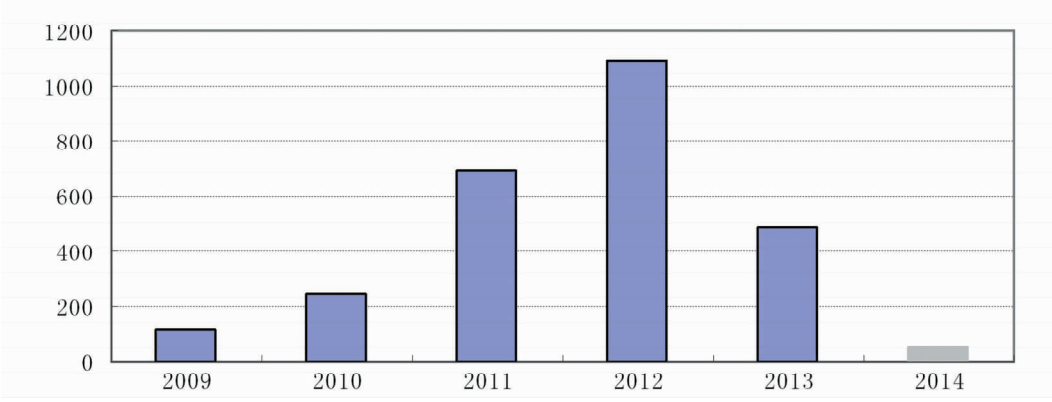


图 6　美国图形用户界面申请情况（2009 年—2014 年）

资料来源：美国外观设计公报。

注：2014 年呈现的数据因未完全公告，为不完整数据。

二、中国设计创新与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和趋势

（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趋稳、结构优化

从中国 2008 年至 2014 年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情况看，2008 年至 2012 年增长率较高，增速明显。但 2012 年至 2013 年申请量趋于稳定，2014 年申请量略微下降，增长率有较明显的下降。这与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以及设计创新的结构调整有一定关系（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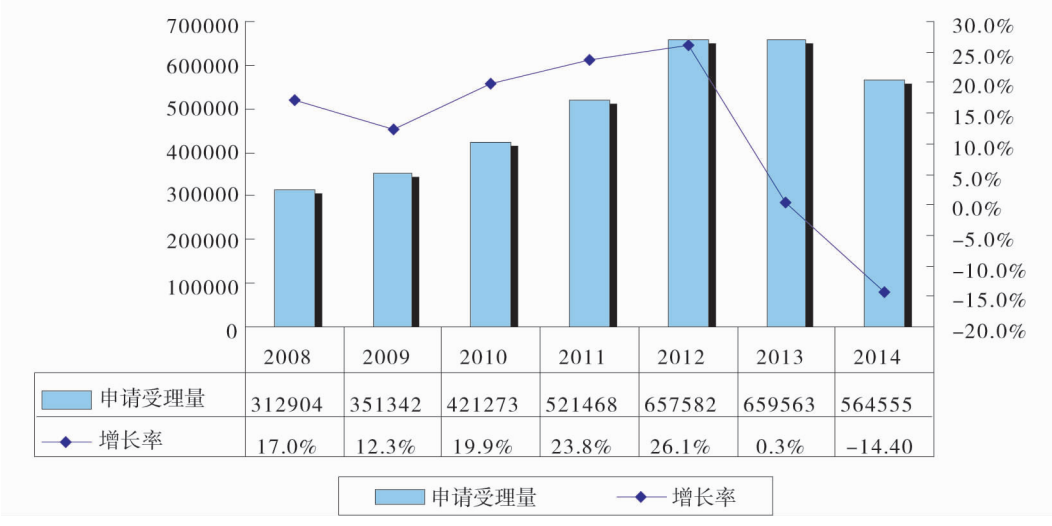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受理量（2008 年—2014 年）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具体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设计创新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结构在不断优化。在 2012 年之前，纺织类产品和包装类产品申请量较大且增长速度较快，但在 2012 年以后，上述两类产品申请量有较明显的下降，尤其是纺织类产品下降幅度最大。而家具类、交通工具类和电子终端类产品仍然保持持续稳步上升的趋势（见图 8）。

图 8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结构优化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海外布局

在中国设计创新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布局海外。在家具、玩具、小家电等中国设计创新较为成熟的产品类型上均有外观设计专利的海外布局（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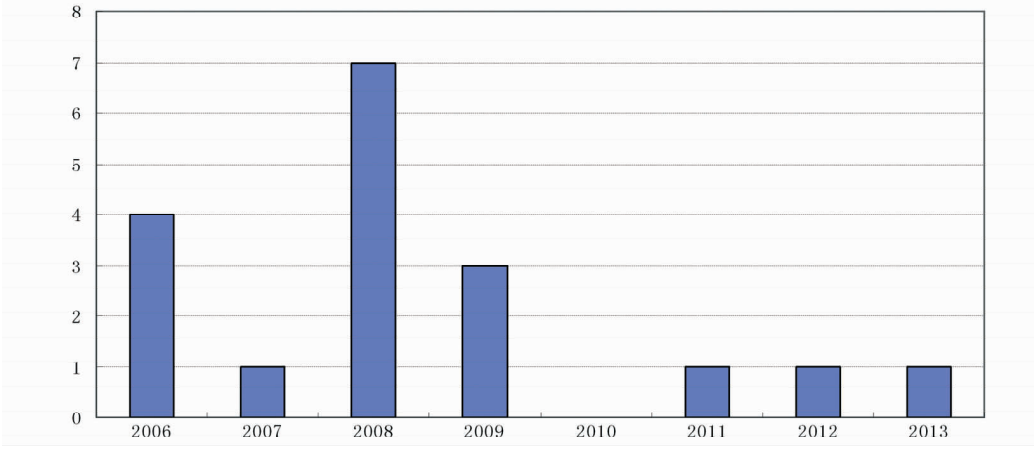


图 9　广东企业在美国申请家具类外观设计专利情况（申请日累计至 2013 年）

资料来源：美国外观设计公报。

而在海外申请量最大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企业的外观设计。以深圳企业在美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情况为例，可以看到计算机和互联网公司就产品和图形用户界面在美国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 2012 年以后，腾迅、中兴等企业在美国开始提交一定数量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设计创新已经开始走向全球市场（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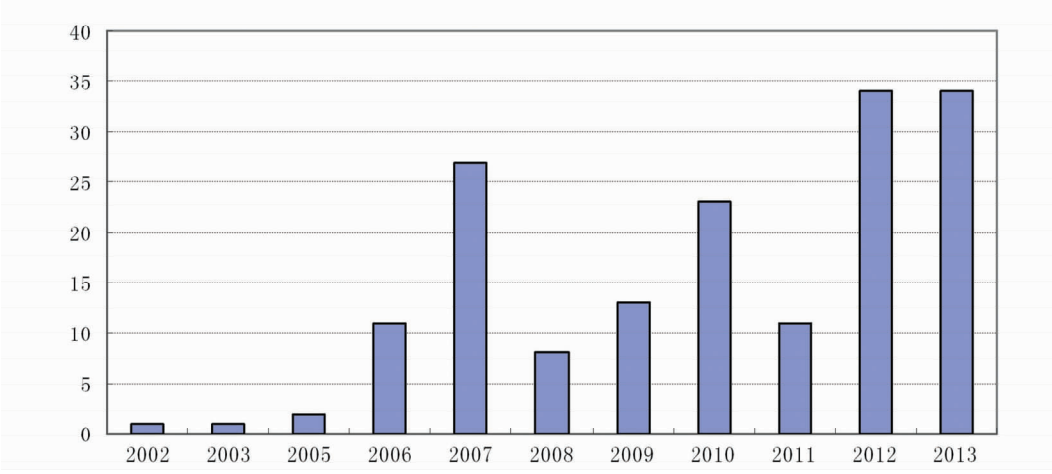


图 10　深圳计算机和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1402、1403、1404）

资料来源：美国外观设计公报。

（三）外观设计专利运用及维权数量提高

中国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在实践中，阿里巴巴及旗下的天猫、淘宝等网络平台在处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投诉时，同样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评价报告。因此，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观设计专利的运用和维权的情况。从 2010 年至 2014 年，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的申请量和完成量分别从 33 件和 18 件，提高至 4052 件和 3606 件，以每年近 200%的速度持续增长，意味着外观设计专利的运用和维权数量显著提高。

（四）中国外观设计制度的新发展

中国外观设计制度也顺应设计创新发展的趋势，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 2014 年发布了第 68 号局令，修改了《专利审查指南》，将符合条件的带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纳入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客体，并从 5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修改后的《专利审查指南》，在九种常见的带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中，可以获得保护的带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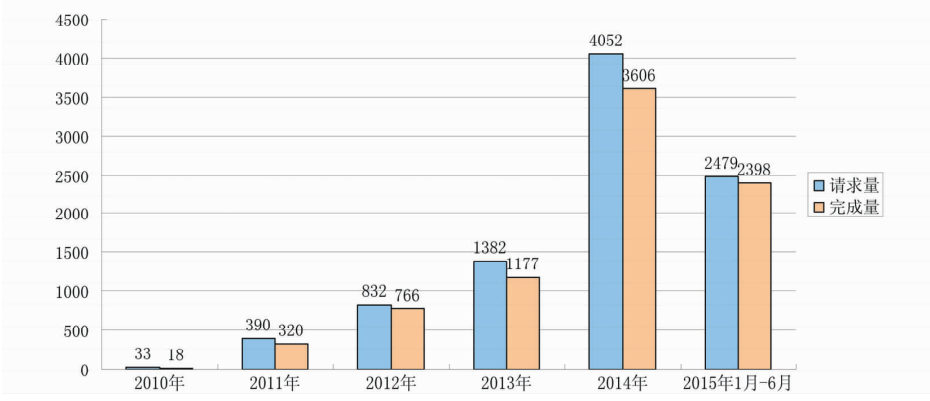


图 11　2010 年—2015 年外观设计专利评价报告请求量和完成量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用户界面的产品类型有五类，包括带设备专用界面的产品、带通用操作系统界面的产品、带应用软件界面的产品、带网页应用的产品、带图标界面的产品。

根据修改后的《专利审查指南》，不能获得保护的带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类型有四类，包括带网站网页的图文排版的产品、带电子屏幕壁纸（及屏保动画）的产品、带开关机画面的产品、带游戏界面的产品。

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启动了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在 2015 年 4 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拟通过修改《专利法》第二条第四款在中国引入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①。

三、从知识产权看设计创新

（一）电子终端领域国内企业加快追赶步伐

电子终端领域在国内外外观设计专利中均为活跃领域，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结构中处于稳步上升的产品类型。总体而言，目前国外企业在该领域仍占据优势地位，国内企业正在加快追赶步伐。在截至 2014 年在华电子终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中，三星、LG 和松下等日本和韩国企业仍排名靠前，但可以看到华为终端和华为技术两家华为其下企业的申请量总和已经接近三星的申请量。青岛海信、中兴、四川长虹等企业的申请量也已经超过松下的申请量。

①第二条第四款修改为“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详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 SIPO. GOV. CN/TZ/GZ/201504/T20150401 _ 1095939. HTML，2015 年 4 月 1 日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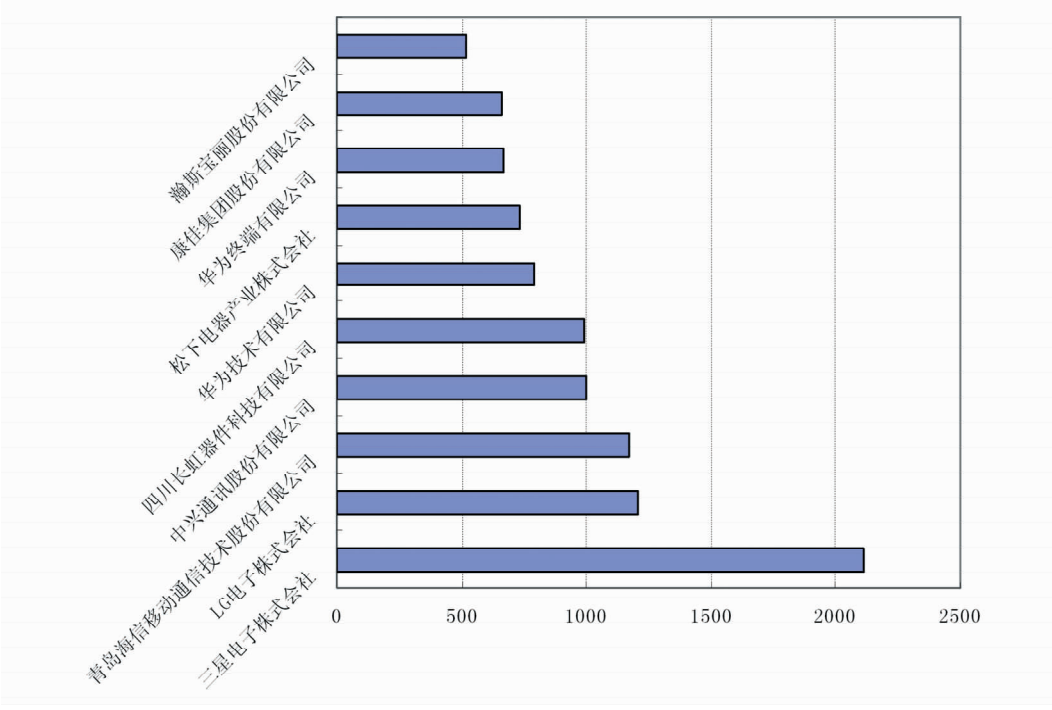


图 12　电子终端类（1403 类）外观设计专利权人排名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选取申请量最大的四家企业（华为终端和华为技术申请量合并）具体分析，从 2009 年至 2014 年，可以看到在近六年来华为的申请量已经超过三星，中兴和青岛海信与三星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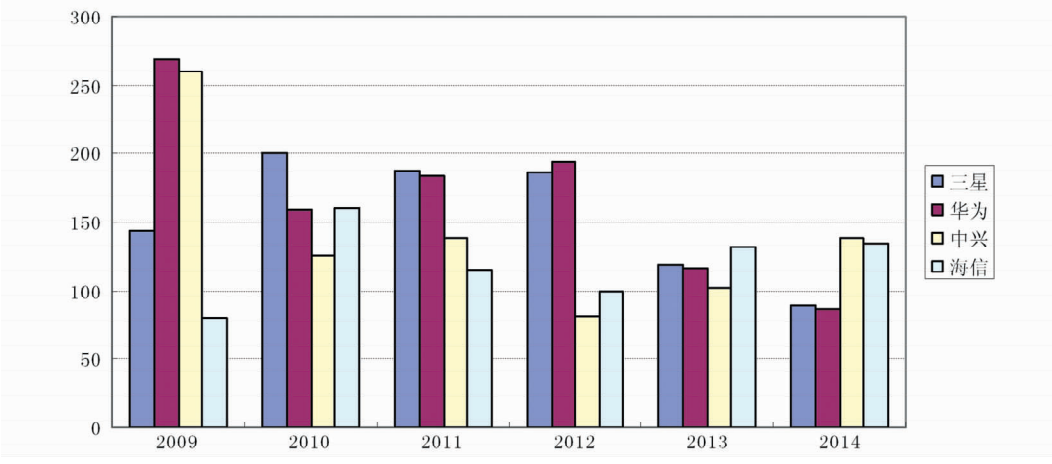


图 13　四家企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从具体企业看，国内公司在设计创新方面不断有新突破，例如联想公司的平板电脑产品 Lenovo Yoga Tablet 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330104790.4），因具有极佳美学感受和使用体验而在 2014 年获得第十六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外观设计专利金奖。

（二）“互联网＋”促进软件和互联网企业发展迅猛

在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舞下，“互联网＋”企业不断发展，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软件和互联网企业也发展迅猛，由此带来的相关设计创新层出不穷。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适应设计创新发展的趋势，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将带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纳入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客体。自该制度实施以来的涉及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据，也反映了软件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在图形用户界面保护制度刚刚实施的 2015 年 5 月份，积累多时的 2500 多件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出现了密集申请的现象，之后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回归到正常水平，并且稳中有升（见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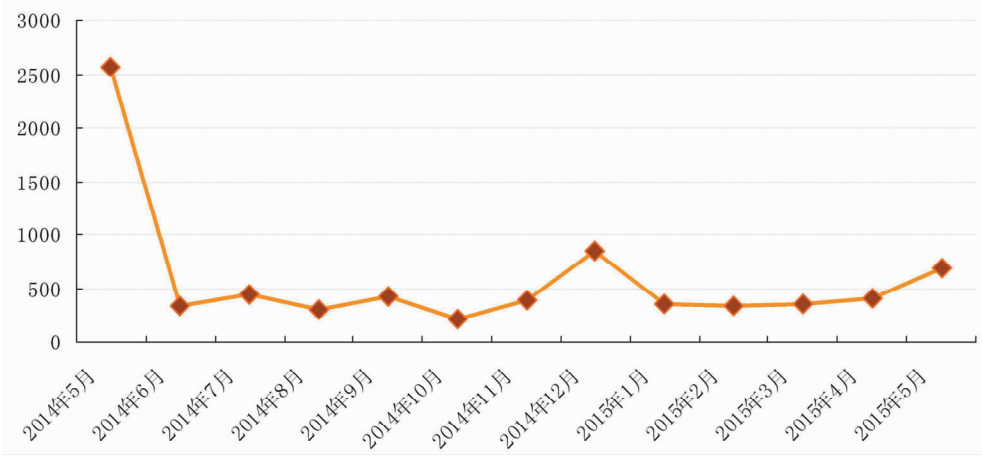


图 14　图形用户界面申请情况

从图形用户界面申请的结构看，手机、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的图形用户界面申请量占绝大多数，分别为 32%和 23%，主要与应用软件、手机 APP 等设计创新相关（见图 15）。

（三）汽车领域从引进吸收走向自主创新

汽车领域设计创新在国际国内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结构中均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尤其是中国汽车领域的设计创新，正逐步从引进吸收走向自主创新。

在中国汽车产业刚刚起步时，国内的大部分汽车企业主要以引进国外成熟车型为主，

部分国内研发的车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国外的汽车设计，奇瑞的QQ汽车还曾因为外观设计与国外某款车型的外观设计专利较为接近而被起诉。但近几年，国内汽车企业不断加大设计创新的投入，在新车型设计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方面有明显的提升。以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的申请情况为例，在2009年以后上述公司的申请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一汽自主创新研发的奔腾X80汽车，应用了获得第十六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的“汽车（D003）”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ZL201230520810.1），以持续热销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见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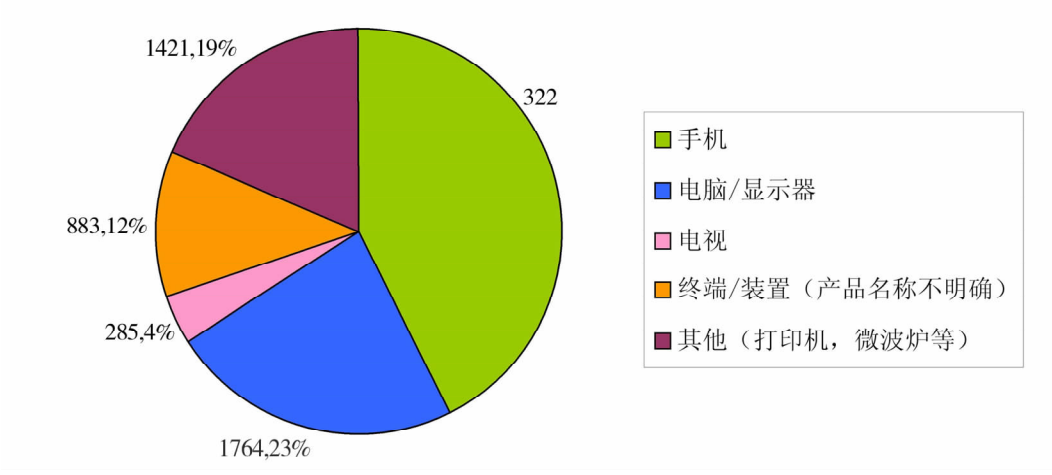


图 15　图形用户界面申请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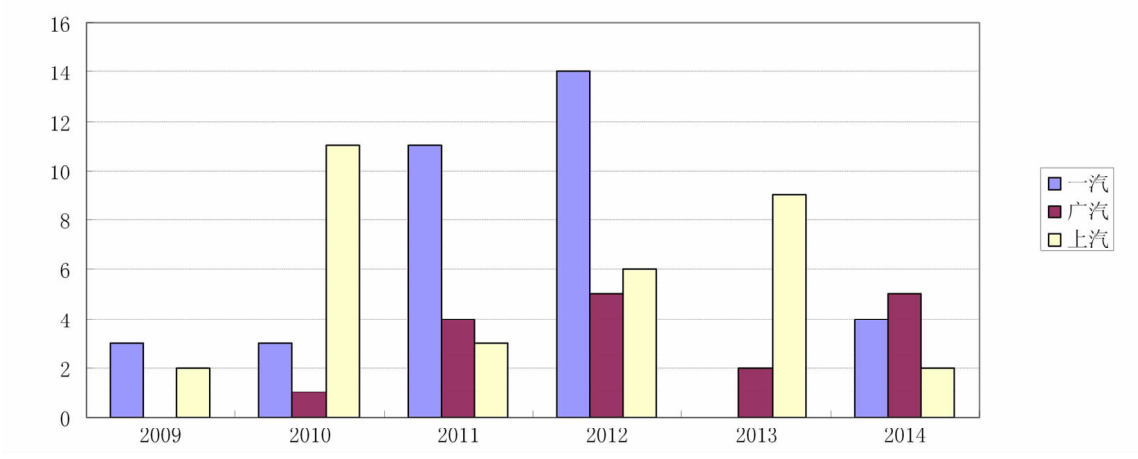


图 16　主要汽车企业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情况

四、中国设计创新知识产权发展的不足

（一）设计创新水平与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参差不齐

总体而言，中国的设计创新水平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整体呈现日益提高的发展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区域、产业、企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区域上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制造业和高新科技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地区。家具类、交通工具类和电子终端类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但近年来值得高兴的是：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地的家具类、童车类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一定程度反应了设计创新能力正在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转移。从产业上看，在电子终端领域，中国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稳步提升，例如华为、联想的外观设计专利质量不断提升，与国际一线企业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值得注意的是，以百度、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 GUI 设计上的水平已经不亚于跨国企业。在汽车领域，目前虽然有部分重视自主创新的企业设计水平稳步提高，但从整体行业看与国外企业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二）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意识有待提高

中国企业在家具、玩具、小家电、计算机和互联网等领域的设计创新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从其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申请专利的情况看，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意识仍有待提高。以家具企业为例，广东的家具产业较为发达，但其在美国等国的专利申请量却并不高，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虽然计算机和互联网企业在海外布局的意识已经逐步加强，但就专利申请量看仍低于国外的同类型企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海外，通过知识产权海外布局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将是未来中国企业的必修课。

（三）企业的知识产权运用、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中国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但企业对于专利的运用、管理能力仍有待提高。一方面体现在外观设计专利的维持率、转化率不高，许多专利被申请后维持时间并不长。另一方面体现在企业在外观设计专利的分析、预警、维权、许可等方面管理能力还略显不足，许多中小企业甚至并不具备与企业规模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知识产权管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专利挖掘，专利申请的层面上，在企业中由研发部门人员兼职专利挖掘工作，并主要依赖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申请，并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机制。但可喜的是，随着大众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发展，目前许多新创企业和

设计创新驱动型企业，已经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五、建　　议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设计创新和知识产权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通过知识产权战略的有效实施，将设计创新的成果转化为企业、产业乃至于国家的竞争优势，需要国家和产业界共同努力。

（一）国家层面

1. 积极扶持和引导设计创新领域的平衡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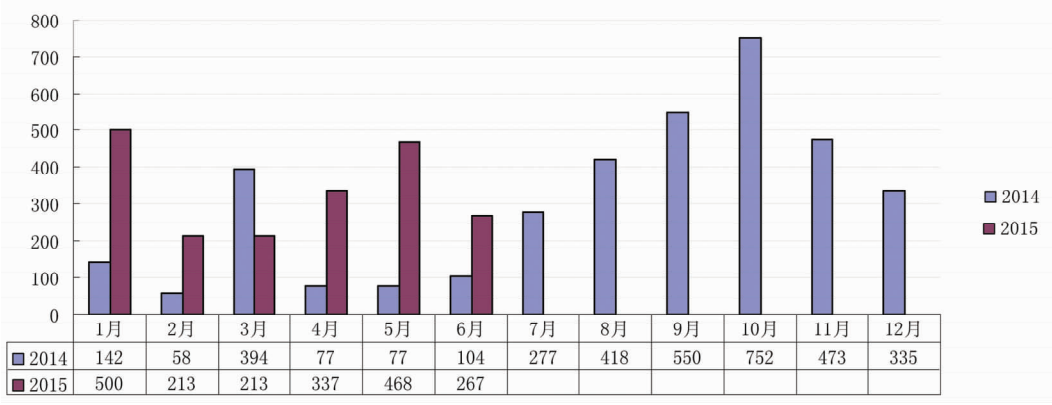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强化知识产权意识，重视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工作，对产业界设计创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出台积极的扶持和引导政策。继续推广普及电子申请，为企业提供更方便的专利申请服务；在产业聚集区协助建立有一定实力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引导企业利用专利数据了解掌握国内外相关领域设计现状以及发展趋势；通过设立奖项等方式引导和鼓励企业重视设计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为设计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的中国专利金奖，已经打造成为了一个引领创新和促进产业升级、推进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平台。其中电子申请自推广以来受到广大创新主体的欢迎，截至 2014 年，电子申请占总申请的比例已经从 2008 年的 1.1%提升至 2014 年的 88.4%，极大方便了设计创新主体通过外观设计专利保护自己的权利（见表 1）。

表 1　电子申请数量和占总申请量的比例　　（单位:%）

年度	电子申请量（件）	所占总申请量的比例（%）
2008	3545	1.1
2009	32397	9.2
2010	120888	28.7
2011	359520	68.9
2012	545773	86.0
2013	570843	86.5
2014	499102	88.4

此外，根据设计创新产品市场机会转瞬即逝、企业对快申请、快维权诉求强烈的特点，国家知识产权局近年来还批准设立了若干家位于全国各地的，集专利申请、维权援

助、调解执法、司法审判于一体的多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方面给予了必要的行政和技术支持，成为政府服务产业发展的突出典范之一（见图 17）。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4	142	58	394	77	77	104	277	418	550	752	473	335
2015	500	213	213	337	468	267						

图 17　快速维权中心 2014 年—2015 年申请数量变化

2. 完善法律法规，优化发展环境

在国际上，中国应积极研究海牙协定、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等国际外观设计制度的合作协定，并基于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需求，积极谋求加入并推动国际协定的发展，使国内企业能在知识产权的保驾护航下走向海外。在国内，自专利法出台以来，历经三次修改，对专利权的保护不断加强。目前中国正启动第四次专利法修改，有多个拟修改条款涉及设计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立法机构、司法机关和国家行政部门仍需要继续通过产业调研等形式及时了解产业和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诉求，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政府宏观管理能力，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健全激励和保障中国设计创新企业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推动更多企业成为设计创新主体。

（二）产业界层面

设计创新的发展不能只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产业界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也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主体，企业自身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才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1. 鼓励设计创新，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

设计创新水平是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基础，也是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企业都十分重视产品的设计创新，这也是他们开发的新产品赢得市场的法宝之一。然而，在中国，除了个别领先企业，大多数企业仍然不够重视设计创新，缺乏设计创新意识。必要的时候，企业应当出台激励政策，鼓励设计人员创

新，避免设计人员的流失，同时提高设计人员的积极性。

2. 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企业应当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负责将企业的设计创新成果及时转化为知识产权。企业还应当建立完善的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制定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并将知识产权管理纳入企业管理的范畴，从而在企业内部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良好环境。

3. 提高维权意识，以评价报告为依据保护创新

企业应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维权意识，遇到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时，应积极诉诸司法、行政途径，或网络电商平台的投诉机制寻求保护。维权的前提是确认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稳定性，而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是用于判断外观设计专利权利稳定性的重要证据，因此企业应认识到专利权评价报告的价值和重要性，在维权过程中合理运用评价报告。

4. 积极探索知识产权海外布局，为出海护航

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市场是必然趋势，而设计创新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企业随着实力的增强纷纷进军海外市场，但知识产权方面步伐却仍显落后。因此，国内企业一方面应提高海外布局意识，积极谋求海外布局。另一方面需要积极了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通过目标市场本土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协助，更好地完成海外布局。

责任编辑：艾　冰、方　虹

·权威观点·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5 年 12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未来两年世界经济将温和回暖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发布《2016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未来两年世界经济仅有小幅改善，预计 2016 年和 2017 年世界经济将分别增长 2.9%和 3.2%。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估计仅为 2.4%，比半年前预测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世界经济正面临五大不利因素：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和贸易疲软、汇率和资本流动波动加剧、投资和生产率增长停滞、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之间脱节。

受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资本大规模外流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增速下降到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经济增长的部分中心将再次转移到发达经济体。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增长 4.3%和 4.8%，南亚已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 2016 年增长 6.7%；对发达经济体 2016 年的预期是，美国经济增长 2.6%、欧盟增长 2%、日本增长 1.3%。广泛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短期的减贫进度以及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推动包容性增长，应在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层面进行更有效的政策协调。

（二）2016 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升高

巴克莱资本经济学家在 2015 年 12 月 24 日公布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在美联储继续加

息、新兴经济体经济继续放缓等因素影响下，2016 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正在升高。

具体而言，预计 2016 年发达经济体将继续稳步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可能维持疲软态势。全球经济整体将继续维持低速增长，但不会陷入衰退。全球消费依然强劲，但贸易、投资和制造业处于衰退之中。新兴市场并未出现向好趋势，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新兴市场整体，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仍将造成广泛的冲击，财政动能恶化以及地缘问题也令人担忧。美联储 2015 年 12 月开启加息周期之后，可能会非常谨慎，预计加息进程将非常缓慢。而随着美联储加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暂时不愿进一步加大宽松规模，全球流动性下降，有可能加剧 2016 年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三）2016 年全球经济将令人失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 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德国商报发表文章称，全球举步维艰的经济复苏在 2016 年将继续令人失望。美国加息及中国经济放缓的前景都加大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可能使全球经济更为脆弱。此外，全球贸易增长出现明显放缓，而原材料价格下滑对依赖于此的国家造成了问题，同时许多国家的金融业存在弱点，新兴市场的金融风险也在升高。所有这些都意味着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令人失望且不平稳。同时，低生产率、人口老龄化及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都阻碍了经济增长。IMF 预计，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 3.6%。

美联储在 2015 年 12 月宣布了近十年来的首次升息，并明确表示这是缓步紧缩周期的尝试性开端。拉加德指出，鉴于升息前景已经抬高了一些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其中包括新兴及发展中市场的借款人，因此会有“潜在的溢出效应”。美国货币政策开始正常化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转向新模式是“必要和健康的”改变，但需要尽可能高效和顺利实施。尽管高度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国家，大致上比以往作了更好的准备来应对利率上升，但拉加德仍担心这些国家应对冲击的能力。除了美国及英国，多数高度发达经济体将继续需要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但这个范畴内的所有国家在决策时都需全面考虑溢出效应。此外，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可能引发企业债务偿付违约，这可能进而波及到一些银行和国家。

（四）2016 年全球经济将面临诸多挑战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 2016 年 1 月 4 日警告称，2016 年全球经济将面临诸多挑战，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焦点。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及金融条件收紧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放缓、资本流入减少、外汇储备下降和货币贬值等压力。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急跌，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多问题。

尽管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但美联储已经启动渐进加息进程，毫无疑问全球金融条件正在收紧。2016 年美联储如何管理后续加息，以及如何与市场进行沟通至关重要。此外，难民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也将是 2016 年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将进一步放大区域乃至全球经济风险。

（五）世界银行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9%

世界银行 2016 年 1 月 6 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把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期下调至 2.9%。虽然这一预期高于 2015 年的 2.4%，但仍处在不足 3%的危险水平。原因在于，来自海外的投资减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贸易低迷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疲软。同时，预测 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恢复到 3.1%。但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库西克·巴苏表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不景气超过预期，导致金融市场混乱，全球经济将急剧减速。

报告认为，美国的就业改善、内需坚挺，2016 年和 2017 年将保持 2%以上的经济增长；欧元区经济预计 2016 年将实现 1.5%以上的温和增长；2016 年日本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至 1.3%，反映出个人消费等内需和出口双双疲软的现实，考虑到日本的消费税税率预定于 2017 年 4 月上调至 10%，预测 2017 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回落至 0.9%；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而被美欧制裁，且受到原油价格下跌的严重影响，预计 2016 年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巴西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均不稳定，2016 年 8 月开幕的奥运会也无望带来刺激效应，预计经济仍无法摆脱衰退。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挑战仍存

高盛集团研究团队 2015 年 12 月 24 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持续，同时中国决策者主要担心的问题也仍然存在。201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放缓至 6.4%，为 1989 年以来最低水平，低于 2015 年预期值 6.9%。同时，有关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率的怀疑仍然不绝于耳，且对中国高杠杆和高坏账的担忧仍在持续。

高盛进一步称，美元的急速升值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压力；中国经济放缓以及人民币和美元绑定，可能为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带来更大压力；预测伴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尘埃落定，中国决策方关注的焦点将转为人民币贸易加权升值会削弱中国的出口优势。未来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应对能力将增强，而美联储利率“正常化”的步伐，以及中国在经济放缓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对全球影响的决定性因素。

（二）2016 年中国经济可能“惊吓”全球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 2016 年 1 月 4 日称，2016 年中国仍将是高度受关注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从投资和制造业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型，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对全球的溢出效应大于 IMF 预期。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无法达到政府目标，将有可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但如果中国一味追求增长目标则会加剧经济失衡，为未来增长埋下隐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 2016 年全球经济的一大风险，中国经济可能再次让全球金融市场受到“惊吓”。中国增速下降通过进口和大宗商品需求减少对全球产生溢出影响，这种影响比之前预计的大得多。在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疲软、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整体灵活性和合理性方面，还有一些结构重组的严峻挑战。

2015 年，A 股大幅震荡全球瞩目，上证综指虽然全年累计上涨逾 12%，年度振幅却高达 72%。2016 年 1 月 4 日是今年首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暴跌 7%，触发当天开始生效的熔断机制，导致 A 股提前收盘。受 A 股影响，亚太和欧美股市也都以暴跌开年。

（三）世界银行下调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6.7%

世界银行 2016 年 1 月 6 日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正为使经济发展模式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而进行改革，经济减速将持续。预测中国 2015 年经济增长 6.9%，2016 年的增速预期则从 7%下调至 6.7%。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库西克·巴苏认为，中国经济放缓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素，但报告也指出了一些相对乐观的方面。当中国经济向以消费和服务驱动转型，全球经济增长将出现温和回升。报告认为，中国高企的债务水平是一大主要的短期风险，其债务产出比率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高。尽管如此，在极小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情境中，中国政府仍拥有使用公共开支的足够空间，以刺激增长。换句话说，“硬着陆”的臆测不会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李　蕊

·国际统计数据·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预测值	2016 年预测值	2017 年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 月)				
世　界	3.4	3.1	3.4	3.6
发达国家	1.8	1.9	2.1	2.1
美　国	2.2	2.5	2.6	2.6
欧元区	0.9	1.5	1.7	1.7
日　本	0.0	0.6	1.0	0.3
发展中国家	4.6	4.0	4.3	4.7
印　度	7.3	7.3	7.5	7.5
俄罗斯	0.6	−3.7	−1.0	1.0
巴　西	0.1	−3.8	−3.5	0.0
世界银行(2016 年 1 月)				
世　界	2.6	2.4	2.9	3.1
发达国家	1.7	1.6	2.1	2.1
发展中国家	4.9	4.3	4.8	5.3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 月)				
世　界	2.8	2.6	2.7	3.0
美　国	2.4	2.4	2.5	2.5
欧元区	0.9	1.5	1.7	1.7
日　本	−0.1	0.6	1.2	0.6
印　度	7.3	7.4	7.8	7.7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预测值	2016 年预测值	2017 年预测值
世　界	3.4	2.6	3.4	4.1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0	3.7	4.1
发展中国家	3.7	0.4	3.4	4.3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1	3.4	
发展中国家	2.9	3.9	4.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1 月预测,其中出口数据为 2015 年 10 月份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预测值	2016 年预测值	2017 年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 月)				
发达国家	1.4	1.4	0.3	1.2
发展中国家	5.9	5.1	5.6	5.1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 月)				
世　界	2.8	2.6	1.9	2.4
美　国	1.5	1.6	0.2	1.7
欧元区	1.4	0.4	0.1	1.0
日　本	0.4	2.7	0.8	0.7
印　度	9.5	6.0	5.0	5.4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经济体 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4 年		3.6	1.7	7.8
	11 月	3.5	2.9	4.8
	12 月	3.5	2.8	5.0
2015 年				
	1 月	3.1	2.4	4.7
	2 月	3.2	2.4	5.0
	3 月	3.3	2.4	5.2
	4 月	3.1	2.0	5.4
	5 月	3.1	2.0	5.4
	6 月	3.1	1.9	5.5
	7 月	2.9	1.8	5.2
	8 月	2.8	1.6	5.2
	9 月	2.5	1.3	5.2
	10 月	2.5	1.3	5.1
	11 月	2.6	1.3	5.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全球 PMI	产出指数	新订单指数
2014 年		3.2	2.7	5.2			
	12 月	3.2	1.8	5.4	51.5	52.0	52.0
2015 年							
	1 月	3.2	1.7	4.1	51.7	52.9	52.2
	2 月	2.5	1.4	4.3	51.9	53.2	52.2
	3 月	2.5	1.5	4.2	51.7	53.3	52.1
	4 月	1.9	1.1	4.1	51.0	51.7	51.0
	5 月	1.9	0.7	3.7	51.3	51.9	51.4
	6 月	2.5	1.3	4.5	51.0	51.4	51.3
	7 月	2.5	0.8	3.7	51.1	51.7	51.3
	8 月	2.5	1.3	4.2	50.7	51.0	51.4
	9 月	1.9	0.8	3.2	50.7	51.0	51.4
	10 月	2.5	0.8	4.0	51.3	51.9	52.0
	11 月	1.2	0.0	3.2	51.2	52.3	51.4
	12 月				50.9	51.7	51.1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0.9	1.3	0.0
	2 季度	4.6	3.8	1.2
	3 季度	4.3	3.5	1.8
	4 季度	2.1	4.3	−1.4
2015 年				
	1 季度	0.6	1.8	−0.1
	2 季度	3.9	3.6	2.6
	3 季度	2.0	3.0	1.8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3	3.4	3.8
	1 季度	6.0	−6.7	2.8
	2 季度	5.6	9.8	9.6
	3 季度	7.9	1.8	−0.8
	4 季度	2.5	5.4	10.3
2015 年				
	1 季度	3.3	−6.0	7.1
	2 季度	5.2	5.1	3.0
	3 季度	3.7	0.7	2.3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1.7	2.0	−1.8
	2 季度	2.6	2.6	−1.0
	3 季度	2.9	3.0	0.0
	4 季度	2.5	3.2	0.4
2015 年				
	1 季度	2.9	3.3	0.4
	2 季度	2.7	3.3	0.7
	3 季度	2.1	3.1	0.7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1.5	1.7	-2.9
	4 季度	2.5	2.3	-2.9
2014 年		5.3	3.4	3.8
	1 季度	4.4	3.1	2.9
	2 季度	5.1	4.3	3.9
	3 季度	6.1	3.7	3.1
	4 季度	5.5	2.4	5.4
2015 年				
	1 季度	4.8	2.6	6.5
	2 季度	4.7	1.5	4.8
	3 季度	3.6	1.2	5.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4 年			0.7	6.2	264.9
	12 月	-2.2	0.0	5.6	32.9
2015 年					
	1 月			5.7	20.1
	2 月			5.5	26.6
	3 月	-1.1	0.6	5.5	11.9
	4 月			5.4	18.7
	5 月			5.5	26.0
	6 月	3.5	0.8	5.3	24.5
	7 月			5.3	22.3
	8 月			5.1	15.3
	9 月	2.2	0.6	5.1	14.5
	10 月			5.0	30.7
	11 月			5.0	25.2
	12 月			5.0	29.2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23432.1		2.8	28515.3		3.4	-5083.2
11 月	1962.0	-0.8	0.6	2362.2	-1.8	2.3	-400.2
12 月	1949.8	-0.6	1.0	2405.2	1.8	4.4	-455.5
2015 年							
1 月	1890.3	-3.1	-2.0	2326.1	-3.3	0.1	-435.9
2 月	1858.9	-1.7	-1.9	2244.3	-3.5	-3.4	-385.4
3 月	1867.7	0.5	-4.1	2389.3	6.5	0.4	-521.6
4 月	1884.3	0.9	-3.4	2318.0	-3.0	-3.1	-433.7
5 月	1870.9	-0.7	-5.2	2305.3	-0.5	-3.7	-434.5
6 月	1869.3	-0.1	-4.4	2331.9	1.2	-2.0	-462.6
7 月	1882.4	0.7	-4.4	2306.7	-1.1	-3.2	-424.3
8 月	1841.6	-2.2	-6.7	2329.8	1.0	-2.3	-488.1
9 月	1867.7	1.4	-4.2	2292.2	-1.6	-3.8	-424.6
10 月	1837.8	-1.6	-7.1	2283.6	-0.4	-5.1	-445.8
11 月	1822.1	-0.9	-7.1	2245.9	-1.7	-4.9	-423.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2115.0	3079.3	-964.3
	3 季度	531.4	893.5	-362.1
	4 季度	592.1	355.9	236.2
2014 年		1066.1	3165.5	-2099.4
	1 季度	-1034.7	577.7	-1612.3
	2 季度	653.2	771.3	-118.2
	3 季度	955.9	969.7	-13.7
	4 季度	491.7	846.8	-355.1
2015 年				
	1 季度	1983.2	774.9	1208.3
	2 季度	893.9	855.5	38.4
	3 季度	342.8	704.5	-361.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0.5	-0.7	0.2
3 季度	0.1	0.2	0.3
4 季度	0.3	0.1	-0.3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0.3	0.2	0.2
2 季度	0.1	0.2	0.2
3 季度	0.3	0.5	0.2
4 季度	0.4	0.6	0.2
2015 年			
1 季度	0.5	0.5	0.5
2 季度	0.4	0.4	0.3
3 季度	0.3	0.4	0.6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3.0	1.3	0.1
3 季度	0.5	0.1	1.1
4 季度	1.0	1.4	0.7
2014 年	0.9	3.7	3.8
1 季度	0.4	0.4	0.6
2 季度	-0.5	1.3	1.3
3 季度	0.3	1.5	1.7
4 季度	0.6	0.9	0.9
2015 年			
1 季度	1.5	1.3	1.9
2 季度	0.1	1.6	0.9
3 季度	0.0	0.2	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4 年		0.02		11.6
11 月				11.5
12 月	1.80	0.11	25.1	11.4
2015 年				
1 月				11.3
2 月	-1.9	0.35	33.8	11.2
3 月				11.1
4 月				11.1
5 月	1.13	0.58	58.5	11.1
6 月				11.0
7 月				10.8
8 月	-0.5	0.52	42.8	10.7
9 月				10.6
10 月				10.5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0.9	1.0	0.7
1 季度	1.1	0.6	0.6
2 季度	0.8	0.8	0.6
3 季度	0.8	1.0	0.8
4 季度	0.9	1.4	1.0
2015 年			
1 季度	1.3	1.6	1.3
2 季度	1.6	1.7	1.3
3 季度	1.6	1.7	1.6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0.9	3.7	3.8
2 季度	0.9	3.1	3.7
3 季度	0.7	4.3	4.0
4 季度	0.8	4.3	4.8
2015 年			
1 季度	2.0	5.2	5.8
2 季度	2.6	5.8	5.5
3 季度	2.2	4.4	4.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19391		2.3	17415		0.1	1976
10 月	1645	-1.5	1.1	1450	-1.3	-1.2	194
11 月	1678	2.0	8.3	1452	0.1	2.1	227
12 月							
2015 年	1649	-1.7	-0.2	1442	-0.6	-5.2	206
1 月	1719	4.3	4.8	1488	3.2	1.3	231
2 月	1725	0.3	11.6	1548	4.0	9.6	177
3 月	1713	-0.7	9.1	1516	-2.1	5.4	197
4 月	1703	-0.6	2.8	1492	-1.6	0.3	211
5 月	1718	0.9	12.6	1525	2.3	7.0	192
6 月	1727	0.5	6.9	1503	-1.5	0.7	224
7 月	1663	-3.7	5.5	1471	-2.1	2.7	192
8 月	1678	0.9	0.7	1480	0.6	-0.8	198
9 月	1681	0.2	0.4	1482	0.2	-0.7	198
10 月	1708	1.6	6.1	1481	-0.1	4.5	227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60	642.7	-581.4
	10 月	-115	170.0	-285.0
	11 月	-205	-372.0	167.0
	12 月			
2015 年		77	136.0	-59.0
	1 月	331	348.0	-17.0
	2 月	234	-214.0	448.0
	3 月	287	163.0	124.0
	4 月	132	311.0	-179.0
	5 月	161	172.0	-11.0
	6 月	-72	230.0	-302.0
	7 月	-28	3.0	-32.0
	8 月	597	298.0	299.0
	9 月	426	405.0	21.0
	10 月	-52	-34.0	-18.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1	-1.3	0.2
	1 季度	1.2	2.3	-0.1
	2 季度	-1.9	-4.8	-0.2
	3 季度	-0.7	0.0	0.2
	4 季度	0.5	0.4	0.4
2015 年				
	1 季度	1.1	0.3	0.2
	2 季度	-0.1	-0.5	0.4
	3 季度	0.3	0.4	0.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2.7	5.8	6.0
	2 季度	-4.7	0.4	-4.3
	3 季度	-0.9	1.6	1.1
	4 季度	0.0	2.9	0.8
2015 年				
	1 季度	1.6	1.9	1.7
	2 季度	0.2	-4.3	-2.6
	3 季度	0.3	2.7	1.7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1	-1.3	0.2
	1 季度	2.7	3.9	0.6
	2 季度	-0.3	-2.5	-0.3
	3 季度	-1.5	-2.7	-0.2
	4 季度	-1.0	-2.1	0.3
2015 年				
	1 季度	-1.1	-4.2	0.6
	2 季度	0.7	0.1	1.3
	3 季度	1.6	0.4	1.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9.9	9.1	14.8
	2 季度	0.7	5.5	5.9
	3 季度	-2.1	7.5	5.1
	4 季度	-3.2	11.2	3.6
2015 年				
	1 季度	-3.9	7.1	-0.6
	2 季度	0.5	1.8	0.8
	3 季度	2.0	3.0	1.4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4 年		1.8	1.66	3.6
	10 月	-1.6	1.69	3.5
	11 月	-1.6	1.69	3.5
	12 月	1.2	1.77	3.4
2015 年				
	1 月	-2.7	1.77	3.6
	2 月	-2.2	1.63	3.5
	3 月	-3.2	1.72	3.4
	4 月	-2.5	1.77	3.3
	5 月	-2.1	1.78	3.3
	6 月	1.6	1.78	3.4
	7 月	-1.1	1.83	3.3
	8 月	-2.6	1.85	3.4
	9 月	-2.2	1.86	3.4
	10 月	0.6	1.83	3.1
	11 月		1.93	3.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730930		4.8	859091		5.7	-128161
12 月	66061	2.7	12.9	72259	-0.1	1.9	-6198
2015 年	756316		3.5	784637		-8.7	-28321
1 月	67341	1.9	17.0	70893	-1.9	-9.0	-3552
2 月	62510	-7.2	2.4	68751	-3.0	-3.6	-6241
3 月	64837	3.7	8.5	65034	-5.4	-14.5	-197
4 月	63453	-2.1	8.0	65835	1.2	-4.2	-2382
5 月	61349	-3.3	2.4	63353	-3.8	-8.7	-2003
6 月	63839	4.1	9.5	66612	5.1	-2.9	-2773
7 月	63439	-0.6	7.6	66997	0.6	-3.2	-3557
8 月	62922	-0.8	3.1	66303	-1.0	-3.1	-3381
9 月	61904	-1.6	0.6	64838	-2.2	-11.1	-2934
10 月	61977	0.1	-2.1	63867	-1.5	-13.4	-1890
11 月	62519	0.9	-3.3	62295	-2.5	-10.2	224
12 月	60161	-3.8	-8.0	59795	-4.0	-18.0	366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9548	127682	-118134
	11 月	397	15074	-14677
	12 月	2932	13443	-10511
2015 年				
	1 月	-650	8891	-9541
	2 月	1163	12473	-11310
	3 月	2968	12315	-9347
	4 月	-748	10745	-11493
	5 月	1067	18375	-17308
	6 月	-684	7376	-8060
	7 月	-4479	6703	-11182
	8 月	-931	8188	-9119
	9 月	-1933	9181	-11114
	10 月	844	12991	-12147
	11 月	1344	8347	-7003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4	3.0	1.5	0.1	7.3	0.6
	1 季度	0.5	2.8	1.9	3.2	6.7	0.6
	2 季度	3.7	3.1	1.3	-0.9	6.7	0.7
	3 季度	2.1	2.9	1.6	-1.1	8.4	0.9
	4 季度	3.4	3.0	1.4	-0.7	6.6	0.4
2015 年							
	1 季度	-0.7	2.7	2.2	-2.0	7.5	-2.2
	2 季度	-0.3	2.4	1.3	-2.9	7.0	-4.6
	3 季度	2.3	2.3	1.0	-4.5	7.4	-4.1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4 年		3.3	2.1	2.5	3.8	6.0	5.0
	1 季度	3.9	2.3	2.7	3.7	6.3	5.1
	2 季度	3.4	1.8	2.0	4.2	6.5	5.0
	3 季度	3.3	2.3	2.9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4	3.6	5.7	5.0
2015 年							
	1 季度	2.4	2.5	2.4	4.0	5.6	4.7
	2 季度	2.2	2.3	2.8	0.6	4.9	4.7
	3 季度	2.7	2.6	2.3	-0.6	4.7	4.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4 年		6.9	6.2	4.8	5.2	25.1
	12 月	6.7	5.7	4.3	5.3	24.3
2015 年		6.9				
	1 月	6.6	5.7	5.3	5.5	
	2 月	6.8	5.6	5.9	5.8	
	3 月	6.8	5.5	6.2	5.9	26.4
	4 月	6.8	5.5	6.4	5.8	
	5 月	6.8	5.6	6.7	5.6	
	6 月	6.8	5.6	6.9	5.3	25.0
	7 月	6.8	5.5	7.5	5.3	
	8 月	7.0	5.4	7.6	5.3	
	9 月	7.1	5.3	7.6	5.2	25.5
	10 月	7.0	5.2	7.9	5.5	
	11 月	7.1	5.1	7.5	5.8	
	12 月	7.1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4 年		3.5	4.5	3.3	4.0	2.9
	12 月	3.5	3.8	3.3	3.8	3.0
2015 年		3.6		3.3	3.8	
	1 月	3.4	4.5	3.3	3.8	3.0
	2 月	3.9	4.3	3.3	3.7	3.2
	3 月	3.7	3.9	3.3	3.8	3.0
	4 月	3.7	4.3	3.2	3.8	3.0
	5 月	3.9	4.4	3.2	3.8	3.1
	6 月	3.9	4.4	3.2	3.8	3.1
	7 月	3.7	4.7	3.3	3.7	3.2
	8 月	3.6	4.7	3.3	3.7	3.2
	9 月	3.5	4.5	3.3	3.8	3.2
	10 月	3.4	4.6	3.3	3.8	3.1
	11 月	3.4	4.0	3.3	3.8	3.2
	12 月	3.4		3.3	3.9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 年	4746.3	4625.4	120.9	5045.6	6903.2	-1857.6
12 月	394.6	365.7	28.9	390.5	546.4	-155.9
2015 年						
1 月	348.2	332.0	16.2	346.2	509.6	-163.4
2 月	318.2	323.1	-4.8	346.1	525.7	-179.6
3 月	358.9	377.1	-18.1	418.4	543.8	-125.5
4 月	339.1	367.5	-28.5	385.6	497.0	-111.4
5 月	338.6	366.1	-27.5	397.3	505.4	-108.1
6 月	369.9	374.3	-4.4	400.9	545.8	-144.9
7 月	339.5	349.8	-10.3	378.8	546.1	-167.3
8 月	336.5	348.8	-12.3	362.7	471.8	-109.1
9 月	346.7	348.0	-1.3	393.6	534.3	-140.6
10 月	336.1	353.2	-17.1	380.0	573.4	-193.4
11 月	321.4	334.5	-13.1	378.7	530.8	-152.1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 年	910.5	998.9	-88.4	2251.0	2391.5	-140.5
12 月	76.2	70.3	5.9	174.9	179.3	-4.4
2015 年				1911.3	1786.9	124.5
1 月	57.7	78.9	-21.2	137.0	176.2	-39.2
2 月	66.0	73.7	-7.7	120.9	156.1	-35.2
3 月	75.6	75.3	0.3	169.8	172.6	-2.8
4 月	69.9	71.8	-1.9	151.6	153.2	-1.6
5 月	73.8	70.1	3.7	167.7	146.3	21.4
6 月	73.1	68.7	4.4	196.3	157.4	38.8
7 月	74.7	75.6	-0.9	185.3	167.6	17.7
8 月	67.6	75.5	-7.9	154.9	133.1	21.8
9 月	67.2	68.4	-1.2	161.5	137.3	24.2
10 月	63.5	79.5	-16.0	160.5	146.2	14.3
11 月	66.9	65.7	1.3	138.1	131.1	7.0
12 月				167.8	109.7	58.1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 年	3216.4	4625.3	-1408.9	4977.6	3080.3	1897.4
12 月	261.3	352.6	-91.3	383.8	244.9	139.0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1 月	243.7	321.1	-77.4	278.3	125.0	153.3
2 月	218.7	282.8	-64.1	293.0	156.3	136.7
3 月	238.9	357.0	-118.2	326.3	172.6	153.8
4 月	220.9	329.7	-108.8	305.5	163.4	142.1
5 月	222.6	326.9	-104.3	305.8	154.5	151.3
6 月	222.9	331.2	-108.3	300.1	163.7	136.5
7 月	231.4	359.5	-128.1	276.6	169.8	106.8
8 月	212.7	337.4	-124.8	253.1	166.0	87.1
9 月	218.4	323.2	-104.8	263.7	167.6	96.1
10 月	213.5	311.2	-97.7	272.4	171.7	100.6
11 月	200.0	298.0	-98.0	255.3	166.7	88.7
12 月	223.0	339.6	-116.6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 年	5726.6	5255.1	471.5	3971.3	4115.8	-144.5
12 月	494.6	439.1	55.5	341.4	348.4	-6.9
2015 年	5271.2	4348.3	922.9			
1 月	451.1	394.2	56.9	265.5	306.1	-40.5
2 月	414.8	339.3	75.5	297.2	298.7	-1.6
3 月	468.5	384.8	83.7	341.3	336.6	4.7
4 月	462.4	378.1	84.3	329.5	330.4	-0.9
5 月	423.7	360.7	63.0	313.4	323.6	-10.2
6 月	466.8	367.0	99.8	338.4	345.9	-7.5
7 月	466.1	388.5	77.6	328.0	350.7	-22.7
8 月	392.0	350.0	42.0	310.5	338.3	-27.8
9 月	434.8	345.6	89.2	322.4	336.6	-14.2
10 月	434.0	368.0	66.0	341.6	356.0	-14.4
11 月	444.0	341.0	103.0	310.3	325.9	-15.7
12 月	426.0	355.0	71.0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 年	5241.3	6007.7	-766.3	3138.4	2742.3	396.1
12 月	455.0	537.0	-82.0	256.5	212.0	167.5
2015 年				2804.8	2289.2	515.6
1 月	438.0	484.2	-46.2	251.2	203.2	48.0
2 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3 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1	40.7
4 月	401.4	457.1	-55.8	234.9	187.4	47.5
5 月	408.5	444.4	-35.9	256.3	202.1	54.2
6 月	407.4	465.6	-58.2	230.7	208.8	21.9
7 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1	36.3
8 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6	39.7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1	52.3
10 月	450.1	485.9	-35.8	239.4	178.1	61.3
11 月	454.6	480.9	-26.4	221.3	193.8	27.5
12 月				220.6	178.9	41.7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4 年	2341.4	2088.7	252.7	1762.9	1781.8	-18.9
12 月	194.5	168.0	26.5	146.2	144.4	1.9
2015 年				1503.4	1427.3	76.1
1 月	177.5	152.5	25.0	133.6	126.1	7.4
2 月	148.0	135.3	12.7	121.7	115.1	6.6
3 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 月	166.1	147.2	18.9	130.8	126.3	4.6
5 月	167.8	152.5	15.3	126.9	116.1	10.8
6 月	171.9	150.5	21.3	135.1	129.8	5.3
7 月	166.3	160.1	6.2	114.7	100.8	13.9
8 月	163.8	138.8	25.0	127.3	124.0	3.3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177.6	149.1	28.5	121.2	111.1	10.1
11 月	157.0	133.2	23.8	111.1	115.2	-4.1
12 月				118.9	121.2	-2.4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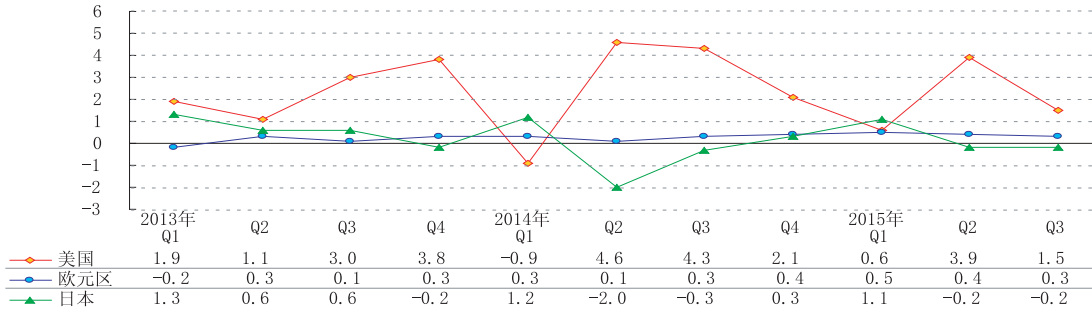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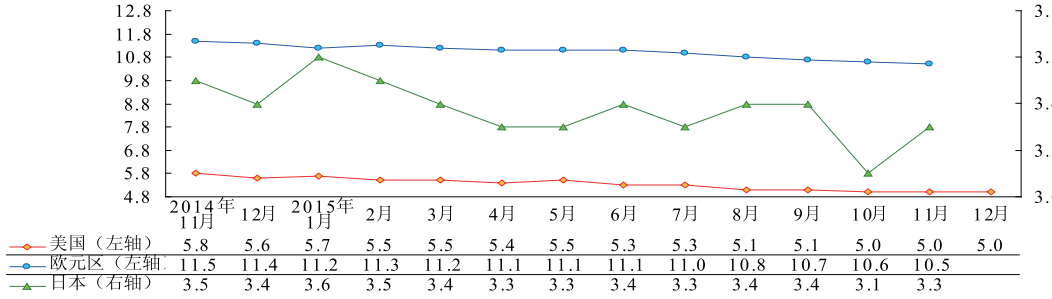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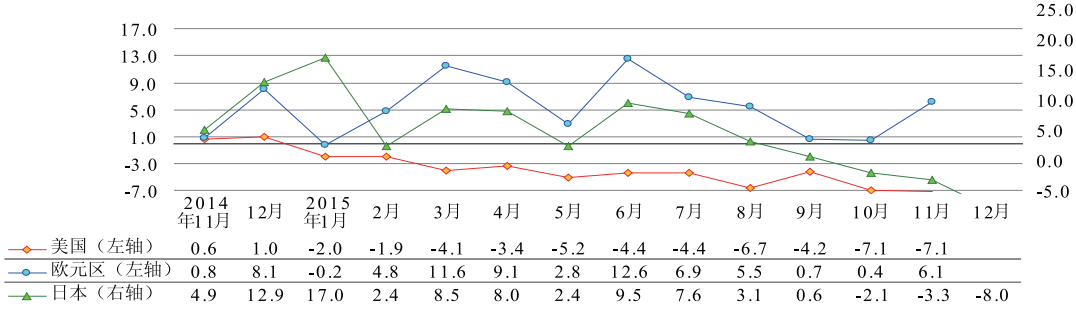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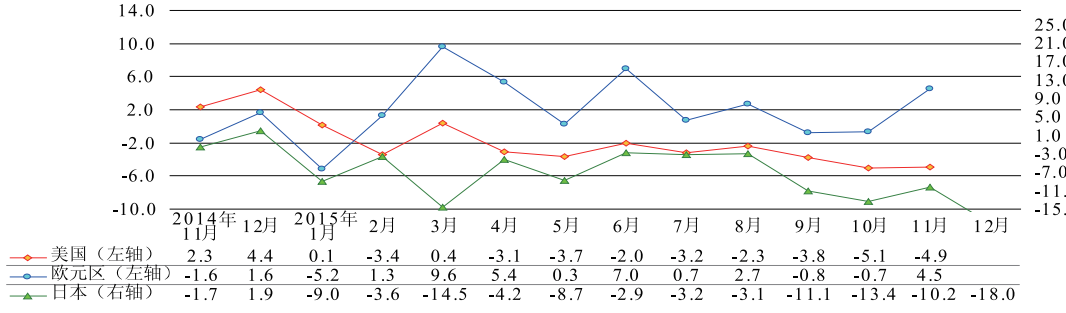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Globalization

Monthly

No. 2

February 2016

ABSTRACTS

(1) New Thinking Should be Adopted for the Macro—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Zeng Peiyan

As the global economy has not completely stepped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t may present a trend of "four lows and one high", namely, low growth, low trade, low inflation, low investment and high debts, and thus the momentum for economic recovery is still too weak.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is going to face is even more complex than that during the 12th Five - Year period, with tougher tasks and greater challenges. I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the old normal to the new normal, we must explore a new way for macro - management, especially a "problem - oriented" way of think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overcapacity, over inventory, deleveraging, lowering cost, and shoring up weak growth areas, we should connect well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stick to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preeisely identify, predict and mitigate risks and improve and innovate policy toolbox, so as to stabilize and boost the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five questions deserved further discussion in the future macro - management.

(2)Building a World Tourism Power in an All—Round Way

Wei Liqun

China has become a big tourism nation worldwide. At present, the study and formulation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are being made by the governments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local level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long - term significance for us to overall assess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tourism,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tent of being a strong country and in touris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rom major world tourism powers, correctly analy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tourism power, and conduct study on and put forward important 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to be implemented.

(3)Tracing to the Source of Supply—side School and Initial Analysis on its Law

Jia Kang, Su Jingchun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two rounds negation of negation law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y－side economic schools. The logic of the first rounds is from Say's Law to Keynesianism and Supply－side School. The logic of the second rounds is from Supply－side School to Keynesianism's Restoration and Supply－sid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law,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assessments, which related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expectations. There are two aspects in the assessments. The first one is the assessments on Say's Law, which conclude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importance, Sismondi's criticism of laissez－faire values, Malthus's ideas of demand management and their differences, Keynes' negation on the conditional and Marx's criticism of Bourgeois Vulgar Economics based on the value of labor product, Trinity Formula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econd one is the assessments on Supply－side School, which conclude the criticism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gain and loss of the school of thought form the doctrine Theory Contact Practice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main point of view of supply side and reviewing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fter elaborat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two rounds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law, we present the expectation of New Supply－side Economy asserting the economic study should from opposition to integration rooted in China's practice of rational supply management. We think the New Supply－side Economics is a rational return of the Supply－side research based on development logic. Finally, we present its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the way of negation and the new thought to the restoration.

(4)Special Topic of China Economic Annual Meeting 2015—2016

Yang Weimin, Zhang Yuyan, Liu Shijin, Zhang Xiaoqiang, Chen Xiaohua, Feng Fei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held China Economic Annual Meeting 2015－2016 on December 26, 2015 in Beijing. The meeting, with "Leading the New Normal, Striving for the Decisive Victory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s the theme,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interpreting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and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issue publishes speeches delivered by five top experts, namely, Yang Weimin, Zhang Yuyan, Liu Shijin, Zhang Xiaoqiang, Chen Xiaohua, Feng Fei, at the annual meeting.

(5)Risk Evalua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Initiative and Countermeasures

Wei Qijia, Xiao Hongwei

It is known that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famous for its innov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risks cannot be avoided because of complex geopolitical relations. Moreover, various situations are existing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relate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risks when carrying out the initia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se risks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investment, politics, and security fields. Finally, in this paper,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ill be discussed in order to decrease potential risks.

(6)Study on the New Normal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 Zhaogang, Peng Bo, Li Fangqing, Fang Hong

The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after over thirties year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the new structure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t h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the New Normal. The results have been given that the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bring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economy's growth, and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hould grasp these opportunities to strengthen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and implement their innovation - oriented industry arrangement.

(7)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Building the Food Trade Channel between China (Yunnan) and Indochina

Chen Zhicheng, Kong Zhijian

Proceed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New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nd leaping development of grain industry in Yunna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food trade channels and analyzes basic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in trade channel, clearly defines the basic ideas and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a key layout and main tasks,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suggestions of building food trade channels between China (Yunnan) and Indochina .

(8)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Lin Xiaoyue, Wu Su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statistic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design innovation both from China and abroad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alyzes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 from the ang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 and shortage of design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enterprise management. Henc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esig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trategy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

Editor: Guo Zhouming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尤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咨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内容不限，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3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PERC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CHINA OVERSEAS POLITICS &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